



# 清华文革亲历记

罗征君 著



罗征启（1934-2022年）

193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番禺），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从事教学工作，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团委书记、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1961年调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196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198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期间1981年进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83年9月创办深圳大学，担任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1985年担任深圳大学校长。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后更名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 清华文革亲历记

罗征启 著

# 代序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广大科技人员、教师、专家普遍受到歧视以致迫害。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派性严重泛滥。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是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失误的结果，更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家长制和一言堂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而且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声音。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2016年，第629-634页

# 目 录

- 1、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 .....01
- 2、昙花一现八百天.....19
- 3、矛盾升级“414”高调登场.....33
- 4、“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39
- 5、没有明确结论的结局 .....116
- 6、高等教育扫地出门 知识分子理想破灭.....118
- 7、“假四清”目标是我 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155
- 8、缅怀黄报青先生 .....160
- 9、追思 .....164
- 10、刑满出狱 现身深圳 .....167

# 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

——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就其混乱、荒唐和残酷的程度而言，“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虽然，这场大动乱是1966年6月正式开始的，但奇怪的是，1966年下半年清华的历史，却常常被忽略、被遗忘，似乎这一段什么都没发生，直接进入1967年的两派矛盾和1968年的百日大武斗。这是不真实的。

我想用我在这场动乱中亲身的经历，和我亲眼所见，告诉后来人，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发生了什么！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就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记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蒙冤的同事负责。

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在大动乱时，我的每一阶段经历中，都会伴随出现蒯大富的身影，这是事实。那个年代，清华人都知道，蒯大富是罪大恶极，我本人是身受其害的苦主之一。但是这场大混乱、大灾难不是他蒯大富发动的，而且1966年下半年，蒯大富基本上没有自由。他是反工作组的“反革命”。1966年这一段清华园内发生的一系列“红色恐怖”事件不能要他来负责。

## 1964年暑假，带队到部队当兵

1958年“大办民兵师”时，我是积极分子。清华大学是个民兵师，建筑工程系是个工程兵团。我是建工系的团总支书记，所以就当了个副团长。当时建工系的民兵团搞得比较好，和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一次工程兵司令部通知，司令员陈士榘上将要听民兵工作汇报，学校和系的领导叫我去汇报，我就带建筑系二年级的一个学生骑自行车前往，骑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没见过上将司令员听汇报这种场面，我非常紧张，好不容易，总算熬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会。司令员似乎还满意，就宣布散会。于是大家起立，让司令员先走。迈出会议室的门的时候，司令员回头看看我，许多解放军军官立刻让出一条路，示意我们二人上前。司令

员边走边说，要我转达他对民兵师领导和工程兵团的团长、政委的问候。这时走到楼梯转弯的休息板处，他突然发了一道命令：“派车！”前后左右几个声音同时回应：“是！”这时我看到正对楼梯的门口，一部小汽车急刹车停下来。不容分说，我们两人被拥到车上。我们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几个参谋向我们敬礼，车子就径直开回了清华，我们甚至没有和司令员道别。在车上，我们两人面面相觑，内心叫苦不迭。回到清华，我们又赶快搭乘公交车，回到工程兵司令部，取了车子，再骑回清华。

尽管这段滑稽的故事并没有传出去，但是我们和工程兵司令部的关系较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1964年暑假，一年级的学生要去部队当兵，我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委就命我去工程兵团司令部联系，很快就落实了：即1963年入学的学生两千多人组成一个民兵团，到南口工程兵XXXX部队当兵，并指令我当团政委，请部队的干部战士当团长以及营、连、排各级干部正职，副职则请教师或学生干部担任。

我当时已届而立之年，虽然不算太大，但比较一年级的学生还是大了十岁有多。第一个考验是要带学生从清华行军到南口，据说有80里。我本有点犹豫，但解放军团长的一席话逼得我没有退路。他说，“副政委、副团长带领部分干部战士在南口基地前五里处迎接我们，我和一部分干部战士带领学生队伍行军，路线是从清华出东门，经清河、昌平再到南口。我们要了一部车，校医院两名医生护士坐车随军行进，照顾伤病号。罗政委，你就坐车吧，天气太热，你受不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比您还年轻一点哩！”他说：“那不一样，我们经过锻炼，一天走个百多里很平常，八十里更不算什么，你还是别走了。”我没有再争辩，但已暗下决心，走！

我和团长走在前面。我比学生轻装一些，学生每人一支步枪，一个背包。而我，一是没有枪，二是背包放在车上。大体上，大一岁就少一斤多负重吧。

为躲避夏日午后的酷热，我们四点就出发，天还黑着。部队黑夜行军不许喧闹讲话，很安静。天大亮以后，就可以唱歌了。不到昌平，我的脚就开始痛了，我估计已起了几个不小的泡。团长看出我的问题，关心地问：“起泡了？我忘了告诉你别穿新鞋了。小泡别动它，大泡我来帮你处理。”我没吭声，但是尽量往前走，远离那部车子。我怕团长一个命令，我又被扔上车子。

差五里到南口时，全部营连排干部列队欢迎我们，然后解放军的干部接管了部队，于是马上士气大振，面貌一新，整齐地喊着响亮的口号，操进XXXX部队基地。

我们早上四点从清华出发，中间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半到基地。我得出几条宝贵的行军经验：一、正常行军一小时走八到十里，行军途中尽量少休息，越休息掉队越多。二、我注意到团长和解放军干部战士，行军途中虽然也出汗，但很少喝水或不喝水。他们说，喝水多，出汗多，体力消耗多。三、我这次为行军买了双解放鞋。途中我才知道，行军不能穿新鞋，可已经晚了。这几条经验在我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很有用，尤其是第一条经验，助我从蒯大富关押我的三堡疗养院逃出来。这是后话。

安排好工作回到住房，我按照解放军教的办法，处理了脚上起的几个大泡后，连饭都没吃就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起来一看，学生们已在打篮球。到底是年轻，很快就恢复了。

一个多月的当兵生活就此开始了。

## 蒯大富初露头角

在文革大动乱以前，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个“蒯”字。大动乱的一个“功劳”之一就是在大学生中普及了这个字。

我们去部队当兵那一段时间，解放军正在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大比武”。一天，各营、连干部到团部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化工系有个连指道员讲：“我连有个战士讲用得挺好，但是他这个姓我不认识。他们告诉我，可我又忘了：草字头下面一个朋友的朋字，右边再一个立刀。”团长和各营、连干部都不认识。我说：“这个字念kuāi。”团长说：“还是你们有文化。”我解释说：“小时候看《三国演义》，里面有个人姓这个字，我查了三次字典才记住。”

于是，蒯大富被选中在连、营里“讲用”。指导员曾拿他的稿子给我看过。并说他是贫农家庭出身。他在营里讲用的时候，我站在后面听了一会，印象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是他讲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一个多月后，结束当兵生活返校时，是由我和学生干部带队，经小汤山、西北旺一带行军回到清华，很顺利，没有人脚打泡。这一个多月当兵

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我对这次带队到部队当兵的成绩还比较满意，自觉很有收获。但是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正是从这次当兵“学用”毛主席著作开始，蒯大富这个名字就一直纠缠着我，成为我挥之不去、斥之不散的梦魇。

## 能说会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

当兵回校以后，我渐渐淡忘了蒯大富。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陆续出了“一评”到“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文章，我们习惯称之为“九评”，内容早已忘光了。但是，在学习“九评”过程中，蒯大富却又浮出水面。

按照分工，学生的日常思想工作，是由团委负责，宣传部是负责教职工的思想和政治学习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统管团委和宣传部并兼任宣传部长。当时党委正在抓学习“九评”联系反修防修思想改造的实际。艾知生亲自抓，筛选了一批文章，送交宣传部准备登在校刊上。我在宣传部分管校刊。记得党委宣传部有位同事问我：“蒯大富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这个人，怎么啦？”这位同事说：“这里面有篇蒯大富的文章，写得挺生动，艾知生好评有加。听说你带队当兵时认识这个学生。”

随后，艾知生又问我：“你认识蒯大富吗？”我回答：“我带队当兵时，知道这个学生。”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对蒯大富有一点“需要戒备”的感觉，所以我只说“知道”，而不说“认识”。其实在英文里，“认识”和“知道”是一个字，但在中国，我觉得涵义有点不一样。

我汇报了当兵时“讲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并说：“回校以后，有一次蒯大富忽然找我，请我审查学生广播台的稿件。说他现在在学生广播台当编辑。按规定，学生广播台的稿件，一向是由团委书记、副书记审的。以前我当团委书记时也审过。现在我已到党委宣传部工作，审广播稿，不是我份内的事。但蒯大富说团委书记们都不在，所以送党委宣传部审。我打电话证实团委书记们都不在家，于是代审了这批稿件。这件小事使我知道，此人现在又在广播台当编辑。”艾知生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此人能说、会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你以后注意一下。”

什么是“宣传干部的‘料’”，我自己是吗？在毕业30周年、40周年

同班同学聚会时，大多数同学说我走错了路，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的‘料’，却去了干党政工作！……”在同班同学的印象里，我是个不爱讲话，也从来没写过文章的学建筑的“料”。因为姓罗，年纪较小、个头不大，所以获得一个“小萝卜”的绰号，广东人称之为花名。后来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因为整天和牛打交道。又因为比较实干，所以又得一花名“骡子”。如果是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宣传干部的“料”，肯定会获得“叫驴”的花名。此时，我倒觉得蒯大富还真是个宣传干部的“料”。

但是我并没有去“注意”谁是什么“料”，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席卷全国的黑色风暴降临了！什么“料”都没用了！

##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政治形势日益严峻。

我感到，清华党委特别紧张。有以下几个迹象：

一是蒋南翔经常深夜回校，召开书记或常委会议，我这一层干部当然不知道内容。但已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二是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那里，经常放出些令人紧张的信息。如北大“四清”的紧张情况，说北大有的干部乱揭发，乱批判，暗示要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遇到类似北大“四清”等情况，一定不要乱讲话。

三是一段时期，蒋南翔和艾知生等频频讲解左与右的关系问题。记得一次党委传达蒋南翔的意见说：从一条船的左边掉下水和从右边掉下水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党委的结论是，在蒋南翔的领导下，清华的大方向一贯是正确的，对左的和右的都有一定的抵抗力，对“左”的可能更敏感一点。

四是艾知生召集宣传部、政治课的一批干部研究校内的思想动向，又传达蒋南翔的意见：清华是理工科大学，意识形态上不如北大活跃，问题也不会那么多，但建筑系是最敏感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问题。与其将来让人家来查，不如自己先查，有问题自己先解决。决定由我带宣传部、政治课几个人进建筑系，不要说“四清”，也不叫工作组，看看有什么问题。

艾知生私下里对我说：“这只是个姿态，你稳住了。真是有什么问题，先个别汇报再说，不要张扬。”我到建筑系蹲了三个月，听梁思成的课，检查了几本教材，和几位老师交谈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算交差

了。

“文革”以后，我才知道，任凭蒋南翔多么敏感，多么充分地做了思想准备，也顶多算是大风暴中拣了一顶破草帽，没一点用。而我，则落得个“受党委之命到建筑系搞假‘四清’，包庇和保护‘刘少奇、蒋南翔的忠实走狗黄报青’”的罪名，被蒯大富们反复批了多次，直到黄报青先生丧命九泉。

为准备年底12月9日的“12·9”运动周年纪念，中央指定要蒋南翔到人大大会堂作报告。蒋南翔本来做事就很认真，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指定他到人大大会堂作报告，无异于对他的成绩、地位的充分肯定。他很高兴。于是抽调我和党办的周家恣两人到他家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帮他写稿子。

在讨论改稿件时，或在休息漫谈中，蒋南翔多次谈到左和右的问题。他说：“12·9运动当时就应该是反左为主。左的危害很大。因为要抗日，队伍内部就没有右的问题。但要团结和动员更多的人抗日，就要排除左的干扰。”他还多次提到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我不懂，也不好多问。“抢救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肃反”、批“胡风”、批“武训传”、“三五反”等等运动，对于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或是89年“6·4事件”对80后这代人一样，只是个抽象的或模糊的概念而已。甚至根本不想知道。但是，难道我们曾亲身经历了“三面红旗”、“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的这一代人，就很了解这些“黑色风暴”了吗？难道蒋南翔那一代人就真了解“抢救运动”了吗？我当时没有问，我相信，问，也不会作答。

蒋南翔作完报告，回到清华，很高兴地对我说：“中央领导的评价是肯定的，认为很好。”但是，我们宣传部搜集到教师、学生的反映是“没有反应”。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普遍的自欺欺人的现象。“没有反应”其实是一种最坏的反映。“哀莫大于心死”，宣传工作的“哀”，莫大于“没有反应”。这个报告，并没有帮到蒋南翔的忙，反而多了个小辫子，让红卫兵揪斗。

## 批“三家村”，又见蒯大富

“文化大革命”的序曲，批“三家村”开始了。本来，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上海发动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三家村”运动。吴、邓都是北京市的领导，所以北京市一直顶着不批。按中央部署由有文科的大学批“海瑞罢官”，而清华就要批“三家村”。一边要求必须批，一边又不愿批，这让清华党委非常为难。

艾知生代表党委向宣传部交代，对内一定要稳住，不要乱批。乱批的结果，是非不清，势必批到自己头上。对外宣传要积极一点，这是个姿态问题：应向外界表明，清华批“三家村”是积极的，而且对外宣传还有报社、杂志社也会帮我们把关，不会出轨太远。最好是北京的各主要报纸上，三天两头要有清华师生写的批判文章。艾知生说：“罗征启，这事交给你办，你办事稳健，不会过头。”

我知道，清华教师很难动员起来，于是召集校刊《新清华》、学生广播台、学生文艺社团的文艺社等几个宣传系统的学生写作组、通讯员开会，传达了党委的意见。当然，我没有传达“不要乱批。不要过头”等意见。我知道，这些意见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更不能见诸于文字。

接着，大批的稿件送了上来。其中大部分稿件都不能用，都是乱批，或批过头的。我并没有再开会，而是小范围、甚至个别谈话，指出问题。

我总结了几点负面的倾向：一、批“三家村”，不能凡“三家村”的文章，甚至凡邓拓的文章就一定是错的，就一定要批。记得有个学生甚至撰文批邓拓的书法，说邓拓妄想在书法上胜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艾知生称之为“左派”幼稚病。我认为这些连“幼稚病”也算不上，简直是精神病。心里真担心，觉得学校快要失控了！二、有问题的文章也不是字字句句都错，都有问题。批评古人的叫“指桑骂槐”，赞赏古人的叫“借古讽今”。这也难怪，本来“三家村”就没什么好批的，硬要发动学生群众来批，只能钻牛角尖、用显微镜来找毛病了。三、有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什么问题，错在何处。总之，不能对的错的一锅煮，那就没有是非，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了。更有甚者，有的把一切全颠倒过来，不管对错。错的当然要批；对的，就加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帽子来批，这就叫乱批！

稿件请宣传部的一些同事帮助审。凡属于我说的三种负面倾向的稿件，基本上都送去报社。否则将来学生说宣传部扣押稿件，这罪名就大了。凡

有希望，可以修改的，就找写稿人谈话，指出问题，请他们自己改，然后帮他们送去报社。北京各大报，每周都见到有清华学生的文章。文字一般，道理浅显，但是挺热闹。

我开会布置时，没注意到有蒯大富。但在学生批判文章里，我又见到这个名字。我找他谈了谈，帮他改了一下，他同意了就替他送《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工人日报》采用了，又大删大改。刊登时只有豆腐块大小，不到二百字，但也算是一篇稿件！后来，我见蒯大富反工作组那个劲头。暗想如果我当时没理睬他的稿件，他肯定会揭批我扣押他大批判的稿件呢！

艾知生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他微笑地说：“就是这样，热热闹闹，表示我们很重视，能动员学生群众，但是又不是胡批乱批，是可以控制的力量。”他见到《工人日报》上刊登的蒯大富的文章，高兴地说：“短了点，简单了点。但是，这样就好。你手上是不是有几个写手，你动员的很快嘛！”

我没有吭声。我没有告诉他，文艺社的一些学生，很有自己的观点。例如党支部书记印甫盛就对我说：“我们开夜车看了全部‘三家村’的文章。不但不想批，相反，觉得很棒！”我也没有告诉艾知生，另一个学生万润南对我说：“你那三种负面倾向总结得很好。但是，真按你那三条，那就不应该批‘三家村’！”

但是，一切都还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分辨正确与错误，一场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 晴天霹雳，大疯狂开始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直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群众造在任领导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整个北京、中国开锅了！清华的形势，急转直下。眼看整个学校已经失控，不可收拾了，我就跑到党委，想讨点“指示”。领导都不在。只见到艾知生，面色凝重，一反常态，不愿讲话。离开党委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碰见几个、十几个，不，有二、三十个政治辅导员，都问我党委有什么部署。我已经蒙头转向，能说什么呢！

接着，学校在任各级领导干部及一些老师被造反群众抓去，游街，戴高帽，批斗，打人。清华顿时陷入了丧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红色恐怖”之中。

我是典型的“清华牌”干部，特点是“听话、出活儿”。在我们的思想里，党和毛主席永远是光荣、正确的，永远不会有错的。毛主席说谁“反党”，我们就打倒谁！我这个人还算是有一点独立思考的，以前历次运动，也曾经有一些怀疑，不理解，但总是能尽量跟上，尽量去理解。但是现在问题是不但承认我错了，而且要我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甚至要承认镇压学生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57年反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阳谋”！吓得我一身冷汗！后来再一想，对付敌人、反动派，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可是建筑系六百多学生中，定了23名“右派分子”，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我签字定案的，难道都是敌人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使我感到内疚和不安。现在，我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天哪！这怎么可能呢！

说我错了，我想不通，但是还要拼命去想。一身晦气散发不出，于是全身起了许多疙瘩，两个多月以后，才逐渐退去。但直至今天，还留有一些疤痕。

当时，到处抓干部、教师去游街，还要拼命去“理解”，这样反人性的现象怎能去理解呢？

我们同一教工宿舍有位老师，他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因为看我工作忙，就要我每天把一个暖水瓶放在门口，她老人家每天上午给我灌满开水，以便我中午一到家就有热水喝！这大概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这时，另一位教师在楼梯口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是剥削阶级思想作风，让老人家给自己打水！那天，我早晨离家时看到大字报，急忙回去收起暖瓶。中午，老人家提着一壶开水敲我的门，流着眼泪说：“罗老师，不要紧，我不怕，你还是把暖瓶拿出来，或者早晨拿到我的房间，中午再拿回来。”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连忙再三鞠躬，但说不出话。我说什么呢？写大字报的老师和我在一个系统工作的，人也很好。可是，这个世界已经混乱了。我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夫妻、朋友、师生、父子、祖孙反目为仇，互相揭发批判。甚至打死老师、校长的事，每天都有所听闻。一壶水，算得了什么呢？老人家现在大概不在人世了，但她那慈祥、纯朴、悲哀的眼神，我永远不能忘怀。

##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以前学毛选，看其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没有“联系实际”，也没有切身体会，所以并没有在意。现在到处都是游街示众、抄家打人等反人性的、暴力的、恐怖的行为，心想不知这些东西是哪里出来的。等到被“革命群众”强制性再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才知道都是从这里学来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对这个《考察报告》说个“不”字。所以有人说，再有风吹草动，年轻人还会以这个《考察报告》为理论武器，“活学活用”，横冲直撞，彻底砸烂前进道路中碰到的一切！

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大约在6月4日以后，就失去自由了。每日就等待着群众“提审”、批判、游街、示众。接下去又组成劳改队，凌晨四点起身去扫马路，白天在校园里拔草，晚上修大字报棚。不准去看大字报，或参加群众大会，因此对运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也不想知。

7月底或8月初，全体劳改队人员集中到东大操场。太阳很毒，晒得烫人。我们上午拔草已经很累。一个据说是化工系的小伙子，长得有点像日本人。有人小声说：“皇军的，要训话”。他下令我们跪在发烫的煤渣地上，训了半个多小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一次随着许多教师干部参观200号的反应堆，看见这个学生。他一见我们就向后倒退，几乎跌到。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他很紧张。200号的团委书记说：“这个人还不错，工作积极肯干。”我只说一句：“不知他对在东大操场上罚几百个教师、干部跪在太阳下有没有点认识，希望不要轻易忘掉。”

8月24下午，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传闻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被剃阴阳头。工字厅的干部们听了，个个紧张起来。剃光头还怕，剃阴阳头怎么办？我赶紧跑回宣传部办公室，这里的“革命群众”跟我关系较好，我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帮我搞个光头，以免弄个阴阳头。结果，我躲过了这一劫。

晚饭后，通知劳改队集合到二校门劳动。我们马上整队，带上黑帮牌子。这牌子是我先按“革命群众”的要求做了我自己的，大家认为我做得好。还有人说：“还是建筑系的会设计。”结果由我给工字厅劳改队的每个人做了一个。到二校门一看，目瞪口呆。原来二校门已被汽车和拖拉机拉倒，这个清华的象征之一的建筑物已变成一片废墟。像照片上的雅典卫城，也像英法联军破坏过的圆明园。但是，现在破坏者正是清华学子，这

情景让我们心寒。

还没有缓过神来，周围好几个人已经在下命令了：“快搬！”“搬到机械厂旁边的建筑垃圾堆去！”抬头一看，周围都是围观的群众。从二校门到机械厂旁的垃圾堆，由两边围观的人墙形成一条通道，我们这些“劳改犯”就要双手搬垃圾通过这条大约200米长的通道。每次搬运估计要50斤以上的垃圾，少了就要挨打。两边的人手执木棍或带刺的树枝，搬少了或走慢了，两边的棍棒树枝就会劈头盖脑地打下来。走到一半时，手指和手臂已麻痹没知觉了。垃圾掉落地上，又是一顿打。我想抬头看看打人的都是什么人？大部分不像是清华的人，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无组织的人群是最可怕的，他们没有任何约束，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法不洽众”，即便打死人，还要喊“好得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每当我想抬头看看周围的人群时，立即有几根棍子打下来。“看什么看！快干活儿！”但是我还是能认出，这疯狂的人当中，有几个清华的人，他们甚至能叫出“劳改犯”的名字：“XXX，你也有今天，快走！”我不想记住这些人。以后，我也曾经见到过这些人，他们像没事似的。

干了大约两个小时，已是精疲力竭。人们常说“汗流浹背”，而我们汗水都流完了。每次搬运那200米距离中，砖石块要有四、五次掉在地上，我宁愿挨打，也没有气力多搬了。这时，一位平日带我们“劳改队”拔草、扫地的学校园林队的师傅站在废墟上高声大叫：“工字厅的干部们，马上在校卫队前集合，快！”校卫队就在二校门的西侧。这位师傅平时慈眉善目，现在也凶起来。集合好以后他立即带我们这些“劳改犯”离开二校门现场。到工字厅前停下来，他又恢复了和善的面孔：“赶快解散，回家休息！”我们才松一口气，原来他是把我们“捞出来”。这也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救命恩人哪！队伍解散了，我们有三、四个人晚走一步，对这位师傅说：“谢谢你，师傅！”他说：“别谢我，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们的，快回家休息吧！”

我回到家。刚从绵阳分校回来没几天的妻子梁鸿文一直在家里提心吊胆地在等我。我一进门就瘫坐在床上说：“差点见不着啦！”

我们哪里知道，更大的灾难已经临头了！

## 恐怖之夜、血洗清华园

8月24日晚上，也许已到次日凌晨了，经过全天超强的惩罚性劳动以后，满身灰土，既没有去洗，也没有躺下，只是呆坐在床上。这时，鸿文忽然惊叫：“听！”远处，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逐渐接近我们住的荷花池一宿舍。“拿起笔，做刀枪。团结起来打黑帮……杀！杀！杀！”鸿文全身颤抖，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说“别紧张。”她说：“怎么办哪？”这时，那支恐怖的队伍已来到窗下，只听得下面大喊：“黑帮分子，出来！接受人民群众的批判！”同时，已经有人将一楼的几个教师和干部拉出来，在外面用皮带抽打。

我住在荷花池一宿舍的二楼西头第二个房间。有几个人从西头的楼梯上来了，一个声音像是向导。经过我的房门时，说：“这里有一个”，又向前走，“这里一个”……。接着，房门被踹开了。我想安慰鸿文一下，但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两三个人拉出去了。鸿文见我穿了件背心，拿了件衣服给我，被他们一把推了回去。我看了看，几个人都不认识，看来像清华附中的学生。那个向导则不见其人，他一定是大学的，因为他对我们宿舍的情况一清二楚。我被抓到门外，有两个人在两边挟持着我，按我跪在地下。接着不知道有多少根皮带劈头盖脑地抽打过来。他们嘴里还骂着，好像是说要报仇。要命的是有一根皮带是用有皮带扣的一端来抽。我尽量低下头，避免抽到眼睛。后来我听说，蒋南翔的秘书邵斌就是在乱军之中，被皮带扣抽中一只眼睛而导致失明的。我没有被抽中眼睛和脸部，但头上多处被抽打流血，痛得忍不住叫起来，引来更多更狠的抽打。“让你喊！”打到队伍快过完了的时候，我被拉起来，推向游行队伍。必须弯腰90°并低头，走慢了或跌倒了都会遭到一顿抽打。这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问我：“张慕津哪里去了？”我没法看到此人的面孔，只是回答说：“不知道。”张慕津是团委书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黑帮分子”！

这支队伍走过了工字厅，在第二教室楼向北转向大礼堂。根据声音判断，这里人声嘈杂，一定很多人。我们这个黑帮队伍，大概有五、六十人，全部被带到阶梯教室，在讲台一面从南到北跪了两排。我在靠南第一排第七、八个。这时一个大嗓门喊起来：“黑帮分子你们听着，今天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被地主老财坏分子杀了。现在，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你们搞阶级报复，我们也要还给你们阶级报复，

我们要报仇。你们这些黑帮分子，必须得到报应！”我看不清此人的长相，但听其声一定是非常恐怖的恶相。说完，此人就从北到南，向跪在水泥地上的每个“黑帮”抽一皮带。我也挨了一下。但比起刚才的抽打，这就不算什么了。

在阶梯教室跪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被带到隔壁的科学馆二楼，分别跪在走廊两边。我跪在“审讯室”门口。每隔十来分钟，就要换一个“黑帮分子”带进审讯室。问什么话我听不清楚，也无心去听。问一会就抽打。皮带下的呻吟声是真实的，不是演电影。

一个声音嚷道：“捉到张慕津了。”原来张慕津和我住同一宿舍也住二楼，我在西头，他靠东。抓“黑帮”的队伍在外面喊“黑帮分子，下来”时，有人就从西边楼梯上来了，他就从东边楼梯下楼，藏在一片绿篱后面。等队伍过去一会，他又回家了。没想到这些“革命群众”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抓到了他。我估计是有人带路的。

几个人把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一个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爬到你们每个人面前。他就要说：‘XXX，我来找你了。’你就要回答，‘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听见没有？来，试一遍。我当张慕津。XXX我来找你了。”于是大家咕哝着说：“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不行！声音太小，重来！”又试了两次。我很为难，因为我就在审讯室门口。他第一个肯定会爬到我面前。我必须第一个当丑剧演员，第一个当众侮辱我自己，侮辱自己的同事。

可是没办法，门开了，张慕津爬了出来，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表演”了一次。这时我看到，张慕津已经被剃了一个阴阳头！

张慕津沿着走廊爬过去。我没有心思听这些没有人性的“表演”。我在想，这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啦？我们是敌人吗？即使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真是敌人，那么现在当了俘虏，也不该虐待俘虏，侮辱俘虏人格。

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出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使劲！”我心理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

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

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15公分，不能超过20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像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像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前面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势，已经把头顶在地上，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虽然贺鹏飞是当日“红色恐怖”行动的指挥者之一，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也许，大家对贺龙元帅的冤死十分同情，不愿再提他儿子的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快当了少将，病故时已是中将。

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又把我们这批“劳改犯”转移到生物馆，要求天亮以前转移过去，不许有声音。天亮以后，先安排校医院的医生护士给我们这些人上药。校医院的护士小杨见到我大声惊呼：“唉呀！怎么打成这样！”他们上药的时候，手直发抖。我只穿了件背心，成了件血衣，身上多处打伤。可我看不见头上的伤。后来我照镜子才知道，头上多处有血块，脸上也有伤，所幸不在要害处。

排好位置，我左边是1号钱伟长教授。我是2号。3号是建筑系党委书记刘小石，4号行政处长李思问……。排好以后，我们都坐在光板地上。这时来了许多人，每个“黑帮”有三个人押着，回家去拿铺盖、梳洗用具和换洗的衣服。看样子，在这里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我走在三个押送我的人的前面。我家离生物馆很近。在路上，其中一个人轻声对我讲，“我们是力学系的，我们认识你。他们不应该这样打你们。”我无言以对。

到我家门口，他们敲了门。鸿文正在房内，开门看到我，一脸惊恐！押送的学生说：“梁老师，别紧张，你们有十分钟。”不知为什么，他们认识鸿文。说完就退出去并轻声关好门。经过昨晚“恐怖之夜”后，他们的举动让我们感到一些温暖。鸿文两眼发直，但含着眼泪。几分钟之后，才说出一句话：“你伤得重不重？有没有内伤？”我告诉她，都是皮肉伤，没有内伤。我觉得她一个女人家，碰到这种情况，真是很难面对。这都因我而起，我实在感到歉疚。以后整个十年大动乱中，由于各种原因和机缘，我多次被整肃、绑架、关押。这种让家人因我而感到不安、无助、恐怖甚至丧命的歉疚的心情，一直纠缠着我，比我自己挨打，受刑讯逼供更加难过。我宁愿皮肉受苦，甚至伤筋动骨，也不愿受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十分钟后，我估计实际上不只十分钟，我被带回生物馆。大家将褥垫铺在水泥地上，坐在地铺上等待。这时肚子饿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虽然只是馒头加一块咸菜，但饥肠辘辘的我们，老远就闻到馒头的香味。可是接下来的事，使我们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我宁愿不吃了。

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XXX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像是化学工程系的。以后化工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他是个山西人，乡土口音非常重。他说“王八蛋”时，口音像“王八党”。这个学生忽然有所发现说：“他有创造性，他说王八党，你们要学他，都说王八党。”这时，几十个共产党党员都低下头，沉默抗议。我实在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这不合适。”这个学生扭头瞪了我一眼。我也不眨眼地看着他。几秒钟的对视，我发现他的眼神在变化，变得柔和一些了。我听出他的声音也柔和了一些，不知别人是否听得出来：“那就还王八蛋吧！”

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这时，我听到门口嘈杂吵闹，不知是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因为第二个被叫到审讯室的不是我，还有时间和钱先生说两句话。钱先生说：“门口一些人在闹，要求把‘黑帮’交出去给群众处置。这里的看守说，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交出去。”钱先生说：“那些无组织的‘群众’，可能情况更糟，更危险，我宁愿关在这里了。”

不知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审讯室里放着一张凳子，其中一个大汉叫我坐下。马楠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然后拿了本毛选第一卷，叫我读几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

当时我们大多数“黑帮”都可以背下来的。念了几段，马楠说：“我问你，你说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当然回答“好得很”。“你真是这样想的？”我说：“是”。突然，马楠问：“你认识蒯大富？”我答“我知道他。”马楠说：“听说你早就认识他，还查过那个‘蒯’字。”我说：“我小时看三国演义时就查过这个字，不是早就认识他。”我又把1964年到部队当兵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我心想：我今天见识到的马楠，没有传说中那么凶恶。另外他的问话说明，他了解我带队当兵时的情况。时间不长，马楠就放我出来了。

## 左右夹攻，两面不是人

马楠“将军”审问我时，提到蒯大富。其实，早就有好多起“提审”的主题，就是蒯大富。

开始时，比较多的“提审”是追问我和蒯大富的关系。有的态度很好，讲道理。有的态度恶劣，甚至粗口谩骂。他们追问我的一个根据，就是我当兵时就说过“我早就认识他”。然后，一直关心照顾他、培养他。我屡次解释，我从来没有说过“早就认识他”；我只说过，我早就查过那个蒯字，是因为看《三国演义》里面荆州刘表下面，有个人姓蒯，如此而已。我比他大十岁，他63年入学，我怎么会“早就认识他”？一般经我解释后，这些人就语塞了。但是后来有两起提到“艾知生为什么选蒯大富作为学习‘九评’的典型？”还有一起提到《人民画报》，我有点莫名其妙。但在工作组撤走以前，工作组的人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到《人民画报》，搞得我一头雾水。

大约是在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文工团的一个政治辅导员赵燕秦冒着很大的危险找到我，向我通报了一个情况：“工作组查到1963年的一期《人民画报》，封面上有清华大学1963年入学新生座谈会的照片，其中有蒯大富。你是负责对外宣传的，那么这照片必经你手。联系到当兵、广播台、学习‘九评’、批三家村，你自己讲过，艾知生叫你注意培养这个人，说是能说善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所以工作组逐渐形成一个看法：蒯大富是前党委留下的一根反工作组的钉子。这根钉子与前党委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你罗某人了！”这话虽不是事实，但拨开了我那一头雾水。以后，我就知道如何小心应对了。赵燕秦同志许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必须写下

这一段。虽然我们经过残暴的迫害，血腥的“群众专政”，但是，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仍然有许多人性的关爱和不顾个人安危以救助他人的同志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工作组撤走了。听说蒯大富平反翻案了，恢复了自由。我以为，那个捕风捉影的“钉子公案”可以休矣。然而，正好相反，这时又换了一批人来“提审”，态度更凶恶。不过，我已大体上明白了他们的疑点和意图。这些人多是同情和支持蒯大富，并且反对工作组的。他们认为，是前常委会和工作组沆瀣一气，抛出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以成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而前党委和工作组的联系，又是通过我罗某人了。后来许多情况证实了我的想法。虽然，这一段历史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了，但在蒯大富们的潜意识里，可能还埋藏着对党委及党员干部尤其是对我本人的一些“恨意”，直至引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这一清华园里的一大冤案吧。

从工作组开进清华园，到蒯大富翻身掌权这一段的历史，常常被忽视，甚至有意的遗忘掉。好像清华园在大动乱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坏，所有的一系列的血腥暴行，都源于蒯大富。这是不公平的。打砸抢烧杀，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深受其害，我们记忆犹新。

四人帮倒台以后，清华清理“文革”中抄家物资的小组通知我们去认领自己的东西，我没有去。有人去了，回来告诉我，别去了，去了更失望和生气。经过抄家，又经过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搞的一次“分浮财”，即把抄来的东西打了个低价，让“革命群众”——很可能就是抄家的人——买走了。因此我不去认领。最后清理小组给我退回一个皮箱。因为打不开锁，所以用刀把箱子割开，东西全拿走了。因为丢下有我的一两张照片，所以退还给我。我的全部衣物被洗劫一空。多年以后，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时，有位工人告诉我：他所在连队有个工人，床上铺的盖的都是抄我家得到的，其中现在铺在床上的一幅油光油亮的籐制凉席就是我家的。他是北方人，怎会有这种南方的东西呢？我也没有去“认”。

这些，都是在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时出现的事，不应由他负责。即使有些是蒯大富掌权时代发生的，我认为前面的这些“红色恐怖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的只是前面的延续。根子缘起都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否适合湖南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拿来套在今日的城市和高等学校，则肯

定是错的，即机会主义的，所以必然要受到惩罚。请注意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恐怖行动，其理论、路线、政策的根据都在这份报告里。以我自己来说，“反右”时我执行了“左”的扩大化的政策，我对建筑系学生中划的23名右派负有一定责任，我应该受到后来这些“红色恐怖”的冲击，也就是惩罚。但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谁又来惩罚无政府主义呢？这样惩罚来，惩罚去，中国就一定不能平静，要七、八年来一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体现的就是这一斗争哲学，是一切动乱的总根子，现在根子还没有挖出来，没有得到批判和惩罚。希望不会永远得不到惩罚。领袖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如果领袖犯错误得不到应有的纠正或惩罚，那么就会使整个民族和国家遭受灾难。这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我们常说日本人不认错，还修改历史，以误导国民，这的确可憎可恨。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就可以忽略某一阶段的历史，隐瞒历史吗？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阶段历史时，内心就会有不可抑制的伤痛。希望历史永不再重演。

# 昙花一现八百年

——1966年10月至1968年底清华的文革动乱

一提起清华的“文革岁月”，人们就一定会想起蒯大富，自然也就想起清华园的“百日武斗”。其实，文革十年，蒯大富在清华掌权只不过两年多，大约八百年。但是，不仅在清华园，在全国，他都是很有影响的角色。他是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是出头露面的急先锋。也许到文革晚期，我们大家和他自己才明白，他只不过是被利用来冲锋陷阵、搅乱政局、打击既定目标的马前卒和最后承担罪责的替罪羊而已。

美国作家韩丁先生写了一本著作《百日战争》，主要是记述从1968年4月23日电机馆攻防战开始，到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为止的一百天中，发生在清华的“团”与“414”两派的斗争。其实，“武斗”，或者“战争”，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总会有前因后果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需要有发生的土壤和气候。这一点，韩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讲，至少并没有讲清楚。但是他的这本著作却是第一本描写清华文革的著作，贡献是重要的。如果说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讲，或没有讲清楚，那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时机不成熟，或政治气候不允许。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时机成熟了吗？政治气候允许了吗？我认为，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华园的大混乱，罪魁祸首是谁？难道是蒯大富吗？

1980年暑假，我奉命到中央党校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亲自送我去报到。他的夫人汪琼是我所在学习班的班主任。他家就在中央党校大院内。一天，我去拜访两位老人家，刚好看到刘达在家门口发脾气。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两部车，一位副局长来请刘达在正式逮捕蒯大富的逮捕证上签字。刘达大骂吴德：“你市长不签，哪有叫我当校长的签逮捕证的，我不签！”公安局的人说，吴德讲了，逮捕蒯大富是邓小平的指示，您回来传达的，我们没有见到文件或邓小平的手令，只好请您签字。刘达想了想说：“这点事都不敢担当，还当什么市

长！签就签吧！”

两年之后，刚好我又去刘达家里请示工作，刘达的秘书王乐铭与我同去的。正好又见到刘达接个电话在大发脾气。说蒯大富被判了十七年徒刑，但是法院要从1970年算起。1970年，蒯大富被送到北京西郊东方红炼油厂隔离审查，跟班劳动，不许离厂。刘达说：“他有啤酒喝，有鸡蛋吃，他是在休养，哪里是审查？正式逮捕令是我签的，应该从1980年正式逮捕时算起。十七年太少了。我认为应该让他们过了六十岁才出来。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的能量是很大的。他们出狱之后，很快就能上去，我们还得倒霉！”

这时，王乐铭说：“刘达同志，就按法院的意见办吧。”我接着说：“1970年以后，他到底是没有自由了，不能随便走动，也是受到惩罚了。”刘达满脸怒气，正言厉色地说：“人说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你罗征启疮疤还没好就忘了疼，我就不同意你把杀死你弟弟的那个学生放了。我正好出国不在家，我如果在，我就不同意你这样做。我再说一遍，他们是一群疯子，搞乱了我们国家，不能宽恕他们！”我看着刘达，慢慢地说：“刘达同志，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共产党，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又是谁给搞乱的，是蒯大富吗？他有那么大能量吗？”刘达一时语塞，瞪着我半天不说话。过了一会，刘达似乎气已消释。

过了一会，法院的车到了。刘达没说什么，不声不响地签了字。

于是，蒯大富和少数几个有血债的学生被定了罪，判了刑。似乎，至少清华园那段历史已经解决了，可以画上个句号了，实则未必。武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两派的政治和武斗是什么政治的继续？表面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都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两派都叫井冈山，都“打倒刘少奇”，都反对“二月逆流”，都“批林批孔”。伟大领袖指到哪里，两派就立即打到哪里。两派都抓人，从冷兵器到热武器都用。似乎分歧只是到了7月27日，一派用长矛步枪、手榴弹镇压手无寸铁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员，而另一派则立即缴枪，拆除工事，听从救命恩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指挥和安排。难道“7·27”两派截然不同的表现，就不是政治的继续了吗？这是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一定要解答的问题。

## 没有历史，何以为鉴

首先，我要说明，虽然在清华文革混乱的十年里，我处在“风口浪尖”上，几起几伏，大起大落，侥幸活下来。与我有关联或直接因我的牵连而死的就有好几个人。但由于我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一鳞半爪，并不了解全面的情况，手头上也无任何资料可查。我看到现在有许多人在写“回忆录”、“纪实”、“亲历记”等等。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日记、札记、照片，查阅当年的报刊、文件或私人的笔记，整理出大本大本的“大事记”。我敬佩和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他们提供的资料，使得我可以查阅核对，找回我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可能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段历史留下。如果整个民族失忆了，或者连我们这些当时人、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点亲身经历的记录，那么后人又何以鉴呢？

文革中，我在清华的“家”（其实就是宿舍——荷花池第一宿舍）和我父母在北京的家，都多次被抄。最后，我所有的书籍、信件、手稿、文件、照片等等几乎全部被一扫光。甚至把我和妻子的通信也抄成大字报张贴示众！这实在难以容忍。当时我曾经发誓：今后再也不写笔记、日记，不留任何个人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的蛛丝马迹。于是，今天我就只能靠记忆。这样当然就难免有不准确。

比如说，蒯大富的人到北京站我父母的家中绑架我的日子。现在，所有的记载都说是1月30日，称为“1·30”事件。直到最后，我自己在回忆此事时，也还说是“1·30”。我们全家人都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年三十。我记得我带女儿回到我父母的家，我母亲问：“回来干什么，有没有危险呀！”我说：“年三十越南和美军都停战呢，我们打派仗不至于比越南前线还紧张吧！”然而，我的“专案组”负责人孙耘却说那天是年初一，他正在天津，接到通知，说抓到罗征启了。我查对过日历，的确是年初一。

又如我自三堡疗养所成功跳楼越狱之事，我的记忆一直是3月27日凌晨。在原蜀育、邱心伟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上说：“3月27日……凌晨，罗征启不堪受折磨，跳楼逃出关押点三堡……。”但我仔细排演当日的细节，发现从我逃出三堡到被解救回到科学馆这中间少了一天。可能正确的时间是3月27日深夜，即3月28日凌晨。

陆小宝同学为唐金鹤同学的《倒下的英才》所作的序，写得非常好。

他认为唐金鹤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事事都得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可臆造发挥。他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真实的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赋有历史的意义。”这讲得很好。但是我得补充一句：“事实”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

同一事物我从左边看，它偏右，你从右边看，它偏左，都是事实。但是个人感觉，可能不同。你我一起都从正中看，它不偏了。但是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面，那另一面如何？不知道。因此，我们不能说，我是绝对真实的。比如在已完稿并印刷出版的一些“纪实”、“大事记”等等，总的说来，都是“真实”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工程师之作。但是我看到关于我本人的一些文字，则尚有错漏缺失。

所以，我决定不写“回忆录”，不写“历史实录”。尤其不去挑别人的错，去辩论谁是谁非，谁不真实，或谁更真实。工程学和社会学的“真实”是很不同的。工程师们为社会学的一些问题争论，其实大可不必。用工程师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上发生的事和变化，常常是看不清的，因为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我只想记下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思考、胡思乱想、甚至是我的梦幻，我肯定是负责的。但有些细节，如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有关联的人物等等，则未必都非常准确。我会认真听取所有的批评，但我不解释、不辩论，有错一定核实改正。欢迎大家批评、斧正。

## 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1966年7月，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发全国开始大乱之后，他却“才饮长沙水”，又到武汉“食武昌鱼”，在“畅游长江”之前（即1966年7月8日），从武汉给正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信。尽管现在一些知情人认定，这封信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代笔，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文风，是他认可的，以他的名义下发的。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隐晦，意图深不可测，似乎透露了他关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又是一场阴谋，非常恐怖。但这封信的内容是很久以后才公诸于众的。

信中关于北大、清华的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这就像布的一道咒语，把北大、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套牢了，把清华、北大十年大混乱的整体轮廓描绘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在“伟

大领袖”的掌控之中。

当时，我们只知道，十多年来，清华由蒋南翔领导的党委，苦心经营，建成一部“不漏气的发动机”。清华一直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牢不可破的堡垒。确实是“盘根错节”的。但是1966年6月的两篇社论，一篇大字报，一个工作组，堡垒就“顷刻瓦解”了。

“蒋南翔党委”瓦解之后，以王光美为主的工作组，又带着一些高干子弟在清华掌了几天权。还没来得及“盘”、“错”好，就顷刻瓦解了。然后经过短期的争论混战，蒯大富夺权上台。前党委已经“彻底砸烂”了，蒯大富又“盘根错节”起来。清华园经过百日武斗，用了真刀、真枪、真炸药。到7·27两三天功夫，蒯大富又顷刻瓦解了。

然后，迟群、谢静宣又盘根错节起来。他们也和蒯大富一样，都有毛泽东的公开和半公开的支持。他们手中有圣旨、圣谕，有芒果、也有上方宝剑，连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本人都“盘”、“错”在其中，但还是“顷刻瓦解”了。毛泽东布的这个咒语，在他弃世之后，才被解开扔掉了。

不仅清华园里的厮杀争战，而且全国范围的大混乱，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似乎都定了调子：“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全国各地，两派都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冲锋陷阵，拼死搏斗。他们受伤了，残废了或死掉了，他们能叫烈士吗？他们打赢了，或者顶住了，没垮下来，又能叫胜利者吗？要盘根错节，还要顷刻瓦解，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不正是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真实写照吗？

## 红卫兵“勤王”乱政，蒯大富趁乱夺权

这是一出悲剧，一出闹剧，也是一出荒诞的恶作剧。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如果他还在世，他会说什么呢？恐怕仍会像57年错划这么多右派分子，59、60、61年饿死四千多万人那样，说成是：成绩是主要的，斗争是必要的、及时的，形势是大好的等“三七开”之类的话。但是，我们从他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来看，还是端倪可见的。尤其他给江青的那封信，意图更加明显。

在清华园，工作组“顷刻瓦解”了。由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组成的临时

革委会，也不声不响地烟消云散了。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这时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北京天安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接见百万红卫兵的闹剧。

“破四旧”造成的大破坏刚闭幕，又换演“大串联”造成的大浪费。

清华园内每日接待数以千计各地来京的串联群众。刚刚建好尚未正式启用的主楼，开放接待红卫兵。霎时间主楼的门、窗、五金件等被盗拆一空。作为原校领导办公用的工字厅，也开放接待。当时工字厅没有暖气，只烧煤炉。我们这些“黑帮劳改队”，都被分配去管理烧煤炉。要二十四小时保持旺火，保证室内温度高过二十度，要使睡在水泥地上的“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感到舒适温暖。夜里要加三次煤，“黑帮劳改队”要日夜排班保证供暖。

我们看见这些“毛主席的客人”真是大丰收，有的人走时竟用枕头套当口袋，装走两三袋馒头。

我的妻子梁鸿文和建筑系一位教师一起被分配在主楼接待站服务。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时间问我，你知道“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吗？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正想到这个故事。我估计鸿文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她一定是从建筑系老师那里听来的，更不会理解谈论这故事的危险性。我对她说：“你注意点，这事千万不要再说了，别人说的就当没听见，别答，走开好了。”她追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章回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第二回讲的故事，题目是“幽王烽火戏诸侯”。

她还追问是怎么回事，我于是告诉她，西周末代君王是周幽王，非常宠爱一个褒国的女子。姓姒，史书称褒姒。但是这个女子从来不笑。幽王于是悬赏，有能使褒姒笑的人，定受重赏。有个大臣就出了个馊主意：让幽王下令击鼓举烽火。诸侯听鼓声见烽火，以为王室有难，纷纷驰兵来救（这在古时候叫“勤王”）。到了都城，不见有敌寇入侵，只见幽王与褒姒正在城楼上饮酒作乐，诸侯才知道受骗上当，而褒姒果然笑了。后来西戎真的入侵时，虽然多次击鼓举烽火，诸侯都不来救，结果幽王人死国亡。

在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耸人听闻地说身边有个赫鲁晓夫，又让江青上台出镜的时候，谁议论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我知道清华有的师生就是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的。

可以不准大家讲，但是不可以不准大家想。几百万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到北京是为了观赏北京的名胜古迹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勤王”。因为“伟大领袖”击鼓举烽火，说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大家都是

来誓死捍卫领袖的。在北京，经过领袖接见，经历几百万人山呼万岁那震撼人的场面，加足了油，打足了气，回去好造反。于是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开国功臣，老干部，甚至被誉为领袖的亲密战友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个一个地被打倒了。

刘少奇是死定了。可谁来操刀？谁来开炮？谁当前锋？谁来喊出第一声“打倒刘少奇”？——蒯大富受命出场了。

将近四十年后的一天，我和唐伟等几个人陪同清华来的专门研究并在撰写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唐少杰老师一起与蒯大富座谈。我说：“老蒯，咱们今天不要老生常谈了，谈点我们不知道的，或者你没说过的。”老蒯一口答应。不知是谁提了个问题：“就说说到底是谁给你平反的，谁把你捧到学生领袖的位置上的？过去，我们听说和猜测的什么都有，有的说是中央文革，陈伯达，戚本禹，或者江青等等。但是都没有能解开一个谜团，就是你蒯大富哪里来的这么大胆子，横冲直撞，甚至连周总理都不在话下，难道……？”

蒯大富的回答语惊四座：“是毛主席，是主席叫周恩来到清华甲所单独和我谈的。……”

工作组通知他到甲所，说有人要找他谈话。等到半夜，只见来的是自己想也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周总理。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来找你谈话的……。”

接下去，工作组撤走了，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临时筹委会也散架了。蒯大富乘乱夺了清华大学的行政大权。接着，建立了井冈山兵团。兵团总部下令清华的党员到井冈山的总部去登记，遭到党员的抵制，没有结果。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搞了一个“12·25”行动，拉上几千人上街，在北京，也就是在全国，第一个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贴出了第一张点名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我曾问蒯大富，“12·25”行动，是不是有人叫你这么做的？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当时的情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不干，也会有别人出来干的。”我想，这是真的，这就叫“落实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吧！

## 两派争论始于“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

“彻底砸烂”是一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清华，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已经无可考证。但是，蒯大富无疑是个代表人物。他可把这个口号叫响了，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要彻底砸烂，所以引出两个估计，第一是建国后到文革前，我们的国家是红线主导的还是黑线主导的？第二是我们的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好的，还是大多数已经烂掉了？对于蒯大富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后者了。而且很明显，中央文革，乃至毛泽东本人，实际上都是支持和力行“彻底砸烂”的。最高领导虽没有明白地喊出这个口号，却放纵、利用这些红卫兵去冲冲杀杀、乱批乱斗，到一定时候（1968年7月27日）再来收拾这批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乱党乱国的罪责，却要这些年轻人来承担。

在清华，有几千人明确反对“彻底砸烂”（还有不少人不敢明确表态反对，但实际内心是倾向反对的），其代表人物和领袖就是沈如槐。

和蒯大富一样，沈如槐也来自苏北的贫困农村。能考上清华大学已很不易，现在能在文革乱军之中，举起大旗，成为清华，甚至全国的反对蒯大富的学生领袖人物，更是不简单了。我认为，沈如槐比蒯大富更精彩。这不是因为沈如槐是党员，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后台”，却能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到最后。甚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批评、不满，也没有能使沈如槐退缩或垮下来。在“7·27”蒯大富下令开枪，武装抗拒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清华制止武斗之后，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和批评五大学生领袖时，还不忘记捎带骂了立即交出武器、拆除工事的“414”几句。这样明显地偏心和拉一派打一派，可以想象给沈如槐造成的压力有多么大。

文革之后，我和一些“414”的战友，时时回顾在那十年大动乱中，蒯大富有强硬的后台，可以有恃无恐，走错了路，而沈如槐没有后台，却成就为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的学生领袖人物，真不容易啊！

一九六七年，当“彻底砸烂”甚嚣尘上的时候，沈如槐贴了一张大字报，反驳“彻底砸烂”论。题目是《什么‘彻底砸烂’？》大字报一出，各种议论都来了。即使“414”内部，也不尽一致。有人说，这题目不醒目，不针锋相对。当时我曾和原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原党办副主任饶慰慈一起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命题非常聪明睿智：第一，不应当和“彻

底砸烂”论针锋相对。“砸烂”的对立面是“保护”，这样就自投“保皇”的陷阱了。第二，在当时的辩论中，反对“彻底砸烂”的论据是红线主导，而把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三面红旗”等都说是“红线”，这在当时我们心中疑虑甚多。第三，“彻底砸烂”这个杀气腾腾的口号，明显是倾向于暴力的，这也是“414”所反对的。然而，用一个什么样的命题能够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涵盖进去呢？

沈如槐很聪明，用《什么‘彻底砸烂’？》为标题，问你蒯大富：你要砸烂什么，怎样砸，你的目标，你的方法，请你自己说清楚吧！

文学宓还告诉我，他曾参加过几次“414”总部的会议。（我们几个干部，除文学宓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以外，其他几人出身都不好，所以，我们都怕给“414”引来麻烦。因此都不出头露面，只推文学宓去参加“414”的活动。）他说沈如槐、汲鹏、宿长忠、陈楚三、孙怒涛等总部头头，都思想敏锐，品德好，敢于承担，讲话逻辑严密，很有煽动性，将来都是将帅之才。很可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荒诞的大革命中，虽然沈如槐和他的战友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方针和策略，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是终究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实，何止是“414”的这些头头，“团派”的头头们，哪个不是将帅之才呢？虽然现在大家都成熟了，但终究，时过境迁，都已年逾花甲，时不我待了。

六十年代反修防修学习时，有一条语录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无政府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谁又来惩罚它呢？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很彻底的，最后已经砸烂了他自己。这是惩罚吧？

## 《四一四思潮必胜》功不可没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长期争论之后，井冈山兵团总部终于渐渐分化，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工程化学系69届学生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骨干都是曾经反对工作组、受到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压制的学生。其核心战斗组是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及被称为“团派”、“老团儿”。另一派是以数力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的“414总部”，自称及被称为“老四”或“414”。

“团派”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很“牛”，是清华园的主流派，是掌权的、强势的和比较激进的一派。“414”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正式从井冈山兵团总部分裂出来的。但出自策略上的考虑，还叫井冈山兵团，不过改称“414总部”，是在野的、比较温和的一派。当时学校大部分党团干部和许多教师都是倾向或支持“414”的，我也支持“414”。

刚开始，两派争论是漫无头绪的，似乎只是权力之争，争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争将要成立的革委会的席位。不仅清华，看全国各地、各高等学校大都如此。有所谓“天派”、“地派”之争。实际上有些人自己也闹不清是哪一派的。北航“红旗”应该是“天派”的。第一把手韩爱晶经常同蒯大富争论，韩经常当众说他赞同“414”的许多观点。

但是逐渐地，清华的两派争论脱颖而出，演变并上升成有明确理论依据的思潮之争。“团派”那边的情况我不知道，“414”这边有许多干部群众已经在紧张地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寻找理论根据。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两位支持“414”的政治课教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汽6班学生周泉纓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四一四思潮必胜》（后简称《必胜》）。文章很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我请了李兆汉、万润南和孙敦恒三个人和我一起进行修改。

李兆汉是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思想敏捷，笔锋犀利，尤其善长写辩论文章。我在建筑系任团总支书记时，他是政治辅导员。后随我调到党委宣传部，一直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是同事、战友。

万润南是建工系给0的学生，文艺社团集中住宿的文艺社的成员。文艺社的支部书记印甫盛有时会带万润南去我家闲聊，我们叫他“阿南”。1965年0字班学生到部队当兵，又是我带队，当政委。团长及排以上干部正职由部队派干部担任，副职由校方派人担任。团长给我派了个勤务兵，刚好就派了阿南。我问他“谁派你来的？”他说，“报告首长，我们排长派我来的。”“派你来干什么？”他微笑着答“报告首长，排长说，第一，当好首长的通讯员；第二，给首长打洗脚水；第三，……”当兵返校后，文艺社团党支部组织委员找我商量，让我当阿南的入党介绍人，我同意了。经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后，按规定介绍人要跟入党对象正式谈话，这

就引出了万润南在他的《清华岁月》里讲到的：我约他到我的宿舍去谈话。他说我并没有讲什么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只是放了一曲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用唱片当伴奏，拉了一段小提琴。这次入党谈话，只是启蒙了对莫扎特的音乐的欣赏和理解。后来，有一次他打长途电话来祝贺节日，我说：“你也太过份了，入党谈话怎么可能一点共产主义的大道理都没讲，只拉了段小提琴？难怪有人看了你这段回忆对我说，你可能本来就是个另类的党员，开除你出党是迟早的事。”他大笑说：“我确实只记得那段音乐了。要不这样，罗老师，你说你当时讲了什么大道理？”我只好挂免战牌了。

他们是我的学生，非常尊敬我。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荒唐迷乱的十年当中，有许多问题，由于过去的经历，我曾陷入极度的迷惘混乱之中，是他们——不只是他们两人，还有许多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开导”了我。当然，他们两人是离我最近，对我最了解，使我得益最多的学生。他们两个，老印是咄咄逼人，思维敏捷，逻辑缜密。阿南则是文笔轻松，但又有足够的份量，而且藏锋不露，幽默潇洒。老印的特点是想人所不敢想，说人所不敢说。而阿南则是，想人所没有想，说人所没有说。我没有见他们两人争论过，我记得他们也没有跟我争论过。这次我叫阿南来帮我写东西，肯定也请过老印。但为何这次就没有老印，我记不得其中的细节了。

孙敦恒是校刊的编辑、政治课的教师。他不大讲话，但是如有不同意见，他会直率、中肯地提出来，是个忠实可靠的第一读者。

就这样，四条汉子开始修改《必胜》，地点是在学生宿舍一号楼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第一次修改讨论会，作者周泉纓也参加了。但他主要是听，很少说话。

我们很快研究了《必胜》这篇文章，并取得共识：认为这篇文章的确有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章通过对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的分歧与清华的“团派”和“414”的分歧的分析，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一定是中央内部矛盾的反映，与中央内部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学和社会上这样混乱，中央决不可能平静。但中央的极左派不敢挑明自己的观点和公开暴露自己的面目，而让蒯大富出面。蒯大富只是个傀儡，将来是要倒霉的。文章应该针对蒯大富的“彻底砸烂”理论。这是有清华

和蒯大富特点的理论。周泉纓说，中央文革是个大杂烩，他们拿不出或者不敢亮出像样的、系统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还需要我们在和蒯大富的论战中厘定、说清楚。

第二，文章认为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都在表演，百家争鸣，争论很激烈，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将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和支持。而另一种是以“414”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处境很困难。这样，就把清华及全国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了思潮甚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这一层次上了。这也是《必胜》这篇文章的一大功劳。

第三，文章还指出：“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以至于最高领袖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有可能取得一时的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掌权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批判《必胜》关于“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要害”。

其实，经过和周泉纓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词，就是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因此，虽然《必胜》文中并没有明写，但毛泽东和张春桥多次说：《必胜》“是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们是很很敏感的。

然而，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但他始终没有把“414思潮”定性为“反动思潮”，使得“414”能存活下来，没有垮掉。为什么是这样，这始终是“414”人的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还决定，文章在修改时应尽量保留原文的大框架，不要改动太多。原文的风格也尽量保存。原文共分四大段。我们分了工，阿南一段，李兆汉一段，我两段。李还负责找有关的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我还负责研究和处理那些太露骨、容易让对方抓住小辫子及易引起中间群众动摇不安的文字和内容。规定了交稿时间，最后由我统筹修改。

后来，李兆汉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语录，作为文章的理论依据，增加

了理论色彩。阿南偷懒，说是都交给我统一改好，需要的话他再上手。

周泉纓很急，我们刚把稿子顺了一遍，他就拿走了，当晚就请文工团的几位干部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

几天之后，《必胜》被“团派”大批特批，上纲越来越高。尤其是他们知道毛泽东也批判这张大字报之后，特别高兴。传出消息说，“团派”要抓周泉纓和他后面的黑手。最滑稽的是江青可能看不懂《必胜》，就骂周泉纓是“小丑”。从此，周泉纓就得了一个绰号“小丑”（不仅“团派”叫，“414”派也叫）。我们有时还开玩笑，说江青是他的“教母”。

一天，周泉纓请我们几个改稿子和抄大字报的人，一起到二号楼二楼一个大房间开会。他说，“‘老团’扬言要抓人，我正希望他们抓我，事情越闹大越好。”我看，周泉纓完全处在一种亢奋状态。还说“毛主席都看了《必胜》，这说明这篇文章的份量。”然后他“郑重宣布”：“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你们是教师、党员、干部。今后，一概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那神气，就像要上刑场就义似的。当晚，他又带我到新水利馆三楼一个小房间，里面挤满了人，门外还站了不少人。周泉纓说，这是“东方红战团”正在开会，讨论《必胜》，希望取得一致的意见。他说：“你看见坐在门口那张桌子旁的那个大大个子吗？”我点头表示看见。他严肃地说：“这个人很好。如果我被捕，他就是我的接班人！”接什么班，他并没有说。不过，那的确是个忠实可靠、精明强悍的青年，他的笔头很快，而且一边写，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辩论口才也很好。当时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后来认识了、熟悉了。直到我离开清华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他就是后来调到北大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

周泉纓是位传奇人物。据说，他离开清华后，先被分配到邯郸附近一个机械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次干活时，机器把他的右手食指切了下来。他不声不响，捡起那段被切掉的食指，到自来水里冲了一阵，用手帕包好受伤的手，又回去干活去了。那些工人得知此事，都十分钦佩，说他是条好汉。

1974年，有几个“414”的人找我说：“周泉纓来了，带来一份抄好的大字报，内容不清楚，说是要贴在清华，因为清华影响大。我们觉得，无论内容如何，迟群、谢静宜是不会允许在清华园里又掀起风浪的。现在

他们正愁找不到‘414’的毛病，这个节骨眼上，他如贴出大字报，不正好将把柄送给他们？请你劝他一下，我们估计，现在只有你能阻拦住他。”我便借用科学处章征文家后院一个小房间（在胜因院），请周泉纓来会面，用了一小时，终于说服他当场把大字报烧了。周泉纓很不高兴，嘟囔了一句：“你们都变了，都不革命了。我以后要搞什么，绝不会找你商量！”

此后，他真成了一位大理论家，出了好几本书。果然，他没再找我或其他人征求意见、或讨论修改、或协助出版、发行等。但他出的书，一定会送给大家人手一册，多要就多送。说句老实话，他的书，我看不懂。

# 矛盾升级“414” 高调登场

夺权以后，蒯大富日益嚣张，不可一世，渐渐失去人心。清华的党员干部队伍里，大多数并不了解蒯大富，因为他受压当反革命时，这些干部其实都在劳改，并没有参加运动。蒯大富翻身夺权以后，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但他横冲直撞，到处以暴力或接近暴力的行动夺权时，许多人有所怀疑了。更主要的是以下两件事：

第一，12·25行动。蒯大富们在全国第一个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第一个喊出口号——“打到刘少奇”。还有，有些大字报造势说要支持蒯大富进党中央！这使得“修养”和“组织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们瞪目结舌，感到晕头转向了。据我所知，党员干部队伍中，曾经有不止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蒯大富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中央文革又是代表毛主席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所以，蒯大富的话，我们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样的论调，在“12·25”行动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

第二，“党员重新登记”。大约在1967年初，那时，我们“黑帮劳改队”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劳动是在基建处修整上下水管道零件，或在仓库翻倒水泥。忽然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井冈山兵团总部通令所有共产党员要到兵团总部重新登记，有的系的党组织被解散。党员干部们议论纷纷，有人私下里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登记，他蒯大富连党员都不是，要我去他那里登记？”“那么，如果中央下令到蒯大富那里登记，你去不去？”“不去，中央下这个命令，说明这个党完了，这个党员我不当也罢！”据我所知，当时持我这种态度的大有人在，但我们都不敢公开明确地表态。

结果，据说中央很快表了态，这事就平息下去了，但是蒯大富的威信大大下降。

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名字：沈如槐，他是力学系低年级学生，是共产党员。在蒋南翔经营十多年的清华党委垮台后，又在强势的

造反派头头、受到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支持的蒯大富高压之下，团结越来越多的清华师生，另立门户。而且非常策略地没有完全脱离井冈山兵团。只是1967年4月14日开始由千钧棒、战地黄花等战斗组成立一个“414串联会”，接着又成立了一个井冈山兵团414总部。顶着极大的压力，保存实力，一直坚持到蒯大富垮台。我虽不是原清华党委的校级高层领导，但还算比较了解学校上层的内情，比较熟悉原党委领导干部的。我敢说，原清华党委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有能力和沈如槐较量一下的。不但和沈如槐，就是他的一些战友，如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周泉纓、张雪梅等人，也都具备领袖的才能。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在清华坚持发出不同的声音，清华的文革历史又将写成什么样子？毛泽东又会怎样来结束由他发动的、由蒯大富领衔主演的闹剧呢？

而蒯大富及其战友和部下，也并不简单。至少，他们是敢想敢干，敢于承担。比起他们的前任，靠“英雄”的老子在背后支撑的老红卫兵和“临筹”（临时筹委会）们有骨气。他们也坚持到底，不会一有问题就作鸟兽散。他们管理这部漏了气的“不漏气的发动机”两年之久，也不容易呢！

不记得什么时候，“黑帮劳改队”取消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蒯大富的“德政”之一呢！我们这些劳改犯也可以出来看看大字报，组织个小组之类——我们不敢自称“战斗组”，只敢叫“学习组”。我们看到许多大字报的署名很有意思。许多是以毛泽东诗词起名的，如千钧棒、追穷寇、战地黄花等等。有的教师和干部就署名“粪土”（当年万户侯），或“嗡嗡叫小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甚至有人干脆叫“几个苍蝇”。

我们的学习小组，没有名字，也没有组长，只是大家公推文学宓为召集人。我们取得了几点共识：（1）不公开表态支持哪一派，或公开批评和反对蒯大富。（2）不介入两派的矛盾斗争。（3）对414总部多次邀请我们参加414的活动，我们还是慎重谢绝为好，因为我们几个人除文学宓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之外，其余的都不好，不要引起误会。只由文学宓负责与414总部联系。而且我们知道，414总部也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两大派系。东方红战团比较激进，三七战团比较温和。而文学宓和两个战团的关系都比较好，所以由他来联系414总部是较为合适的。但他较倾向三七战团，我和饶慰慈则较倾向东方红战团。其他人还不是很明朗，但在重大

问题上，两个战团还是很一致的。

414总部正式成立的前几天，我们学习小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活动。即使是4月15日抢占广播台，局势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我们也坚持没有表态。但是414的力量明显在逐渐增强。团、四双方，几乎天天在开会，互相攻击。大字报也非常热闹，双方都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大字报。

4月23日傍晚，我们小组正在工字厅统战部的小办公室里一起学习。我们从外面广播喇叭得知，414正在大礼堂开会。很热闹，但不知道开什么会？

大约八点钟，一个高大威猛的学生敲门进来。文学宓一见他就笑着说：“昨天开会跳上台抢老蒯麦克风的人是你吧？”

他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414在大礼堂里开大会。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总部让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因为，只有你们才能解这个难题。”

我们都没有做声，沉默着，看着他。文学宓后来告诉我，这位同学姓张（名字我已经忘了）。

张同学接着说：“414成立以后，得到许多干部和教师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主要还是基层干部的支持，如热能系的‘两万五千里’等。所以现在基层干部受到的压力很大，使得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敢表态。414成立以后，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签名支持，你们也有签了名的，但是淹没在基层干部中间，不是很突出。而公开信领头签名的谭浩强是团委的，靠近学生。作为学生，我们希望党委的中层干部有人站出来亮相，这样，基层干部就解放了。”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得外面的广播喇叭在吵，我们几个都在思考。

这时，李康说：“这叫火力转移，把蒯大富的火力引过来，‘引火烧身’，解放广大基层干部，解除他们的压力。”

张同学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文学宓说：“这和我们的‘三原则’不同了。”

张同学问：“什么三原则？”

文学宓简单解释了一下。

张同学说：“这只是自保，是保小我。没有大我，何来小我？”

我明白这是很难抉择的。但是我还是说了一句：“虽然如此，我们的‘三原则’还是要注意的，何必刺激老团，我们还是不点名，保持中间偏

四的立场比较稳妥。”

张同学立即说：“好、好、好，你们只要上台发言，讲什么，怎么讲你们自己定。你们赶快写个发言，我到总部去一下，马上回来。”他说完转身走了。

文学宓说：“老罗你笔头快，刚才你的意思我很赞成，说明你已经打好腹稿了。”

我没有推辞，立即到隔壁统战部的大房间里，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写了个大约十分钟的发言。我回到小房间时，张已经回来了。

我念了发言稿（大致内容）：一、革命小将应该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攻击，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干部和教师一定要支持团结，不要分裂。二、清华十七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干部队伍也基本上是好的。即使现在有些分歧，但在主要方面，在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来的。三、干部和教师一定要和同学们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十七年中校党委和我们自己的错误，在批判中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没完没了地、不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那样就是继续犯错误。最后照例是高呼口号。我们多次讨论过，认为已经很少人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个口号了，这次我特别加上。

我念了一遍，大家一致说行。

张同学说：“马上走，大家在等着。”

我说：“学宓，还是你去发言吧。”

文说：“唉！你写的，你念正好。我说话平淡，你去吧。”

我看了看饶慰慈，她比我们大，我一直像对大姐一样尊敬她和重视她的意见。她说：“还是你去吧，我们共进退！”

我被张同学半推半拉地带到礼堂，从舞台西的侧门进去。还没有看见下面的观众，就已经感受到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再往前多走两步，从台侧望去，人山人海，舞台两边也都坐满了人。前面一个发言刚完，掌声热烈，夹带欢呼声。我到清华近二十年，还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在那一段时间里，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有个悬念：群众是真的拥护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吗？看到此时此刻大礼堂里的气氛，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这时，我走上舞台。没注意主持人对观众说了句什么，我只听到他提

到我的名字，顿时会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不知所措，有点慌了神，左顾右盼，还回头看了看后面。只见后面站着和坐着许多人，我找不到熟悉的面孔。我曾在这个舞台上发过言，作过报告，也作过检讨，还多次参加过管弦乐队的节目表演，可是从来没有紧张到现时这种程度。

掌声停止了，我开始发言：“我代表原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原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原科学处副处长徐一新，原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和我本人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徵啓发言。”每说一个名字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接下去我读了发言稿，尽量读得有感情。当中多次被掌声打断。

掌声和大家的欢呼声，使我有时间遐想：张同学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中层干部的出现，正是大家所期盼的。基层干部感到解放了，可以大胆地参加运动了，而我自己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我们也可以上台发言了。从66年6月开始，快一年了，才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借用京剧的术语叫“亮相”。但是，既然“亮相”了，就再也不能退下去了。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当我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

掌声还没有停。我环顾四周，不知道我发完言以后，上哪里站或坐。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于是还是向西侧门走去。这时迎面上来两个女同学，一把抓走了我的发言稿，说：“我们给你抄成大字报去！”

我回到工字厅那小屋里，他们正在等我。见到我都很高兴，都说很好，很成功。

饶慰慈眼里挂着泪花说：“你注意了吗？你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响应很热烈呢！”

我说：“是。我想是因为彻底砸烂的噪音太多了吧！”

她又说：“如果你报完姓名再加上一句‘我们都是执行了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感谢同学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发言。’那就更好了。”我们大家都同意。

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结束，刘承娴惨死，文饶酷刑致残。我们不敢和饶慰慈再谈论此事，因她一提到这段往事就全身颤抖不已。

我曾对文学宓说：“如果没有4·23的发言，我们不至于这样惨吧。我一直感到内疚，你呢？”

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不要后悔，当初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不要

个人来承担。而且，我们是做了好事的。”

第二天，我看见我的发言已被抄成大字报，贴在第二教室楼的东墙上。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支持和鼓励的意见和签名。也有批判和骂的，如：“你不要命了吧！我们真想揍你一顿，你等着吧，早晚……”还有一条批语写道：“你这个机会主义分子，你想这样就能躲过广大群众的批判了吗？”署了名的，但我早忘记了。

到了晚上，团派的批判大字报开始了！火力非常猛烈。有五六个414的同学一直陪着我们，叫我们不要去看大字报。因为怕团派说不定会搞个现场批斗会，局面不好控制。对我和我们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开始还有点紧张，逐渐就麻木了。

基层干部的压力真的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和政治辅导员。包括我们自己，虽然不能说很彻底，但确实感到呼吸到了自由、解放的新鲜空气。

虽然，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我们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家破人亡，凄惨难以言状。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回首往事，我们还得承认：无论当时的“团”还是“四”，教师还是学生，党员干部还是广大群众，我们都是真诚地投入而受到一次民主思想的洗礼。

#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是怎么回事？

作者说明：本文原是“昙花一现八百天”的最后一部分，但因块头太大，内容太多，而且和“八百天”有所不合适，故提出单列。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件也许是清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最荒唐、最胡闹的案件了。说它最荒唐、最胡闹是因为这几个受伤害、受委屈最严重的老师，根本就不能算是个“集团”。而且他们之中，除我外，即便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都不可能的。何来“反革命”，又何来“集团”？案件的几个当事人有的终生伤残，有的含冤去世，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现在还侥幸活着。我想，我有责任将我在案件中经历的实情记录下来，以此向清华师长、师兄弟、姐妹们作个交代。

注1 1967年清华校内分两派：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团派”、“老团儿”），另一派是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因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故简称“四一四”、“老四”）。“团派”以蒯大富为首，因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是掌权的。“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是在野的。

因为学校许多党员干部和教师倾向或支持“四一四”，“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以压制支持“四一四”的党员和干部。于是就搞出了一个“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罗是我，文是文学宓（统战部副部长），李是李康（教务处副处长），饶是饶慰慈（党办副主任）。

## 绑架：1968年1月30日

1968年1月17日，“团派”在清华大礼堂开大会批判罗征启、黄报清，罪名是“搞假四清”。

正在家里养病的黄先生闻批判声，从五楼窗口跳出，坠地身亡。

我也仓惶逃出清华园，一直躲在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摄影实验室里。（我姐夫是人大新闻系的老师。人大当时也分两派，一派叫“三红”，另一派叫“新人大公社”，两派的矛盾没有清华那么严重。我姐夫是“新人大”的，大体上也是地派<sup>注2</sup>观点的。这个暗室属于他们管。）我在实验室里安了张床，拉上厚厚的窗帘。暗室里听不到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但是又进入了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光亮的世界，也够恐怖的！就这样在黑暗中过了一天又一天。姐夫每天给我送饭，给我讲一些新闻，我的吃喝及与外界的联系就全靠他了。

我的妻子梁鸿文仍留在学校。虽然她可以见到天日，但我相信她的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

1月29日，鸿文也到了人大姐夫家，当晚她留住在姐夫家。我们在姐夫家见了面。十几天来，一直比较平静，我们都麻痹了，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了。于是商定第二天中午到托儿所接孩子，然后到日坛公园玩一阵，再一起回我父母家吃年夜饭。

注2 当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以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大学聂元梓为代表，因航空上天而称为天派。而另一派以地质学院王大宾、师范大学谭厚兰为代表，因地质学院而成为地派。清华蒯大富哪一派都不是，但因和韩爱晶、聂元梓关系比较密切，一般也被认为是天派，而414自然就被认为是地派的了。其实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天派或地派，只能是观点比较接近，关系较好。

晚上，印甫盛、万润南来看我。我向他们说了明天的计划，万没有做声。

印低声说：“有点儿危险。”

我说：“回家吃个年饭，吃完就走。”

他没有再说什么。

1968年1月30日，虽然这天是大晴天，阳光灿烂，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是“阴冷灰暗”的一天。

这天中午，鸿文接到女儿，我们一起到了日坛公园。这个公园很大，离我父母家很近。文革以前，我们将孩子放在父母家附近的一个托儿所。平日，由父母接送和照顾这个孙女。鸿文去了四川绵阳建设三线分校后，周末就由我接送和陪孩子过，给我父母“放两天假”休息。我经常带女儿去日坛公园。那里有个儿童游戏场，我们常常玩上两三个小时。文革开始，

这规律就打乱了。有时一连几个星期看不见孩子，好想啊！

1月30日这天比较早接了孩子。我和女儿都很高兴，在日坛公园的儿童游戏场玩了两个多小时，然后一起回家。

我父母本来住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传统的三合院里。大门是一座殖民地式的门楼，进门是以木板为材料的影壁，后面是北、东、西共十几间房子，房子是父亲买下来的。父亲当时在锡兰驻华大使馆（即今天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工作，虽然是与我国公安部门联系的，但当时不准暴露。我们家里除了父亲和我以外都不知情。

文革开始，父母就被当地的街道“积极分子”批斗。父亲因在驻外使馆工作，故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汉奸”。母亲虽然和农村毫无关联，却被认定是“地主婆”，每天早上扫马路。家被抄，自住的三合院，被四户“积极分子”分了。全家五口人（我的父母亲、我的女儿、我的两个弟弟。一个59年响应号召，到黑龙江开发北大荒。五年后回来，在第一机床厂当工人。另一个有些弱智，勉强在读初中）被赶到附近农业部大楼脚下一个大杂院里一间半朝北的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暗无天日，没有厕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家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还有许多比我们更糟。我们还可以苦中作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个年。两个姐姐也全家都到我父母家一起来过年。

我和鸿文各骑了一部自行车。我的车前大梁上放了一个小座椅，女儿坐在上面，这是当年北京最普通的家用交通工具。我们到了大杂院的门口，我推开门，连人带车一起搬过大杂院的门槛。这个动作以往重复过多次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怪事发生了，女儿坐在车上的小座椅上，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哭不止。我以为车子的什么地方碰伤了她，或弄疼了她。我仔细检查，没碰着她什么地方。四岁的孩子应该听得懂我的话了，但是不管我说什么，她只是哭。我赶紧把车子支好，把她抱起来放在地上。她抓住我的衣服不放，我只好抱着她，直到她的爷爷奶奶出来接她了，她才止住哭，但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我，好像怕我走了一样。我感到很奇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不是一个凶兆？

我站在离大杂院大门口约30米的我家的门前，停好了车。我低头看我的车，没有抬头，眼睛却往大门口方向窥探。靠近大门口的第一家是新搬进大院的，这家有多少口人我也不知道，但他们有一个女孩叫小青。这时她正和家里的大人在说话。我进到房间不久，小青就蹦蹦跳跳地进来对我

母亲说：“罗大妈，我妈让我出去买点东西，您要不要带什么？”一边说一边眼睛滴溜溜地转，扫视我家屋里的情况。我更加怀疑。我母亲对小青说了什么我也没听见，只见小青蹦蹦跳跳地走了。如果我果断地骑上车就走，大概还来得及。而我犹豫了一阵，这正是我性格上的弱点：遇事犹豫不决。

以后，我从各种途径得到的信息证明：当我进院门的时候，对面农业部大楼上有三、四个人在盯着我家，加上小青这个密探，报告我确实回到家。他们一方面通知清华派车派人过来，另一方面监视我的动向。我虽感觉有危险，但不能准确判断是什么危险，以及危险来自何方？而我女儿则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她还小，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微妙的感觉，所以用反常的哭声引起我的警觉，但我没能体会到。

我一直心神不安，一句话都没有说。女儿的感觉可能更强烈，一直依偎在我旁边，生怕我跑了。快吃饭了，掌勺的大姐夫已开始吆喝准备吃饭。我没有出声，我不愿惊动大家，尤其不愿惊动两位老人和女儿。心想快点吃完就走。唯一察觉我有心事的是母亲，她靠近我低声问：“你回来有没有危险呀？”我说：“应该不会，越南前线春节还停战呢！两派吵架，没事，我吃完就走。”

我们谁都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了。

晚上八点多了，年夜饭还没有开始，突然敲门进来几个人，说是查户口的。其中一个人穿着军大衣，看起来很眼熟，但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处见过（我立即使劲地想）。后面还有两三个人，他们的眼睛在这间不大的房子里搜索了好一阵子，像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通道可以让我逃跑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是学校修建队的一个工人，以前我们“劳改”时他看管过我们。他的身份似乎是团派总部保卫组的。想到这里，我知道，这下子我完了，他们都是冲着我来。

这伙人退出去径直向大院门口走去。看见院子里突然来了许多不速之客，大杂院里许多邻居都出来看，也都感觉气氛不对。

母亲急得眼泪汪汪。隔壁一对夫妇，江浙一带人，讲上海话的，平时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他们用上海话和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母亲是上海长大的广东人，会讲上海话。这时她跑过来低声说：“隔壁那位叔叔婶婶说，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

我说：“是的。”

母亲说：“他们叫你到他们家暂避一下。”

我说：“不了，替我谢谢他们，我不想连累更多的人。妈妈，以后你们对院门口小青那家人要小心，他们也是监视我们的。”说完我就向门口走去，当时我没有穿棉衣，只穿一件毛衣和一件棉背心。

母亲说：“你穿上棉衣，我给你拿去。”我说：“来不及了，我不想让亲人尤其是孩子看见我被别人抓走！妈，请你替我照看好鸿文和孩子，拜托了。不好意思，给二老增加负担了。”

我加快向院门走去，拉开院门看见外面有四五个人，包括那穿军大衣的人，形成半圆的包围圈，两边各一个人跳上来按住我的胳膊，并且推着我走。

我说了一句：“请等一下，我母亲要给我拿件棉衣来。”

一个人厉声说道：“用不着，我们有棉衣，冻不死你，快走！”

向前走了十几步，从右侧农业部大楼的正门那条胡同里飞驰出一辆吉普车，嘎的一声急刹车，停在我前面。立即，我被几个人从后门扔在冰冻的车底板上。

几个人飞快地上车，几只脚踏在我身上。一个人用块布蒙住我的眼睛，并且阴森地说：“你老实点！不听话，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还没坐好，车子已经开动了。

我很“老实”，一动不动，尽量凭感觉判断方向。北京东城是我读书成长的地方，但是转了几次，我就失去了方向。

## 先农坛，防空地下室

大约20分钟以后，车停了下来。周围很安静，连公共汽车的声音都没有。他们经过短暂的交换意见之后，把我拉起来，又把蒙住我眼睛的破布扯下来。汽车里没有灯光，看不清这几个人的长相。只听到一个北京口音的人说：“老实跟我们走，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许出声，不听话别怪我们不客气，下去！”

我下车后用眼睛左右扫视，发现这是后开门的吉普，车上连我和司机一共七个人。我们站在车行方向的右侧路边，向左看去正是南长街的牌楼，于是我知道我的位置是南长街的路东，离牌楼约50米。他们发现我在左右张望，其中一人推了我一下：“看什么看？走！”我被夹在他们当中向北走去。

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路上既无车也无人，可能因为是年三十，周围出奇地安静。本来我很希望碰上巡逻的解放军，我会挣扎着跑向他们求援。但是后来我又想幸亏没有碰上解放军。如果真的碰上，就算我够胆挣脱这六条比我高大的汉子跑到解放军跟前，两三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也不一定对付得了这五、六个大汉。

一行人过马路到了路西。又走了十几、二十步，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他们敲门进了一个小院，小院的情况没看清楚，两眼又被他们用同一条脏兮兮的破布蒙上。我被推进一间的小空房间，从蒙眼破布的细小缝隙中看到一丝灯光，因而知道房间中悬挂着一盏电灯。但从感觉上知道，房间虽然不大，却是空荡荡的。这时他们又把我两手在背后捆绑起来。严冬时节，没有穿棉衣的我，连续打了几个寒噤。

还是那个北京口音的说：“老实呆着，别出声，别乱动。”然后他们锁上门，到旁边不远的另一个房间去了。我还能听到他们说笑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哄笑。我猜他们在又吃又喝，好不惬意。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有人敲大门。开门以后，听得到他们在房间商量了一会。过来两个人，带来一件棉大衣，他们帮我穿上。这一个多小时里，一方面我被蒙着眼看不见，另一方面又被命令“别出声，别乱动”，我快冻僵了。这件棉大衣救了我的命。穿上棉大衣，还没有暖过来，房间的门响了。走进两人，一边一个押解我出了房间，又出了院门。听他们和里边的人道别。

听到门关上以后，有个人扯下蒙住我眼睛的布。一行人又走上南长街，向着长安街方向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那辆吉普车。但车停在南长街路西，车头向南。他们让我上车，但这次可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两只手也没有绑住，只是眼睛又被蒙上了。

我又努力地辨别方向。南长街转右，应该是天安门广场。连汽车的声音都能听出来是在一个空旷的大广场上。远处还有稀稀拉拉的爆竹声，点缀着过年的气氛。

我的女儿，我的亲人们，他们吃过年夜饭了吗？应该是吃不好了。这个年不好过啊！后来我得知，我的妻子和姐夫，我的母亲，分别连夜去到清华蒯大富的总部，给我送一些衣物，并且问他们要人，当然只能无功而返。

之后，车向左拐向前门，又一直向南开去，似乎没有变过方向。最后

停下了，应该是还没到永定门的某处。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出去了一会，听到喊了一声：“行了，快点！”

于是我又被两个人左右押解着进了一个可以两向开的摇头门，迎面一股暖气。走了几步向右转，又经过一个摇头门。突然，两边的人喝道：“快点！”把我架起来，两脚悬空了。他们好像在跑一样，气氛很紧张。

奇怪的是，我闻到一股医院的味道。难道我被带到一座医院？这一带没有医院呢！

又进了一个摇头门，我那悬空的脚踢到一步台阶，我知道这是楼梯了。那两个人继续架着我快步跑上楼梯。加上后面跟着跑上来的几个人，在空荡的楼梯间里，脚步声音很大、很急促。刚开始我还默记着“休息板、二楼、休息板、三楼……”后来被这样紧张的气氛打乱了，最后不知在几楼停下。又经过一个摇头门，进到一个空旷的大厅。

他们在大厅的边上找了一间储藏室，把我塞进去让我坐下，并且说：“老实呆着，不许乱动。”说完了，锁上储藏室的门就走了。

他们似乎忘了我的两手并没有绑上。过了一会，我偷偷的扒下蒙眼布，从门缝看。外面灯光虽然很弱，但能看到似乎是一个球类练习厅，我看见一个篮球架子。我想可能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的大楼。

又过了个把钟头，他们又来了。开了储藏室的门，把我拉出来，走了几十步，我猜大约是储藏室的对面，打开一个门把我推进去，扯下蒙眼布。我看见原来是一间厕所，有便桶、浴缸、洗手盆，相当宽敞。马赛克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北京口音的又说：“今晚委屈你，就睡这里吧。”

我回头，大厅里灯光是昏暗的，我看了看墙上有没有电灯开关。

那个人看见我这个小动作就说：“开关在外面，不许开灯，睡吧。”说完锁上门就走了。

这一夜，我就躺在冰凉的厕所马赛克地上，居然很快就睡着了。

在睡前，我做了一件事，检查我身上的东西：清华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一张十元和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想他们可能会检查和搜走我身上携带的东西。我下意识的感觉到，我随身必须有个身份的证明，还要有点钱。因此，我把我的底裤脱下，前后反过来再穿上。我的底裤后边右侧有一个小口袋，调过来穿，这个小口袋就在左前方腰带附近，估计他们不是很专业，不会搜到那里的。我把工作证和五元的钞票放在这个小口袋里，把十元钞票和工会会员证等其它物品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后来，他们并没有搜

查，但是借着问我要饭钱时，看了看我口袋中的东西，搜走了那张十元的钞票，说是我的伙食费。我藏下的工作证和五元钱没被他们发现，这在我越狱逃跑时起了很大作用。

我被“嘭、嘭、嘭”打球的声音吵醒了。大厅里的灯全亮了，因此，透过门缝和门上亮子射过来的灯光也多，厕所里亮了许多。

我用洗手盆水龙头的水漱了口、洗了脸。没有毛巾，只好等待自然干。

我真应感谢清华马约翰先生，他在我们一年级开学上课的第一天，亲自到班上讲课，怎样吃饭、怎样洗澡、怎样洗脸等等。我们许多人一直是按照他教的办法，洗脸用冷水，洗澡用冷热水交替洗澡。因为一直按照马先生的教导洗脸洗澡，所以在目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保持健康不病。文革中，我是“黑帮”，不许进浴室洗澡，只得改用冷水洗澡，冬天用冷水擦身。

一边等待脸上自然干，一边揣摩着自己的前途命运。

八点半，大厅里有些动静，有打球的声音。从钥匙孔里看出去，大概是因为是年初一，打球的人不多。

突然有人推厕所的门，而且讲的像外国话，又用普通话说：“把这个门打开！”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我看到四个穿运动衣的人。为首的是少数民族，大概不是维吾尔族就是哈萨克族。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怎么，这里有人？”没等我说话，他上前来打了我几个耳光，还说：“肯定不是流氓就是小偷，打！”那几个人中有两个人也上来打，好在他们手轻。

我马上争辩：“我不是流氓小偷，我是清华大学的干部，是昨天夜里井冈山蒯大富把我抓来的，今天他们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

其中没有动手的那个人（也是少数民族）看了看我，大概看我不像流氓小偷，他们就用他们的语言交流了几句。

为首的对我说：“蒯大富不好，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放你。如果他们今晚以前还不来，我们就放你走。”

我说：“谢谢。”

他们又锁上门，走了。

但是没等到晚上，蒯大富的人就来了。他们给我带来一些吃的，给我约半个小时吃饭。

半小时后，他们进到厕所里，也不说话，又把我眼睛蒙上，还是一左一右两条大汉架着我走。走了几十步，突然喝声：“快点！”我又被悬空

架起，这次是下楼梯。

我默默地注意着多少层。大约是六层或七层，然后把我放下，向前推着走。突然，一阵阴气袭来，我猜我到了一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可能是地下室。但我因穿着棉衣，感觉比昨天晚上好多了。他们把我向前推了几步，叫我转身，坐下，把蒙眼布拉下。

原来是防空地下室。我坐在墙下一条约40公分高的地梁上。小房间黑呼呼的，挂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在灯下放有一张小方桌，两个人分坐在桌子两边，两侧前方还各站两个人。他们在较亮处，我在较暗处。两边站着的大汉，都歪戴着一顶棉帽，一个护耳在前，一个护耳在后。他们无非是想造成一种震慑的恐怖气氛。实际上，我倒觉得他们所营造的气氛，真像威虎山上土匪窝里的气氛，一点也不恐怖，反倒有点滑稽。

我发现“审问”我和昨晚到家里抓我的人不同了。昨晚大部分是修建队的工人，今天大部分是体育代表队的学生。我平日管文工团较多，与体育代表队接触不多，但是大体上能分辨工人和学生。以后接触的代表队学生，多是击剑队、航海队和羽毛球队的。羽毛球队的是几个华侨同学。他们虽然有时会动手打人，但都出手不重，至少对我是这样。

“审问”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到八点多钟才结束。在这几个小时里，他们时而急风暴雨、声色俱厉，时而和风细雨、和颜悦色。我知道这叫做变换方式，使受审人心慌意乱，说出他们要的东西。但是他们要的，也问得最多的，是414总部内部的情况。他们没想到我一次总部的活动都没参加过，他们也没有想到，无论交替使用各种手段以施加压力，一个人在巨大压力下，一个半小时以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也就不感到恐怖了。

大约八点半以后，他们结束了审问，给我吃了点东西，又把我蒙眼架回到那间厕所。

这段时间里，我想得最多的是默默地祝愿我的亲人、家属，不要受到恐吓、虐待，我宁愿多承担一些。我不信教，所以我不会祈祷或许愿，不会祈求上帝或观音菩萨保佑。但是，我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却很认同。所以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时常在想，我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或行为，该受如此严酷的报应？思来想去，可能是对我们在思想工作当中，一些“左”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过“左”的报复！

次日上午九点，他们送来早餐。吃过以后，又蒙上眼睛，没有上下楼梯，走了二三十步进了一个门，门里非常热，我感觉至少有二十三二度。

拉开蒙眼布，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宽敞的房间。我猜想这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运动员的宿舍。按当时标准，算是相当豪华了。

为首的一个学生指了一把座椅，让我坐下。因为室内温度太高，他们都除下帽子和外衣。我能看清他们的面目。房间内只有四个人，我预感到又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改换地方之类。我也脱下棉大衣，看着他们，接受审讯。

结果并没有太多的问话。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我回答了。其中大部分是前一天在防空地下室里问过的。他们问过以后，让我写成材料。我故意拖延写了很长时间，他们也不在意。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又让我看前一天的审讯记录，并在每一页上签上名，按手指印，有改的地方也要签名按指印。看完厚厚的一本记录，天已完全黑下来。他们又给我吃了点东西，穿上棉大衣，蒙上眼睛，又被送回厕所，锁上门就走了。

又过了个把小时，我估计是八点多钟，厕所门开了。他们一句话不说，蒙上眼睛，一边一个人，又把我押出厕所。

突然，左边的人大喝一声：“快！”我被悬空架起来，进了楼梯间的防火门，快步跑下楼。我以为又要去防空地下室。但跑了四五层楼梯以后，出了摇头门，到了有医院味道地方。他们像跑一样，跑出这条走廊，出了摇头门，再经过一道门，就闻道室外的味道。虽然冷一些，但新鲜空气还是比较舒适。他们推我上了汽车，我猜大概还是那辆吉普车。汽车启动，我默默地记着转弯的情况，但是不一会，我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这辆车驶向何方。

这时，我思考着另一个问题，那地方是不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这个大楼的平面应该是这样的：进一楼入口大厅以后，正面是楼梯，或者还有电梯。右边是医务室。我猜左边应该是食堂或办公室。二到五楼是运动员宿舍。宿舍东西两边尽头各有一个防火楼梯。医务室东的防火梯通到防空地下室，正面楼梯和电梯直达顶层的运动大厅。我觉得我的设想是相当完善的。

汽车走了个把小时，突然，我捕捉到一股气息，一股味道，是清华园的味道！这是我近二十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不会错的……

## 神秘的武斗据点

早就听说，设在第一教室楼的前哨广播台是团派的一个重要据点，今

日深陷其中，得识其庐山真面目。

这是我们当年三校建委会一工区的最后一个项目。当时，大部分同学都已回去上课，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同学再多干了些天。这座第一教室楼，也可以说是“我们盖的”。我现在一点恐怖感都没有，一边走一边在想，这个楼的砖瓦灰砂石说不定还是我买的呢。

进门以后，走过大厅，上了三跑楼梯。楼梯都用课桌和椅子堵住，留下很窄的一条缝，只够人们侧身走过。楼梯不是封闭的，不符合今天的防火规范。在楼梯向着二三层楼走廊较宽敞的空间，还放着许多桌椅。估计是准备发生武斗时就可以随时用来堵塞楼梯，便于防守。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武斗中，这样的防守是足够了。教室的高度与厕所等服务房间的高度不同，所以利用三跑楼梯的休息板作了夹层入口。这个设计我们以前是知道的，我在搞毕业设计时还专门来看过，想不到今天我被关在这里。

我被押送到一个夹层里。夹层的里面是广播台“重地”，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也明白不会允许我进入的。我被命令留在靠近楼梯夹层入口处的小房间里。这里没有暖气。里面的广播室有煤炉，我可以嗅到煤火的味道。

我的小房间连门都没有，只用几个小桌子、椅子堵塞。我看不见外面，当然，外面也看不到我。虽然没有火炉，但不算冷，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事态的发展。我听到里面房间有几个人在说说笑笑，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时有人出入这个夹层。小房间很暗，只高高吊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

我随便扫视了这个小房间，一张双屉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空的已经破烂的书柜。我不经意地拉开抽屉一看，里面塞了许多烂纸，下面露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面有图像及说明，但是无头有尾，当中还有缺页。我快速翻看，却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本教授怎样打人、挨打怎样防备的小册子。因为没有前面几页，故不知其名。

册子上描述：打人要用拳头和手掌，不要用棍棒等物，尤其不要用铁器等硬物。可以打腹部、胸部等肉厚的地方，不要打头和肉薄的部位，这样可以不留痕迹，否则要闹出大事；如果用铁木等硬物打，最好用厚布包上……

虽然此前对前哨台有许多传说，而且后期这里出过几条人命，打死打伤几个同学，尤其后来在蒯大富的指挥下使用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杀死、

杀伤多名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闯下了大祸，造成“井冈山”以至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覆灭，但是我在“前哨台”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却没有感到这个据点隐藏着这么大的杀机和能量。

我听到里面的人在讨论，有时在争论着什么问题。虽然我很注意听，但听不清楚，断断续续听得到一两句话：“反正我不赞成打人。”“我们也不赞成打人，但有时情况会失控。”……

两个小时之后，来了几个人，搬开了桌椅，叫我出来。又蒙上我的眼睛。出门以后，走到校卫队门前，推我上了车。车子启动，听声音，还是那辆车。我从转弯的方向和气息判断，车子一直在校内或离学校不远的路上转，转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忽然我嗅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气味和信息，我立刻就可以断定是音乐室附近。

虽然现在听不到熟悉的琴声，但是从入学第一周起我就开始在这里向一位名叫普洛武罗夫斯基的白俄学小提琴，每天来练习一、两个小时，风雨无阻，除非外出实习，从不间断。可以说，我在清华学习的第一是建筑专业，第二是小提琴了。

车停了。“下车！”一声命令。但我双眼被蒙上，虽有命令，但不敢动。大概还是那辆吉普车。我被两个人半推半扶地从后车门下了车。又被左右架着押解进了门。一股烧木材的味道扑面而来，还有刺鼻的烟味，大概是刚刚在生煤炉子。又左拐右拐了几个弯道，终于停下来，拉开蒙眼布。我看到我在一间没有窗，只有一个大木门的房间。房间里没有火，所以没有烟味，只有一张小木床，上面放着一床被和一床褥。这里是哪里呢？

这时，我看见大木门是实木的，而且是精工制造的，门框周围有很好的线脚。我认识这里，我到过这里。再结合音乐室的信息判断，是化学馆。押解我的人开口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很老实，说：“是化学馆二楼正门入口大楼梯下的房间。”

“你这老小子，怎么知道的？”

“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清华的土建馆，学校的老房子我都观察过。”

我不敢说我的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是黄报清先生，那肯定会引起新的风波。当时黄先生叫我们参观清华的老建筑，有时带我们参观，边看边讲解：搞设计一定要注意，所有的建筑元件都应该是成一系列的，统一的。不能大体型是中国传统的，小建筑是西洋古典的，线脚装饰是阿拉伯的，

室内摆设是埃及的。这就乱套了。黄先生现在已不在了，可是来到这里，我仿佛又看见他站在前面侃侃而谈。

“听着！”一个陌生的声音把我从对老师的怀念中拉了回来。他边说边打开大木门，前面是一条黑乎乎的走道。“现在这里很冷，等会儿我们会给你拿个木炭炉来取暖。过来！”他叫我走出大木门，到了走道上。就在大木门的门口，叫我掀起一块大铺地石板。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知道这是一条管道暗沟，主要是走暖气管道的，向西通到化学馆和音乐室间的一个旱井。到冬天供暖气的时候，那个旱井还冒热气呢。我马上一个闪念：这条管沟到那个旱井可以逃跑呢……

“听着！”他又打断我的遐想。“这是你大小便的地方，我们在前面，有事可以敲走廊左边的门。今晚就这样了，你睡吧，但别关灯。”

在我睡前，我的“监护人”拿来一块60公分见方的铁板，上面堆着一些烧红了的木炭和木柴，放在房间中央，转身关上门就走了。

我躺下没多久，就感到迷迷糊糊，出现许多幻觉：我看见我的母亲，我向母亲走去，似乎跌倒了，母亲不见了……这样的幻觉反复出现，为什么，我在哪里？忽然，我明白了，这是八九岁的时候，我不舒服，出现幻觉，我去找母亲，看见她以后，我叫声“妈”！扑过去，没有知觉了。

“煤气！”我惊醒了，感觉心跳加快、头疼、头晕，但思维还清晰，我慢慢起身，披上棉衣，打开门，刚才还觉得臭烘烘的暖气沟，现在却似一股清新的空气。我走到左边一扇门，用力敲了几下。

立刻有人问：“什么事？”

我说：“煤气、煤气……请你们把木柴和炭拿走！”

他们也没说话，把炭火拿出去，又关了门，捣弄了一阵桌椅家具，又睡下了。我躺了一阵，确信不会有煤气了，才进入梦乡。快睡着时，我想：我又逃过一劫。

## 被非法刑讯逼供

化学馆是清华早期的一座建筑物，它雄伟孤傲，远离其它的教学行政建筑，紧靠校园的北墙，从校园的西北角，冷眼看着我们，带有一些神秘感。我在清华学习工作多年，除了做毕业设计时来这里观察过，就是这次被抓来关在这里了。许多同学只知道这是化学馆，却从来没有进去过。

现在，神秘感变成了恐怖感，尤其到了夜晚，如果没有“审讯”，那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自己呼吸和血液流动的声音。这时才体会到，没有声音一连噪音也没有的世界是最恐怖的。这种效果，可能是连囚禁我的人也没有想到的。如果这种“万籁俱寂”的“静音”时间长了，可能人要发疯的。

我开始面对被刑讯逼供的一段日子。

我承认，我并不十分相信那个阶段我的记忆。因为那时候我的思维是处在一个高度紧张、混乱的状态中，许多记忆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最让我迷惘不安的是，打我、骂我的年轻人是大学生吗？是敌人吗？我该如何应对？尤其是当他们用刑越来越重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就不断浮现。我知道，如果他们失手致我残、致我命的话，我只好认倒霉，而这种倒霉事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如果打你的人是敌人，是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匪徒，那就另当别论了，而他们却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一个在“审讯”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他们常说：“如果你的态度好，敌我的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的内部矛盾。而像你这样恶劣的态度，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的矛盾！”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而且逻辑混乱。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也经常这样讲。本来没有问题，他们可以乱扣帽子。你不同意，就是态度不好，就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

我把老团对我的刑讯逼供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最轻档次）是一般地刑讯逼供。我遇到的多数是这个档次，也就是说多半是用拳掌打击，不用器械重物。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见到文学宓、饶慰慈，他们所受的刑罚重得多，有的伤势惨不忍睹，可能多是第二个档次。

第二个档次是重刑逼供。这时他们会换几个人上场，这几个人是打手，残暴无人性。

对我用重刑的一个叫冯家驷（他们称“老四”）的打手（也是学生）就非常残暴，他一般打你后，听到你痛苦的喊叫声，他会露出得意的“狞笑！”他的行为让我读懂了“狞笑”这个词。

我在“前哨台”看到的小册子里介绍说，被打的人大喊出声，就可以将疼痛散开。另外被打时顺势倒下，别硬挺住，也是消散疼痛的办法。我在被打时就用了这一招，还真管用。

不过几次以后，就被“老四”发现。他狞笑着虚晃一下，我不知有诈，马上大喊一声，然而他并没有出手。他看出我懂防备时，就在我身后

2米左右的地上，放倒几张桌子、椅子，并对我说：“你看清楚，你如果装着被打倒，也是倒在这些桌椅腿上，你就装吧。”说完，趁我不备，一拳打在我胸上，我就倒在那些桌椅腿上，等于用木棍、铁器等打我。但他说：“这不是我打的，是你自己躺下去的。”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屏气挺住，而挺住的后果就会伤重些。至今我手腕上还留有当时受伤的疤痕。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他们放假休息，没有审讯。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不声不响进来两个人，不像学生，前面守卫的人也不过问。我坐在木板床上，他们站在我面前，命令我站起来。我刚站起来，他们中一个插到我身后，将我两手擒住，另外一个手里拿着类似手电筒包着布的东西，我明白他们是要下手打人了。我来不及思考怎样防范才能减轻伤害程度，他们就下手了。

他们用那个东西直接打在我肋骨之下的腹部，我痛得连喊都喊不出了，肚、肠、肝、胃像被撕裂般痛疼。他们从轻到重大概打了十多下才放开我，我没有躺下，像患佝偻病一样，卷曲着身体……

我听见他们似乎在议论什么……也不知几时，他们走了……

留给我的是难以言状的疼痛和惊恐。我知道这算是重刑了。

一年以后，即1969年春节后，学校组织义务献血，我也报了名。在体检照X光时，我被照了很长时间。

医生问：“你的肝有什么病？”

我说“据我所知，没病。”

“那你这块是什么东西？”医生又请来几位医生会诊。

一位医生问：“你这几年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例如肝病、车祸等？”

我问：“挨打算不算？”接着，我把这次被打的情况说了。

医生说：“你命大，你的肝已被打破了，就剩了外面一层膜。如果这层膜再破了，那就会大出血，就完了。”医生还是同意我献血。

两年多后，我被查出患了血吸虫病。从此，我不能献血了。但在检查时，发现那个凝血块已经被身体吸收了，未治自愈。

第三个档次（更高档次）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刑罚。

在化学馆的前几天，虽然也用了刑，但他们的用刑目的不是很明确。有一天冯家驷说：“你的态度不好，逼得我们换一种方法对付你。我们准备明天开始罚你站。蒋南翔硬吧，站了三天三夜，怎么样，全招了。看你年轻，比蒋南翔硬，就多站一会儿试试看吧。”

第二天，果然开始罚站了。首先宣布了要求说：“我们也不问问题，不提示，你有要交代的就交代，不交代的就站着，给你两顿饭，站着吃，只有大小便允许动一下。我们三班，每班八个人陪着你，现在开始了。”

我本以为很简单。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被罚站过一次，什么原因被罚可不记得了。老师在地上用粉笔画个圈不许出圈，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完了，得个教训是要听老师的话。

这次的罚站可不同了。我的手表一直放在褥子下。这天我戴上了，我提醒自己，一定得比蒋校长站得多点时间，他比我大20岁有多呢。

第一天过去了，还可以。脚和小腿有点发涨，但不严重。我很有信心，对自己能挺住很满意。拉撒大小便是到我的囚房门口的暖气沟去，他们并不跟着我。我尽量多耗点时间，用来活动腿脚。

第二天过去了，我觉得还行。腿脚开始发胀。上眼皮老往下掉，但我觉得我能挺住。我无论如何也得站得长过蒋校长站的时间。

第三天，腿脚非常疼、涨，另外就是困，想睡觉。有时候，站着睁着眼就睡着了。有时候他们跟着我说话，我听不见，他们大声喝骂，我才惊醒。有时候会出现白日梦。有一次，我甚至喃喃自语，被他们听到，大声问我是不是交代什么？我摇摇头。但是我觉得自己还行，能坚持这么久也不容易！

第四天早上，我一看表，72小时，三天了。这个“三天”，像咒语一样，一到三天我马上垮下来了。如果他们说蒋校长站了四天四夜96个小时，那我可能站到100小时也没问题。但当时我知道，我就要全线崩溃了。

到80小时了，这时我感觉挺不住了，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了！

我看到监护和审讯的人在换班了，下一班有冯家驷！这时，我完全不行了，开始出现许多幻觉：我看到蒋校长和冯家驷手挽手一起进来……

值班人拿来我的口粮让我吃时，我对他说：“我要上厕所！”

没等他同意，我就跌跌撞撞地往我的囚室跑去，没到已经掀起盖板的洞口，我就失去了知觉！

人声嘈杂，我渐渐恢复理智。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装蒜，没事！”

另一个反驳道：“心跳过慢是装不出来的，已经很危险了。”

这时，有一个人抬起我的头，要用调羹灌一些水给我喝。我无意识地一喝，却是一匙滚烫的水，烫得我立即大叫了一声！

睁眼一看，正是冯家骊狞笑着说：“我说是装的嘛，你们还不信。”

旁边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反驳说：“心跳过慢，不会是装的，还是要注意。”

从这天晚上开始，我被允许睡一会儿了。他们也没有再提罚站的事。

后来，我问过文学宓、饶慰慈等，他们也都被罚站过，文学宓说他站了五天五夜。我说，我不如你。

除了允许我睡一会儿以外，他们还给了几片药让我吃。一种是酸的，我认识是维生素C，黄色的发苦的则可能是维生素B，再有一种是白色小片，不知是什么。第一次吃了我睡下不久，冯家骊又“提审”，我昏昏沉沉不知说了什么。

第二天，他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印甫盛讲过，林彪是极左潮的总根子”，签名是罗征启，字像我的，但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我马上冒虚汗，因为一方面我不记得我写过这张纸条，如果确实是我写的，那有可能还写过别的东西。同时，这说明我已违反了自己定下的“只讲自己，不讲别人”，更不能“揭发”别人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的原则。还有，那张写有攻击性言论的字条涉及“林副主席”，我们414战友内部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死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条线，现在这条线也破了。我马上说：“这话不是印甫盛说的，是我说的。”“那你写下来”，一个审问者说。“我写下来可以，这张纸条可要还给我。”得到肯定的承诺以后，我写下了这张条子。但是那张使我终身引以为憾的字条，也没有能收回。

我很难过，如果他们乘势猛追，那可能还有更大的斩获。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却停手了。

我在化学馆一楼“被审讯”了大约10~14天。

一天审讯结束后，他们给我一盒晚饭，并说：“快吃，吃完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换地方了……”

七点多钟，我“被离开”了化学馆。

### 三堡疗养所的囚徒

三堡疗养院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清华在远郊区修建的一个疗养院。地处居庸关后面一站，八达岭前面两（或三）站。穿过山沟峡谷有一条铁路，车站就在几条山沟汇合处的小平原上。

铁路和公路并行，有时在一个水平面，有时公路在上面山腰俯视着铁路。山沟里潺潺流水声，四季不停。因为冬季不结冰，水生植物很茂盛。山沟里长着许多广东人喜欢吃的西洋菜。以前我和我的堂兄以及几位广东同学常常来采摘西洋菜吃。附近的农民看见，颇不以为然，他们说这菜叫野芹菜或水芹菜，人是不吃的，喂猪的。

疗养院在火车站上方的一条最大的山沟里。在这里，我有一段传奇性的经历。

我被押解出了化学馆一楼北门，还是那辆吉普车，停在旱井附近。我从车子的后门上了车，又被蒙上了眼。从他们谈话声音来看，又换了人。有两个人口音像华侨。后来我撤掉蒙眼布以后，看清是羽毛球队的，我看过他们的比赛。大个子的体力好，技术一般。小个子体力不好，技术较好。我听他们中有人叫“蛮子”。不知叫谁。我蒙眼坐车有点经验了，感觉车子穿过礼堂前广场，向东出主楼前的东校门，再向东过铁路转向北，应该是穿过清河往昌平的方向。

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他们扯下了我的蒙眼布。刚刚我感到车子左转弯，现在睁眼看出去，虽然天黑看不大清楚，但大体上看到路两边的行道树和路灯。行道树是迎面倾斜的，所以，这应该是刚转向昌平往西去南口的公路上，应该是1964年我“用心观察”过的地方。

1964年我带学生到部队当兵军训时，部队带队的吴姓少校团长曾对我说：“我们带兵的有一条要求，走过什么地方，就要熟悉这地方有什么特点。大到山形地貌，小到花草树木都要记得，到打仗时是很有用的。一会儿到达目的地后，我要考一考你，看你能记住多少。”他虽然没有考我（也许他忘记了），但我一路上却很用心地观察了，从昌平向西转向南口后，我发现沿途只有一个特点：就是路两边的行道树都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角度一样，非常整齐。这是北京冬季西北风的杰作。

这时，大个子华侨望着我说：“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随口应声说：“好像是昌平往200号的公路上。”我感觉得到，不仅大个子华侨，车上几个人都有点吃惊。“嚯！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说了这句话，立刻就后悔了，我不该让他们知道我熟悉这一带的方位和地形环境。大个子华侨说：“还是把他蒙上吧！”

我觉得应该到200号公路了，但是车子没有向北转弯，那就应该向南口走了。又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向右（也就是向北）转弯了。听到采石

场采石机的声音。从采石机的声音判断，该是过了采石场，进南口了。同时汽车的马达吃力地喘着气，一定是在爬坡。这使我更加肯定已经进了南口。方向是八达岭。那么，只能是去三堡疗养院了。

车子左右摇摆着，这肯定是走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车停了，有人在里边喊话，似乎是叫我们进去。车子又开了几十米的样子，大个子华侨说：“下车吧。”同时把那条肮脏的蒙眼布扯下来。我下了车，往前即向北看，就是三堡疗养所无疑。但右手边多了一些没见过的平房。我们站在入口处的大桥上，下面桥洞的流水声依旧清晰可闻。这个大桥，一点也没变，只是在桥的东北角方向修了一座岗亭。

大个子华侨又开腔了：“喂！这是什么地方？”

我犹豫了两秒钟。我不能说“不知道”，但又不想说“知道”。最后我说：“我应该是来过的，这是三堡疗养院。但是，东北面的一些平房我没见过。”

大个子哼了一声：“你今晚就先睡在这边，明天再重新安排。”

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个大铁桶，是给我大小便用的。小便没有问题，大便可不“便”，每天要有一刻钟时间练“骑马蹲裆式”，之后，还要在他们监视下，把大铁桶拿到大桥外面一个常年流淌山水的泉眼外；把那个便桶洗干净。在化学馆的时候，我的“监护人”给我一条毛巾，一个牙刷，我认得这些东西是我家里的，一定是家属送来的东西。

第二天，开始了“审讯”，又问了许多问题，大部分是“老生常问”。有时候也有人动手打我几下。但总起来说，没有进展。

第三天，审讯完毕，已过了午夜，这是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我被送回囚室。关了灯，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那么倒霉？并且，似乎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开始还是模模糊糊的，后来慢慢清晰了。

这时，走廊的门响了。我马上躺下，拉上被子，假装睡着了。脚步声近了，走到我的囚室门口，从门上的洞口射进电筒的光亮。我不动声色。灯灭了，脚步声远去，走廊的门又响了，一切归于静寂。这是“三堡”囚室里每夜必演的一个“段子”。

我刚起身，披上棉袄，想继续再坐一会，忽然听到窗外面有些动静。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窗子。

这是一层的平房，窗子不高。我的“保镖”们在外窗台上用几块大石

头顶住两扇可以向外开启的窗。要从里面搬开石块，开启窗扇是很难的，尤其再想重新关上更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看见窗外的人影，把石块搬开以后又敲了敲窗子，做手势叫我把窗子打开。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窗。那人背着月光，我看不清他的脸。从声音上判断不是知识分子，似乎是个文化不高的人。

“你是不是清华的？”那人问。

我点了点头。

“他们打你了？”

我不置可否。心里在想着：这人是干什么的？来者“善”，还是“不善”？不能判断，还是小心为好。

“你走不走？你要想走，我们可以带你到南口，或昌平。今晚月亮好，我们骑车带你走。”

“我什么都没有。”我终于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我们就是想帮你一把，你肯定没钱也没东西的。你随便给点东西吧，你的手表、棉袄，有缘将来见面再说。”

我还是不吭声，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合逻辑，应该说，他无非是想要钱，现在我没有钱，他就随便要点东西，似乎不可靠。

我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这里做工的。行！你再想想。如果今天你走，就过个把小时再来，或者明天再来也可以。也就这两三天，没月亮时这条沟谁也不敢走。要明天走的话，还是这个时间。”说完他把两扇窗推进来示意我扣好，他在外面把几块大石头又摆好，倏忽不见了。

我一直睁眼躺到天亮，毫无睡意。那人也没有再出现。

我分析了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们就是想要点钱，没钱要个手表也行。但是，如果中间碰到危险，他们会弃你而去，他们没什么义务要帮你。那人几次讲都说“我们如何、如何……”这说明他不是一个人，还有同伙，一个人或几个人，都是不可信的，几个人还会起内讧的。

第二种可能，是我的“监护”人考察我的一种策略。这不论什么策略和什么结局，对我都是大凶的，没有好结果。我当时比较倾向是这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是团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想救我出去。但这也不合

情理。“团派”这时正是如日中天，形势好得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叛思想和行为。

第四种可能，是“团派”想再搞出点事，比如说逃跑事件，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伤害，或者借助外力（非学校内部的）伤害事故，没事也会变成有事。

这几种可能，都会搅乱我头脑逐渐形成的一些想法，我决定把这事挑开。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审讯开始，今天是孙耘主审。

他还没开口，我就抢先说：“我有些事想说！”

孙耘似乎有些吃惊。他问我：“是有什么东西要交代吗？我们有个安排，你配合我们的安排交代就行了。”

我说：“不是交代问题。”

孙耘有些迟疑，看了我一会，慢慢地说：“等一会再说吧！”他的表现，使我怀疑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似乎他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那天上午，“审讯”似乎马马虎虎地过去了。最后，孙耘说：“上午到此暂停。你说说，有什么事。”

我将夜里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当然，我没有说我估计的几种可能。

孙耘听了以后，没有做声。

午饭以后，下午的审讯又草草收场。孙耘又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昨晚的选择是对的。我是说，你没有选择跟他们走，这是对的。这可能避过了一场大灾难。你知道，从南口到八达岭这条沟，不用说夜晚，就是白天，大车队都得结队而行。除了坏人，还有狼群。你若跟他们走，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我保持沉默，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的话冲击了我头脑里逐渐形成的计划。我要放弃吗？在以后的审讯中，即使是受刑逼问的时候，有时也会“走神”，想着我的计划。

当晚，孙耘又布置了一个计划，叫我锁上房门和窗户。“无论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许动，不许做声，直到我们给你信息。”

这晚，我当然也睡不好。直到夜里三点左右，走廊的门响了，脚步声走到我门口，敲了几下，低声说，“没事了，你睡吧。”

次日，情况有些变化，先是把我调到疗养院西翼二楼一间朝南的房间。后来，他们又发现朝南的房间可以观察到疗养院大部分的活动，尤其是晚

上。如果有什么动静，他们不想我看到，只好用几只手电筒照射我的窗口，使得我看不到外面。这样当然还是不方便，于是把我调到朝北的房间。囚室在二楼，审讯在一楼西头朝北的一个套间。

最残暴的打手冯家驷又出现了，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审讯又要升级了，至少又要施行一项新的计划了，审讯方式也将有些变化。

他们分成几个组，每组两三个人。这两三个人里通常有一个人是打手。真正动手打人或审讯中用一些恶毒的恐吓性的语言来施加压力的，一般是这个打手。

我曾怀疑冯家驷是不是学生。我认为一个学生对老师下不了这样狠毒的手。然而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年级的学生，而且他打我不是最狠的，打饶慰慈、文学宓更厉害。对饶慰慈，根本不能提起此人此事。如果有人提起，她会全身颤抖，精神崩溃。

因为冯家驷又到了“三堡”，我估计不是好兆头。因此，我重新修订了我的计划，必须加快进度。

## 基督山伯爵助我逃出三堡

有两本小说是我青少年时就喜欢的书：一本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外国的《基督山恩仇记》。这两本小说，我更喜欢的是《基督山恩仇记》，因为它描写的东西和我们现代的生活更接近一些。读《三国演义》，我崇拜的偶像是诸葛亮和赵子龙，而读《基督山恩仇记》，我崇拜的偶像是爱德蒙·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

我第一次看《基督山恩仇记》是1948年底。当时，我在北京读高中一年级。解放军包围了北京，每隔两三分钟，市区落一颗炮弹。学校提前停课放寒假。这时我的大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基督山恩仇记》，一共厚厚的四大本。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看，个个在煤油灯下，开夜车读得津津有味。我就读了两遍。

共和国建立以后，这本书成了禁书。我考上清华后，还曾到图书馆查问这本书的下落。据说是根据上级指示，收进了“黄反书库”。

五十年代，在青年中流行一时的外国小说是《牛虻》等一些苏联的“革命”小说，我读起来总是觉得不如《基督山恩仇记》过瘾。我总是念念不忘大仲马的这部小说。

1959年，为指导学生文艺阅读及文艺创作，学校建立“文艺教研组”，

由党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林泰任主任，由我任副主任，主持教研组的日常工作，从宣传部、团委、文艺社团和政治课调来几个人就开张了。

林泰是我的同班同学，入学时他已是党员，我连团员都不是。但是我一直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从系团总支、党总支、校团委到党委宣传部。总是他在哪里，就调我到哪里。他离开哪里，我就填补他走后的空缺，然后再调到他手下。但是说实在的，对党团政治工作，尤其是宣传工作，我是最不喜欢的，几乎可以说是厌恶的。此刻，我被任命为他的副手，搞文艺阅读、创作及宣传写作，我也不喜欢。但他在宣传部的工作太多，忙不过来，无暇过问，而我则借口自己看书太少，想利用这个岗位的小小空间，抓紧时间多读点中外文艺作品。

当时，我又想起《基督山恩仇记》，就利用“工作之便”，到图书馆查问。图书馆的一位老师很负责，亲自带我到三楼的屋顶阁楼（即四楼）的“黄反书库”里去查，居然找到两套。我用党委宣传部的名义借出一套，又连续看了几个通宵，把这厚厚的几本书看完了。当然，那段时间我还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也许我这一生中，读书最多，密度最大的就是那几年。

“我想请你们帮我审查一下这本书。”我对宣传部的领导和宣传部负责思想工作的几位同事说。“把它列为禁书，关进‘黄反书库’是毫无道理的。我认为应该给一批书平黄平反。这样才能使学生群众的文艺阅读走上健康的轨道。”

结果，大家陆续都看了，个个都开夜车，都说大仲马的这本书是本好书，应该平反解禁。但后来因为下农村搞四清和搞文化大革命，平反解禁这事就没人再提起了。

文革动乱中，因为宣传部遭到红卫兵多次清查抄缴，这套锁在宣传部一个抽屉里的书，已经无影无踪。文革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回宣传部工作之后，曾多次打电话或上门“讨债”，但我没有也无法答复。这是后话。

我认为这部书最精彩的内容是：水手爱德蒙·邓蒂斯被陷害关进孤岛的死牢里，在那里巧遇了正在计划逃跑的法利亚长老，两人还成了忘年交。长老是一位绝顶聪明、很有学问和智慧的人。邓蒂斯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他们共同策划好了逃跑的路线和办法，不幸在即将成功实施前，长老重病发作死去。爱德蒙通过他们两间牢房地下挖通的地道将长老

的尸体搬到自己的牢房，“睡”在自己的床上，而把自己装进了长老床上的装尸体的袋子里。这样借着“海葬”逃出了孤岛死牢。之后爱德蒙又按照长老生前的指示，找到了一大笔财富，买了地中海中的一座叫基督山的小岛作为自己的领地，当起基督山伯爵，陆续完成了他报恩、复仇的计划。

故事曲折迂回，惊心动魄，含有深刻的哲理。我不管读了多少遍，仍然会有时拍案叫绝，有时掩卷沉思，有时潸然泪下，有时仰天大笑。其中有些故事情节非常精彩，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鸿文利用产假休息时间，也看了《基督山恩仇记》。她生下女儿才半年，就奉调去四川绵阳建设三线清华分校。

我还把这部小说借给她的同班同学林维南看过（林维南59年毕业以后曾给梁思成先生当过助手，后来调到北京日报当记者，我们当时常常见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首先是学校这边乱了，接着绵阳那边也乱了。有一天，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和林维南一起在日坛公园散步，他问我们学校的情况，并问我怕不怕？

我说：“怕也躲不开。”

林维南说：“你能挺住，我觉得你挺像《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我并没有否认。

那天，我刚好收到鸿文寄来的信。她虽人在绵阳分校，也挨了大字报轰击，但她更担心我。我回信说：“你放心吧，我能挺住，林维南说我像基督山伯爵，我也觉得有点像。黑夜过了，天总是要亮的。”

谁知，我这封信被在绵阳分校的学生查获，抄贴出来，而且还寄回学校，抄贴在工字厅前的大字报栏上。质问我报什么恩，复什么仇。说是地地道道的“变天帐”。搞得我很狼狈。好在没有多久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

在1·30被绑架以后，我常常想起这部小说，我会联想到其中的许多情节。有时我会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我会问爱德蒙·邓蒂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也问过法利亚长老：“我这样作对吗？”开始，还只是模模糊糊的想法，后来慢慢清晰了，具体了。渐渐地我知道，我常常想从《基督山恩仇记》里发掘的是什么？是“越狱”，是“逃跑”！

当我在化学馆一楼被命令掀起走廊里暖气沟的大方砖时，立刻就想起这条沟通到化学馆和音乐室之间的旱井，这是一条很好的逃跑路线。但当时因沟里的屎尿太多了，没有选择那条线路。

后来我被关到三堡疗养所西翼二楼朝北的房间时，一眼就看见房间中间系着一条粗的铜芯电线，可能是用来晾衣服的。但是送我进此房的人并没有注意。他一走，我马上把这条电线摘下来，卷好藏在床板下面。因为，法利亚长老挖地道用的铁工具，都是从他睡觉的床上拆下来的铁件改造成的。这条粗的铜芯电线，说不定将来也能派上用场呢。

他们每天晚上审讯我以后，吃过晚饭就在我的囚室正下方的一楼房间里开台打麻将。有时很热闹，甚至是吵闹。每天夜里差不多12点时，有一列火车喘着气爬坡上来，整个山谷天崩地裂地震动二十分钟，我想这是我逃跑的最佳时机。法利亚长老也是这样来选择时机的。

很多偶然的因素碰撞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奇迹，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有所安排。

有一天，冯家驷主审。除了随意耍了一会儿拳脚以外，他皮笑肉不笑地说：“给你透露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李康来了。你不是不承认吗？那我可要你们当场对质，你们互相咬，互相打吧！第二，我们从学校搬了录音机来，给你们录下音，在全校一广播……嘿嘿……。”

听了“老四”这一说，我的确有些紧张。我不怕录音机，因为有没有录音机也是一样的。我担心的是要我和自己的同事、老师和同学对质，甚至如66年8月在科学馆那样，逼迫林泰和何介人对打……我不能揭发，更不能动手打自己的同事，我要提前实现我的逃跑计划。

然而，坏消息里面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从冯家驷口音判断，饶慰慈和文学宓现在不在他们手上。

法利亚长老在死牢里会认真研究狱卒们的活动规律，我也研究过我的“监护人”或“保镖们”。我发现他们每天七、八点钟起床，在我的窗下大便，所以我窗下大约有十几、二十摊大便，在上面看得很清楚。要是黑夜里在一堆大便上跳下去，我真有些不情愿。

但是，时不我待了。我不知道准确的日期。但是按月亮圆缺望朔，可以估计日期已到了阴历二月底，正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月圆天空皎洁时运输马车结队而行，逃跑是不安全的。如果没有月光，听到有追兵的声音，还可以躲藏一阵。

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也都在一些偶然的互相碰撞以后，意外地得到了解决。

3月25日早晨，他们叫我：“出来，提上你的水桶。”我提上水桶跟

着他们从西翼的西门出去。“放下水桶，这里有把铁锹，去把北墙下清理一下。”这正合我意，首先我把那些大便清理了，挖了个坑埋起来。

同时，我发现我窗下的土地是松软的没有散水。二楼窗下还有一条线脚，距室外地面大约有2.8米左右，从二楼窗口出来可以蹬踩。我曾从2.5米的高度跳下过，估计跳下2.8米也不会成问题，何况下面是松软土质呢！

清理完了，放回铁锹。一个人说：“上前边小水沟那里洗一洗吧。”我没吱声，这已经有过两三次了，我就提起水桶向大门口的石桥走去，而他们大约有六七个人离我有十几步远跟着我。

大门口的石桥和疗养所主楼前广场有不到2米的高差，用十几步石台阶相连。

机会来了，这种机会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下了几步台阶，我的“保镖们”落后我十几步远，正好有个空档，他们看不见我，或者不能看见我的全部。这时，从下面走上来一个邮差，和我面对面近距离打个照面，但是我后面的“保镖”却刚好看不见。我在和邮差擦肩而过的时候，大胆地问了声：“师傅，这里到南口有多远？”他答：“三、四十里地吧！”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我没有回头看我的“保镖”，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从午夜十二点开始走，三、四十里路走四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可以走出南口。我会成功的！

于是，我的逃跑计划就臻于完善了。我兴奋不已，开始做最后的准备。最后，难得的机遇，又助了我一臂之力。

3月27日上午，还是冯家驷主审。除了例行公事的打骂以外，他到中午快结束的时候说：“你还是不肯交代吗？没关系，我们总有办法撬开你的嘴。我不会打死你的，我们要的是活口。你们不是有‘攻守同盟’吗？告诉你们，那没用。你看，你们之中不是有人招了吗？那时，有人被动，有人主动，那是你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给你24小时的思考时间，这24小时我们不干扰你。24小时后，明天下午，你再不交代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不担心什么攻守同盟，我在想这个“老四”所说的时间安排，刚好和我的逃跑计划相吻合。

中午，他们把一天的干粮送到我房间：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暖壶冷水。这是我一天的标准口粮。这人放下就走了，临走还说了句：“明天见！”

下午，我把整个计划又在心中排练了一次，并默默地问法利亚长老：“我这个计划有问题吗？能成功吗？”我听不见长老的回答，但是眼前出现一片云雾，云雾后面有一片密林的山沟。我明白，那是三堡西翼北面的山沟。那条山沟我知道，这是长老明示我就走那条向下通到车站的山沟。

1965年暑假我们带学生军训后在“三堡”写总结报告时，向武装部借了一支小口径手枪，就曾在那条山沟里练习打枪。

我知道只有从左侧一条土坡走下去，才能最安全最短距离地走出这条山沟，走到公路和铁路上。但这条路线还有几处地形不是很清楚，似乎还有陷阱。这时已无法搞清楚了，只能选择这条路线了。

白天，我从窗口向外搜寻，发现灌木丛中有一段树枝，长约1.2米左右长，粗约2公分，到时可以拣来防身或当拐杖用。

我打开窗向下看，一切都满意。不过，我原计划是将我收藏的电线绑在暖气管上再打上几个结子，从窗口慢慢滑下去。这样做，被发现的可能性大。首先是距离窗口太近，容易弄出声音，或可能从室内看到。还有，这条电线只能留在窗外，早晨他们起床外出大便时，就会看见这条电线，这样我就少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决定修改计划。

晚上十点钟了，我将房内有些文件、草稿纸之类的东西销毁，尽量少留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又将棉大衣塞到被里，弄成像是一个人睡在床上的样子。

我心想，爱德蒙·邓蒂斯是调换了法利亚长老的尸体，自己钻到装尸体的布袋里，而将法利亚长老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床上，骗过了狱卒，使他们对长老实行“海葬”时，从悬崖上抛下装尸体的布袋，爱德蒙·邓蒂斯乘机逃了出来。我现在没有他那么复杂，但是，我这是真的，他那是小说！

夜晚十二点，窗外天空漆黑，没有一点光亮。近处，我的囚室楼下，人声嘈杂，我的“保镖们”早已开台赌上了。远处渐渐由小到大，火车吐气挣扎费力爬坡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下定决心，把电线盘在身上，把没吃完的口粮包好扔到窗外地上，小心地翻出窗外，双脚踩在外窗下的线脚上，小心地关好窗子。转身看看，一切都满意，自己对自己笑了笑，默默感谢基督山伯爵和法利亚长老！当火车声最大时，我跳了下去。

我完成了逃跑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跳下、着地时，右腕扭伤了！我必须忍着痛走到南口。

## 午夜逃亡，与狼同行

在《基督山恩仇记》里，当法利亚长老和爱德蒙·邓蒂斯越狱计划正准备实施时，法利亚长老却第三次发病突然身亡了。爱德蒙·邓蒂斯虽然很悲痛，却突发奇想，……狱卒抬起装着邓蒂斯的布袋走到监狱外的悬崖边，将布袋荡了几下，就扔下了悬崖。“终于，随着一个可怕的冲击，他掉进了冰冷的海水里。当他落水的时候，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那声喊叫立刻被淹没在浪花里。”

我很喜欢这段描写，但我不希望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已下决心逃跑，像邓蒂斯一样，“不让自己有片刻时间来考虑这个决定，真的，要是他仔细想一想，他这种决心或许会动摇的。”

火车在山谷中轰鸣。我赶忙向右滚到黑暗中，看看“麻将友”们打得正欢。我在黑暗中躺了半分钟，活动活动那受伤的脚腕，发现还能动。虽然很痛，但还有感觉。我爬起来，捡起吃剩的窝头和那根粗的树枝，忍着脚腕的疼痛，踉踉跄跄地从左边一个小山沟滑下去。临下滑的时候，我回头最后看了看二楼黑暗的囚室和一楼打麻将的灯火辉煌处。

我对这个山沟并不陌生，1964年和1965年我曾在这里练习打小口径手枪。现在天色黑暗，没有月光，居然还有些光亮，伸手可见五指。我这时才明白什么叫“星光”。如果连“星光”也没有，可能要恐怖得多了。借着星光，我看到早春的残雪。我摸索着慢慢走到疗养所北边的另一条小沟，顺着这条沟就可以到三堡火车站。

五年以后（即1973年），我们从江西鲤鱼洲农场撤回北京，分批到三堡疗养所疗养的时候，我又到这条山沟踏勘了一下。我看到当年逃出三堡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一条极为危险的小山沟，宽不到30公分，左边是一个70~80公分高的坎，右边是山中积雪和已经开始融化的湿地，我居然平安走过，没有掉到坎下或踩到积雪融化了的湿地里！

突然，“呜……”一声拉长了的凄厉的声音从右边的山林深处发出。

我明白这是“狼嚎”！同时，远处传来许多不知是山谷回声，还是远处狼群的回应声。以前在疗养所时也常常在夜里听见过，不过没有这么近、这么恐怖。本来狼嚎已很恐怖和阴森，而远处的回声或回应，听起来就更加恐怖和阴森。然而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怕也没用，也没处躲了。

我立刻把缠绕在身上的粗铜芯电线解下来，摸黑弯成一个约60公分的圆圈。听说狼怕圆圈。五十年代，我和同学们到八达岭玩，看见山上的房

子和围墙上常常画了许多圆圈，据说就是用来防狼的。另外，听说狼多疑，你越害怕，它就越凶恶。所以我左手执圈，右手拄着粗树枝，一瘸一拐地从北山沟走下去。

走到三堡火车站时，火车已走远了。车站灯火通明，不见人影，安静得可怕。我在一个电灯杆下坐了一会，看了看脚腕，有些肿，吃力时还很痛，但可以动，我知道没有伤到骨头。我下决心继续走，走出南口。我没有选择，只能向前走。我起身，作了几下深呼吸，又艰难地上路了。

我只能沿着公路走，没有路灯，偶尔有几间房子门口有电灯，能照亮前后几十米远，然后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星光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走着。

山谷里潺潺水声虽然很有诗意，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奇怪的、我分辨不出哪里来的声音，还有就是狼嚎声。有时，狼的嚎叫好像近在咫尺。我马上环顾四周，能看见暗红的或暗绿的、恐怖的、阴森的眼光。走到有些光亮的地方时，这些阴森森的眼光就不见了。再走到黑暗的地方，又出现了。如果没有出现，就一定会有一声长长的狼嚎，接着远近又有呼应。有时我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但阴森森的眼光告诉我，它们离我很近了。我知道，遇到狼或野狗，都不能逃跑。跑，你就完了，何况我的脚受伤了，还真跑不动呢！所以它们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就把弯成的铜线圈和那根粗树枝前后舞动，又在路边借着星光找到几块稍稍大一点的石头放在路中间。狼多疑，不知我搞什么诡计，不敢轻易上前。有时走累了，我就坐在悬崖边的护路石墩上休息，背对悬崖，我想狼群不可能从背后袭击我。

大约四点钟，转过一个小山口，突然，前面山里出现一些亮光，同时还传来一些山谷中不应该出现的声音。渐渐地，亮光和声音都大了，我认出来，这是南口采石场的灯光和采石机械的声音。到南口了！我兴奋极了，甚至一时忘记了受伤脚腕的疼痛。当我想起跟了我一夜的狼群时，才发现它们都不见了。我面对那茫茫的大山、星空和长夜，心里默默感谢这些没有找我麻烦、并陪送我一夜的狼群。

五年以后，当我再次到三堡休养时，也曾一个人夜访山沟、野林和公路，希望能碰到那些狼群，至少能再听到那凄厉、可怕的狼嚎。可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吧！

这时，公路分了岔。直走，可能到南口火车站。左拐则可达昌平的一个跨过铁路的道口。守着道口有座小房子，小房子里外都有电灯，所以这个道口很光亮。我刚想找块石头坐下休息，忽然，小房子门开了，有一位

铁路工人咳嗽着出来，向路边泼了一盆水。

我就势向前问道：“师傅，经南口的火车有几趟？”

“两上两下。”师傅说：“北上去张家口方向的下午一趟，夜里一趟。南下北京城的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老师傅说着，又看了看我说：“您怎么一个人走夜路啊！这黑里吧唧的，够胆子！”

“谢谢您啦！”我不敢多说。

我心里算计着，现在唯有经昌平去北京一条路可能最安全。我估计，如果现在休息的话，伤脚就可能再也走不动了。

我又迈开那受伤脚，向昌平前进。我觉得最坏的可能已经过去了。这就是如果半夜里大约两点左右，他们巡查时，发现了我的被窝里不是我，而是棉衣；或者他们早晨打完牌，准备睡觉时巡查一下，发现被窝里不是我，发现这两种情况，他们会开出那部吉普车展开追捕。但当他们追到昌平时，我已到北京了。我藏在北京这么个大城市里，他们要抓我可不是很容易的事呢！于是我坚决地走下去！

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周围人和车的声音多起来了，还有些部队战士早晨出操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二、三、四……”

又累、又困、又饿的我，虽然咬紧牙关，硬挺着走下去，但也渐渐支持不住了。我想，如果我真的走不动了，在南口，我可以去找×××部队；在昌平，我可以去找昌平工程兵技术学校，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渐渐地，我出现了幻觉：

有很多影像出现，我仿佛觉得自己也在解放军的晨操队伍里，喊着口号……

这时，我仿佛看见那辆吉普车，看见开车的是冯家驷……

我仿佛看见昌平公路上转向“200号”和南口方向的路口，从那里往南一点就是昌平到北京德胜门的公交车站，我到了……

我失去了知觉……

## 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当我恢复知觉，睁开眼睛时，看见几位解放军正在看我上衣口袋里的东西。

“清华的工作证，清华的。”一位解放军说。

“醒了，醒了！”另一位说。

“喂，同志，你是不是要回清华去？我们通知清华来接你，我们是工程兵技术学校的。”

我摇头。

“我们送你上公共汽车？”

我点点头。

他们扶我起来，护送我慢慢走向汽车站。站台上正好有一辆空车待发，他们小心地扶我上车，安排我坐在司机后面第二排的位子上。

他们又问：“你认不认得路，身上有钱吗？”

我又点了点头。

“走好，我们回去了。”他们说完，又跟售票员说了几句什么。

过一会，车开了。我趴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同志，同志，醒一醒，您是上北京还是上清华？清河到了，上清华在这里转，上北京就到德胜门？”

我好像好久没有说话了，现在低声说：“德胜门！”

“您有钱买票吗？没钱不要紧……”售票员说。

我递给售票员一张5元的钞票，她给了我一张票和找回的一些钱。我也没注意看，就放回口袋。接着又趴在座椅靠背上，但没再昏睡，并逐渐清醒了。很快，车就到德胜门站了。

售票员对我说：“您走好，要不要我们帮您？”

我摇头，并说了声：“谢谢！”

下车一看，是德胜门外大街的南端。我慢慢走到护城河边，有一条石头台阶从河岸可以下到水边。护城河水虽然不是“清澈见底”，但至少不是浑浊的。

水面上映出了我的面孔：苍白，清瘦，眼睛无神，须发很长，鼻孔处还有些血痂……很像个逃犯。我手捧护城河水洗了洗脸。

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我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休息，同时，计划下一步棋该如何走。

首先，我应该决定先和谁联系？是先和家里联系，还是先和学校联系？我想，和学校联系太危险，因为学校所有机构目前都被团派控制，我没办法直接找到我最信任并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几个人。我逃跑以后，学校会乱一阵，老团会发疯一样追捕，而老四也会乱一阵。老四不乱，那肯定知道我已经安全了。老团就会拼命从老四内部探听有关我的信息。这种局

面对我而言是很危险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的目标还是要回到学校。虽然回学校相当危险，但往往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比如我深夜独自从坏人、野狼出没的山沟里走出来，非常危险，但事实证明这也是最安全的逃跑线路。

所以我决定先和家里联系。怎样联系？我脑子里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计划。

我以前常常骑车从学校回我父母家，或从父母家回清华。都经过这里，对这里很熟悉。1964年带学生到部队军训时，我记住了解放军团长的教导，走过什么地方，都要记得这地方有什么特点。现在派上用场了，我现在要用公共电话……

这时，时间已是早晨8点多了。我起身，慢慢走到德胜门内大约是鼓楼西街路北的一间小商铺前，我记得这里有个公用电话站。

我走上台阶，掀起厚厚的门帘，走进去。里面两个人，一个女的背对着门蹲在地上在整理什么东西，另一个男的坐着，和我打了个招呼。

我平时都讲标准的普通话，现在我却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师傅，可不可以用一下电话。”

那人说：“可以，本市一毛钱一次。”

我拨通了我父母家的传呼电话，我还必须用广东口音。因为那边的管理传呼电话站的正是查抄和占用我家房子的“街道积极分子”。

我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我找铃铛胡同15号院内李曼云（我母亲）家听电话，我姓刘。”

那边接电话的人说：“请稍等一下。”

也就两三分钟时间，但我感觉很长、很长。“喂，哪一位？”那边传来的是我父亲的很重的广东口音。

我立即用广东话说：“爹爹，是我，阿启，请你一定讲广东话，不要讲普通话。”

“他们放你回来了？”父亲问。

“不是，我逃出来的。请你告诉妈妈，请她放心。我现在去梓哥家（梓哥是我大姐夫何梓华，我大姐一直下放在昌平，经常不在家）。你不知道鸿文怎么样？”

“她昨天好像进城正在梓哥家，你大姐周末回来了，昨晚才回昌平。”

“孩子好吗？”我问。

“很好，放心啦。我叫你妈给你弄点吃的送去梓哥家。”父亲说。

“不要，今天中午以后，你们都不安全，他们会下令搜捕我。你们和孩子都要特别注意。如果送吃的东西给我，也不要到梓哥家里。今天中午12点以前送到日坛公园儿童游乐场去。”

打完电话，我准备去饶慰慈家。她家在一个深宅大院的最后一层院落，里面不知住了多少户人家。我进了大门，从右侧直巷走进去。我走了一半，连一个人影都不见，感觉不妙，立即停步。我想这样到她家，或被人看见，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还是马上回头吧！今天回想起来，我还后悔当时应该到她家，告诉她立即躲藏起来，也许她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从大宅院出来，我搭公共汽车，经过三个站，到张自忠路人民大学教工住宅区。

我艰难地走上我姐家所在的五楼。敲了门，是姐夫和他的一位同事开的门。姐夫一见我，吃了一惊，赶快叫我进去。我看见他家三房中最大的一间房里面坐满了人，好像在开会。他们也都看见我了。

我心里暗想：“糟糕！”

姐夫看出我的心事，就说：“没关系，都是自己人。”

但同时，他又提高嗓门，似乎有意让屋里的人都听到，大声说：“这里不安全，快走。”

这时，我看见鸿文走出来了。两个月没见了，我看她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我很内疚，是我害了她。但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姐夫拿出两把自行车钥匙说：“快走。”

然后似乎是不想让同事们听到，压低话音用广东话（他是广东南海人，和鸿文是同乡）说：“晚上七点以前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小声说：“在日坛公园附近。”

他说：“好，晚上七点在建国门向西行的马路上见面。”

我们很快下楼，骑着自行车离开人大宿舍。这时我才注意到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许多人在看大字报，因此也没有人注意我们。

出了张自忠路一号（原来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门，鸿文问我：“怎么走，上哪儿？”

我说上日坛公园方向。这时已经11点了，我告诉鸿文，母亲可能在12点以前到日坛公园来看我。

她批评我：“不应该让老人家冒这个险。”

这时，我才感觉自己很饿。一想到两个月来都是一天四个窝头一块咸菜，而且走了一夜，只吃过一点点干粮。这样一想，我更觉得饿得不得了。我叫鸿文去旁边小食店买点油饼或肉肠之类的熟食，她立即去买了。我也顾不上是否体面，就在大街上吃起来。吃完了，我们就骑车向日坛公园东门而去。

快到东门的时候，我忽然见到清华建四（64年建筑系毕业的学生）的陈书栋骑车迎面而来。我们两人对视了一秒钟，他似乎没有感觉。我则肯定不会认错人，是陈书栋无疑。我们向相反方向走过之后，我回头看他，他没有回头，说明他没有认出我。我曾想过：如果他认出我怎么办？我想我会如实地告诉他我如何被绑架，如何逃出来，蒯大富们正在追捕等等。我相信他听了会帮助我的。

他是清华建四的工农调干生，年级党支部书记，我教过他们，和他很熟。建四还有十几位工农调干学生，都非常朴实。虽然因基础不太好，学习成绩较差，但他们非常努力。他们差不多都比我大，但对我很尊敬。

66年文革开始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都被打成黑帮，游街戴高帽，每天定时要去看揭批大字报。有一天，我正在工字厅门前看大字报，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我认得是建四的调干生李春生。他见我剃了光头，一副落魄的样子，就笑着说：“罗先生，我是李春生，记得吗？”我苦笑，他说：“没事的，很快过去的。我在东北工作，现在是带领单位造反派来学习经验的。”还有一次是69年，按照林彪一号战令，我们大批教师干部奉命必须全家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并落户。鸿文已先一批去了江西，而我正在收拾行装。有一个很少钱的银行存折，也被查封了，身上一文不名，连饭堂的饭票都买不起，真是穷困交加。这时，我忽然接到两张20元的邮局汇款单，其中一张我认不出是谁寄来的。另一张汇款单的简短留言上写着：“罗先生，感谢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资助了我一王。”虽然没有写全名，只有一个“王”字，但就这一个王字，我已经想起是一位工农调干生王福勤。

到了日坛公园的儿童游乐场，鸿文注意到离东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较大的建筑物，是肿瘤医院，她说去看看，必要的时候可以混到复诊病人当中，可以躲避追捕。她很快就回来了，她说这个地方必要时可以用。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用这个“避难所”。

母亲来了，带了一饭盒炒饭，我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我们嘱咐母亲要小心保护自己和孙女，母亲含着眼泪离开公园回家去了。

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公园里，躲在灌木丛中一小块能照到太阳的空地上休息，我脱了鞋晒太阳。

鸿文欲哭无泪，她感叹说：“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说：“如果市政府或专政机关也说我是反革命，也要抓我，那我就真要反革命了！”

鸿文困惑地看着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也没再说什么，我怕她害怕，不敢再说了。

天慢慢暗了下来，公园里已空无一人，这里太静反而不安全。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先去看看林维南。他住北京日报宿舍，就在日坛公园附近。

我们到他家，停靠好自行车，爬上四楼，敲了几下门，林维南开了门。跟以往不同的是，他家走廊里的几个房门都是关着的，似乎有什么事。他见我们马上说：“小杨（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女儿，住了几天医院，今天才回家。你们别进去了，我妈妈为躲避印尼反华也刚回到北京……”

我把我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他叫我们到里面一个小房间，给我拿了一小瓶广东人喜欢用的跌打伤湿油，鸿文立即帮我涂抹并按摩了一阵。林维南又给了我一些粮票和钱，就催促我们赶紧离开，也没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心知肚明，情势是非常危险的，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不说，也不问。

林维南送我们出门。但和平时不一样，没有送我们下楼。我们慢慢走下楼。走到一楼单元门口，我开自行车锁时，不经意地看了右边单元的厨房一眼，发现一位男士正在注视着我。我心中有些不安，因北京日报很多人认识我。不只因为林维南，而且因为我负责宣传工作，和北京的几个报社都常有来往，认识不少人。几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担心。

七点钟，我们准时骑自行车到建国门大街，从建国门向天安门方向骑去。

不一会，姐夫不知从什么地方赶上来了。他说：“我找到了郁正汶，他答应我们先到他妻子的弟弟的家。他们两口子都姓李，都在五道口商场的的一个餐厅工作，人挺好。我们到他们家再商量怎么办。反正你们总不能在街头游荡。你们从这里向西走，在火车站口的方巾巷向北直走，到朝阳

门大街向东拐，出朝阳门再直走到三里河口右手边，在那里会面。郁正汶带你去他爱人的弟弟的家。现在，我和你们分开走。”

我们七点二十分到三里河街口。黑暗中似乎有好几个人影。我先看见姐夫，然后看见郁正汶。他是中国青年报的体育记者，是我大姐、姐夫的燕京新闻系的同学。院系调整后，燕京撤销，他们“改嫁”人大。从燕京时起，他们就常在我家聚会、碰头，似乎他们几位男生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后已平反。他在报社两派中很活跃，但他是天派的。不过，这在文革中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正因为他是天派的，与414是对立的，对我而言更安全一点。

我刚和郁正汶打招呼，问声好。

旁边闪出一个人，一把搂住我哭了。我吃了一惊，这才认出是大姐征敬。她很激动，断断续续地说：“受苦啦，挨打了没有？我昨天才回昌平，心里总不是很平静，似乎有什么事，整晚睡不着。今天一早晨我就决定赶回北京，一进门，阿梓（姐夫）就告诉我说你逃出来了。你看，我到现在心还在乱跳。”

姐夫厉声下令道：“别婆婆妈妈的，快点！马上随郁正汶走！下一步如何再商量。”

然后对大姐说：“你回家吧，这里人多了反而不安全，引人注目。”大姐很不情愿地离开了。

我们一行人则随郁正汶骑车进了三里河小区，左拐右拐转到了小李家。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晚，鸿文帮我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并在受伤处上了药。

这时，已过午夜十二点，正是我昨晚跳下楼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如果麻将友当中有一位外出小便，正在这时撞上我跳下来；如果麻将友当中有人听到一个重物堕地的声音，同时还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如果……。

“喂！”姐夫唤醒了我。“现在要有个打算。现在这里虽然安全，但你总不能永远躲在这里！”

我说：“我正在想，我应该回学校去。”几个人一起摇头反对。

我说：“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正是最安全的。”大家不说话。

姐夫说：“这样，明天我们出去看看形势，看看情况再说。”

郁正汶说：“我明天到清华去探听一下，最好能跟你们414的人接上

头，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如果他们也认为你回清华去最安全，那就听他们的安排了，但你得给我一个最安全可靠的接头人。”

我告诉他的接头人是李兆汉。

他随口问我：“可靠？”

我说：“100%。”

姐夫问：“你为什么不去找印甫盛和万润南呢？”

我回答：“不是不想找。但是将近两年来，学生宿舍变化很大，我没有把握能安全地找到他们。而且‘老团’一定很注意他们，因为他们和我关系很密切。”

讨论完了，我们已困得不行了。

临睡前，我还没有忘记问一问法利亚长老：“我这样做行吗？”

我没听见回答，就已进入梦乡。两个月来，我第一次安稳、平静地睡了一夜。

## 414总部指挥救援，回到学校

次日（三月二十九日），我们以急切的心情等着郁正汶。他去清华探听信息了。

天色渐暗，夜幕降临了，我们都有些焦虑不安了。一直等到午夜才听到楼下有搬自行车的声音，郁正汶回来了。这时已是三月三十日凌晨了。

郁正汶侃侃而谈，仔细描述了他去清华探回的以下信息：

“我到了清华，学校里还算平静，大字报栏里的内容并没有关于征启的事，看样子谁都摸不清真相，不愿先发制人。

晚饭以后，我去十七宿舍找李兆汉，他不在。他的夫人廉慧贞老师警惕性很高，盘问再三。我开始没有说谁叫我来的，她也躲躲闪闪。

最后，我说：是罗征启叫我来的，我是他姐姐罗征敬和姐夫何梓华的同学。罗征启逃出来了，他说除了李兆汉，别人都不能说！

廉老师说：‘李兆汉在主楼后厅开414的形势讨论会，我带你去。’

我们一起骑车到主楼，她很快在后厅找到李兆汉，李立即在后厅的大柱子后面和我见面，我只简单说了几句。

他说：‘行了，等一会儿一起说吧，我去通报一下，你稍等。’

我不放心，又叮嘱说：‘这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他笑了笑：‘你放心吧，等一会你见到这些头头就知道了。’

我当时还不明白，后来我参加了414高层会议‘讨论救援罗征启的事宜’，我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主楼后厅的会开完了。也许是因为我有事，所以觉得会是提前收场的。

换了一个小房间开会，只七八个人。为了保密，即便总部委员，也不一定都参加。414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主持这个会，先请我介绍一下情况。我只说了大概情况，连罗征启现在藏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说，他们也没有问。

沈如槐说：“现在情况很清楚了，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罗征启自己有什么意见？”

我说：‘罗征启的意见倾向于回到学校，他觉得老团一定认为他不敢回学校。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现在所有的车站、关口一定有人监控的，可能外逃比回学校更危险。’

讨论进行得很平静，很理性。大家比较倾向接罗征启回学校。于是沈如槐拍板，成立‘救援小组’，由宿长忠指挥。

沈如槐，宿长忠和其他414的头头真的都堪称将才，指挥作战，沉着又灵活。沈如槐拍板以后就叫无关的人退席，我知道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但是这事也不是三五人能干的。这时我才发现，小房间门外已经有几个人在等待宿长忠的命令。

沈如槐、宿长忠分派任务有序而且果断，从派汽车、司机是谁、车长是谁、接头地点、回学校的行车路线、进校以后的路线、校内外几个关键路口各派414战士若干守候，等汽车过了再散，到要求从下午起，守卫科学馆的人全部换成和罗征启比较熟悉的人，并且由‘二·二三战团’印甫盛负责……宿长忠一口气说完，简直滴水不漏。又指定了和我联系的人，以及指示如果情况有变化，如何联系。大家还对了表，规定行动时间是3月30日下午2:30，接征启的地点是朝外大街邮局。十点半左右先去邮局周围看看，如果有变动，会及时通知我们。

然后叫我先走，他们还在商量什么。我离开时已是三月三十日的一点多。”

听完郁正汶有声有色的介绍，已快深夜三点了。我们都松了口气，安心休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营救回校行动。

上午，郁正汶来了。他说：“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朝阳门外大街邮局骑车来回几次，测得平均时间是9分钟。但是，当他十点半钟去邮局联系的时候，414总部派人来说，情况有变，这个地点不能用，因为邮局里有三个

‘老团’，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走。虽然看样子不是为了我们，但总部为保险起见，还是决定修改计划。时间不变，地点改在邮局后边，有一个饭馆，门口是三条路，丁字型的交叉口，有情况时比较机动。总部说，汽车早晨已经出动，在市里转，同时注意有没有跟踪的尾巴。我看他们部署的还是很严密的。”

郁正汶说完，又去测新的联系地点到我们住的地方的距离和需要的时间。他昨夜没睡好，又跑来跑去，很辛苦，但看来他很兴奋。新的接头地点离住地的距离稍近了一点，需要五分半钟。这是他午饭前多次实测的结果。

我们一起吃过午饭，时间越来越近了。两点二十分，我们和主人告别。我也和鸿文话别，慢慢走下楼。虽然过了两天，我受伤的脚腕，吃力的时候还是很痛的。因为脚痛，不能跳上自行车后座，只能先坐好，请郁正汶从前面跨上车，我的脸顶住他的后背。

只听他说：“还有四分半、三分半、两分半、一分半、一分钟，前面已经看到接头地点了，还有30秒、20秒、快到了……”

这时从后面那条小街里冲出一辆吉普车，“嘎”的一声在我们的前面急刹车，这情形和两个月前“老团”抓我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我都来不及想，来不及惊慌、害怕，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一个大个子把我从自行车上拦腰抱起，轻轻放进吉普车后座，车里几位同学轮番拥抱了我，同时，车子几乎没停就加速开走了。司机我认得，是汽车实验室的张德禄。他扭过头来，对我亲切的笑了笑说：“受苦了！”

这时我才想起郁正汶，却早已看不见了。事后他说，当他听到急刹车的声音，也吓懵了，后来看到上车以后互相拥抱，才放下心来。

坐在司机旁的同学是这次救援行动的现场指挥，名字叫尹尊声。他没怎么理我，眼睛一直警惕地注视着道路周围的情况，不停地问“有没有异常？”

坐在我旁边和后面的几个同学都报告说：“没有异常。”

尹尊声和这几个同学一直不讲话，很紧张地注视着左右和后边道路上的情况。每到重要的路口，都会报告是否有异常情况。

吉普车在北京市区转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张师傅就说：“好！那咱们就上三环奔学校东门了。”

过了林学院，快到学校东门外铁路和去清河的公路交叉口，几个同学

都说：“看见安全暗号了，可以进学校，大家准备。”

一位同学给了我一件工作服上衣，一个帽子，还有一个平光眼镜，并轻松地说：“没事，别紧张。”

车子开到东门，尹尊声说：“看见我们的人了，看见安全的信号了，别停，中速进校门。”

进门以后，车子径直钻过主楼左侧的过街楼洞口向学生宿舍区开去。这条路要绕道稍远一些，而且经过学生活动区、宿舍区，两派学生都很多，一般人考虑不会选这条路的。

奇怪的是，已是下午4点左右，我居然看见不少同学在这个时间里，还在操场上锻炼身体，可惜马约翰先生已经去世，不然看到这一现象会很高兴的。

因为路上人多，车速还是慢下来了。车到大礼堂后边西侧的桥，开过去就是礼堂、闻亭、阶梯教室、科学馆后门。这时，张师傅发话了：“准备好，安全到达了！”

我只看见汽车对准科学馆后门前的小路，一位同学用一条大麻袋把我头蒙起来。同时，张师傅一踩油门，汽车冲到后门前，嘎然刹住停下。还是那位大个子同学，把我扛进门。

只听得守门人问道：“抓了个什么人？”

大个子说：“老团三动的。”

守门人说：“好呀！”

我被扛着上楼梯，又走了一段，进了个房间。把我放下，扯下麻袋，我看见印甫盛、万润南，沙春元等几位同学微笑着看着我，我这才感到“回到家”了。

这个房间是三楼存放实验仪器设备的，大门上又有小门，是借还仪器设备用的，现在则给我专用。有人敲门，查对是总部头头特许的人，则打开小门，把大门的钥匙送出去，开了大门，再伸手出小门将大门锁上。

没多久，大家就注意到，这里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神秘”还在于此人“住”进去后，就没见出来。几个学生每日三餐轮流送饭，每晚总有一个学生陪宿。每晚，当科学馆夜深人静后，这个神秘人才到男洗手间去方便以及漱洗一下。

## 家破人亡，逃离北京

我到科学馆三楼的“密室”住下以后，陆续就有414里熟悉我的几个头头来慰问，看我。我听得最多的慰问语是：“不容易！好好休息。”

在科学馆的“密室”住下的第二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走廊里传来吵架声，声音越来越大。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应该是414总部委员蒋南峰），他大发脾气：“我说多少次了，我不赞成打人，两边互相抓打，迟早有一天出大问题。你们再这样，我不干了。”

有几个人略有争辩地说：“我们不能只挨打、受气，吃眼前亏。”

我听他们提到我的名字，还说道“生死未明……等等”。

但蒋南峰还是非常坚决明确地反对打人、搞暴力，反对以牙还牙，以暴易暴。

我想，如果当年掌了权的蒯大富能像蒋南峰这样坚决反对打人，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或许会少死一些人呢。

有好几位414的同学问我，在老团那边打人最凶的是什么人，我说了冯家驷等人的情况。立即就有人提议采取报复性措施，并主张马上动手。但是沈如槐、汲鹏、宿长忠等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不可以这样。打人和被打的人都是好人。打人者中除了个别人外，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信仰，只是方向错了。我们不能以错对错，不断升级，这是不对的。

沈如槐他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些问题，如宿长忠几次问我，有没有发觉或感觉414内部有什么问题？更直白一点就是有没有内奸？有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说：“没有，老团虽然用刑逼供，但我觉得他们并不太了解414内部的情况。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很急躁地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

我还提请414总部注意保护文学宓、饶慰慈的人身安全问题。我逃出三堡那天，本想去饶慰慈家告诉她最好躲藏一段时间，并请她通知文学宓，但我怕到她家去引出更大的危险，所以没有去。

沈如槐等告诉我：“已经多次通知了文、饶等人，但他们似乎不太重视。”

我请他们注意，现在形势不断升级，不能不重视。

然而，文学宓、饶慰慈等人还是不太重视，终于不幸先后落入团派手中。对此，我颇感内疚。我跑掉了，他们却被捉到了。如果我不跑，他们是否可能避免被捉？

宿长忠还问我是否知道李康的情况。我说：“传说他出卖了414总部和许多同志，这事我不能证实。我不了解总部的情况，李康比我更不了解。他能出卖什么呢？我从三堡出逃前两天，冯家骊说李康已到三堡，说他交了很多东西，还拿了几叠手写的材料，说是李康的交代材料。他们并没有给我看，只是远远地在我面前晃了一下。书写字体的风格像是李康的，但他们念了几段内容，我觉得根本就对不上号，用李康的交代来攻我和文学宓等，或用我的来攻李康，都是空对空，都正好说明他们并不了解情况，至少并不了解更为深入的情况。”

我向总部报告说：“冯家骊他们有一次问我‘张正权’在414起什么作用？我装作没听见，也没表态。因为我认为张正权（校刊新清华的主编）人很正派，基本上没参加两派的活动。他倾向414是清楚的，但他从未表露，也没有得罪过人。”

宿长忠、汲鹏都表示根本不认识此人。后来工宣队证实，冯家骊所指的是科研处的章征文，发音差不多，但不是同一个人，是他们搞错了，这也证明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连续两三天414总部都派人向我通报了我家里的情况：鸿文可能藏在亲戚朋友家；大约4月2日“老团”抓了我父亲，之后又抓了北京日报的林维南。林的母亲因躲避印尼反华的浪潮，回到国内。她只会讲客家话，不会讲普通话，看见有人抓自己的儿子，就上前阻止，被踢倒在地（过不久就去世了）。主要是追查我的去向，但都没得到确实的信息。

听到这些消息，我非常不安，很难过和内疚。我自己逃出来了，安全了，但却连累了家人、朋友。

难道我错了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向法利亚长老请教。长老说：“这就是人生！你跳楼逃出来太顺利了，所以要让你摔一下、痛一下，但你还是没有全明白。要知道，人生总是顺、逆交替，苦、乐相随的，不可能事事都顺利！而你文革前的路走得很顺，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磨难，所以现在你要补上磨难这一课，还要为今后多积累一点。今天多受点苦，今后就可能少受一点苦！”

4月5日上午，我听到两派的广播台所播内容有些不对劲。团派的广播，一个劲地骂罗征启，并且一连说了几个“死”字：死不悔改、死不认罪、死有余辜等等。而414的广播，则一再声明，要贯彻中央关于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武斗伤人要依法处理。

听得我心惊肉跳，我感到一定出事了，因为父亲在他们手里。不会是父亲出事了吧？我心急如焚！

陪我住的几个学生吃过早饭都到“密室”来，他们都感到出事了，也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我的父亲。他们一方面陪着我，另一方面派两个人去打探一下确切的消息。

十点半左右，打探消息的学生回来了。几乎同时，414广播台播出了414总部的声明：说老团于4月3日晚抓了罗征启的胞弟罗征敷，在回学校路上，罗征敷因反抗遭殴打，并被用麻袋套住头，造成窒息身亡。对此，414严正声明这是犯罪行为，要求政府严肃法办杀人凶手……等等。

接着，汲鹏、宿长忠又来安慰我，我一直无言相对。

我的内心被痛苦、自责、压抑、愤怒……交替撕扯着，我说不出的话！我只能问法利亚长老：“这难道也算是‘磨练’吗？为什么不发生在我的身上，而要我的父亲、弟弟和朋友替我受罪？我真是后悔，我不该从三堡逃跑，我……”

我记得在《基督山恩仇记》里，当爱德蒙·邓蒂斯知道他的老父亲（老邓蒂斯）因他被陷害入狱而无依无靠，活活饿死时，他非常伤心、悲痛。他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感同身受，完全可以理解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的铜墨盒上镌刻着父亲亲手写的孟子的一段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1951年上清华时，父亲又给我一个铜墨盒，上面镌刻着另一段孟子的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如今，虽然我知道，这孝道之“始”和“终”，都有更深刻的内涵，但是，我实在无颜面对先贤的这两句经典的话。我自己的发肤没有毁伤，却伤害了父母和兄弟，这算什么“孝之始”呢！更不用说“孝之终”了。

弟弟去世以后，据说中央有位领导发话了，说必须依法处理，杀人要偿命。于是团派总部委员孙耘等人就出面自首，承担责任，并且很快放了我父亲和林维南（我直到几个月以后才见到他们）。团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广播台也不断叫骂，主要目标是“反革命分子罗征启”。接着又在4月15日左右抛出了一个“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似乎这个“集团”能定性，孙耘等人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两派的矛盾，如果只是思想观点上的争论，那倒也罢了。而今提高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伤残致命，甚至殃及亲属，我真无法想象将来何

时、由谁、用什么办法来收场！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我父母、亲友面前，尽可能回避这一话题，我不敢面对。

在《基督山恩仇记》中，爱德蒙·邓蒂斯逃出死牢之后，找到了大笔财富，开始了报恩、复仇的计划。我对大仲马关于爱德蒙报恩的描写，非常感动。书中描写他的恩人埃及王号船主摩莱尔因大风导致埃及王号沉没而破产，爱德蒙用他的财富复制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埃及王号，并装满了货，开进马赛港，挽救了准备自杀的摩莱尔。马赛港的民众惊奇地看着驶进港的埃及王号，喊着：埃及王号、埃及王号！我每次看到这段描写都激动得流下眼泪。但是，我对复仇的描写并不认同，我认为太过残酷，尤其是对待他新婚但被仇人弗南特霸占的妻子美茜蒂斯，以及她的儿子（亦即仇人的儿子）阿尔培，都太过份了。我想，仇是报了，然而，被复仇者的亲友、子女又要复仇……如此冤怨相报何时了？

过了几天，到4月15日，两派广播打仗又升级了。团派广播提出“打倒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并在前一天晚上，捉了文学宓、刘承娴（建筑系教园林设计的教师，时任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当天，团派下通缉令，命令饶慰慈到团派总部报到，而饶慰慈自认为没有问题，就到团派总部问询，当即被扣。团派广播台马上广播说饶慰慈“畏罪自首”，并欢呼“胜利”！414派则受到极大压力，连续发表声明，要求停止非法绑架干部，并要求依法惩办杀害罗征敷的凶手，并交出罗征启。

当夜，我像前几天一样，在科学馆已经安静下来之后，才去三楼的男盥洗室洗漱，却意外碰到楼庆西（他是建筑系的教师，是刘承娴的丈夫）。他看见我吃了一惊，问道：“传说你已经死了，你怎么样？”

我说：“我逃出来了。但他们又把刘承娴抓去了，真是无法无天！”

他又问：“你看他们会不会打她，会吃苦吗？”

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对手当中，有些已经失去理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对家属，我怎能说得出口？只好说：“不会吧！他们打我可以，但是对刘承娴、饶慰慈两位女教师……”。

楼庆西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然而，从此以后，我们两人都没有再见到刘承娴老师，他们的两个女儿，也从此失去了妈妈！

在所谓的“罗文李饶”这四个人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承

嫔，另一个是科学研究处的副处长徐一新，他受到通缉的时候，刚好不在学校，后来也受到追捕，最后414总部把他救到科学馆，直到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部进校制止武斗时，才从科学馆被解救出来。

其实，这六个人当中，我、文学宓和饶慰慈三人关系最密切，但是67年4月23日我在大礼堂414大会上发言时，代表的是六个人。所以，六个人都变成老团围捕的目标。

连续几天，两派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一直不停地借罗文李饶大做文章。随着广播互相攻击温度的快速提高，武斗的气氛也越来越浓。科学馆里“磨刀霍霍”，做“最坏的打算”。我没有出密室，但从听到的声音判断，科学馆里多了很多人。

大约4月20日，忽然，有人敲密室的门，很急促。但是密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根据平时的约定，没有“暗号”，不能开门。但是那个人继续敲门，而且越来越用力，并且说道：“喂！我知道里面有人，我们要检查一下窗户，你们得负责守住你们的窗户，明天要把钢窗焊死，还要发武器给你们。”听到这一番解释，我没有选择，只好把小门打开，并伸手开了大门的锁，把大门打开。

打开大门之后，我看那人并不认识。他一看见我，大概是认识我，吃了一惊说：“没有问题，您好好休息。明天下午，还是我来焊窗户。没事了。”他随后退出房间，问我要了那把大锁，从外面把门锁上。

第二天，还是他来，带了两个人和一些焊接设备。他自己进屋，把窗户焊上。走的时候，他向我鞠了个躬，说：“老师，您安心休息，我走了。”

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正式开场。当天，414是吃了败仗的，旧电机馆失守，很多人受了伤。

下午，汲鹏和印甫盛等来到“密室”。汲鹏对我说：“和沈如槐商量过，现在科学馆不安全了。万一这里发生大规模武斗，你在这里有危险。我们建议你离开这里。初步考虑，请李衍平陪你到他家乡去躲一躲。他是广东汕头人。汕头交通不很方便，清华同学也不多，老团不容易找到那里。李衍平是414‘37战团’的，是个写手，平时不大出头露面，陪你走比较安全，今晚就走。‘37战团’还派一个周家琮送你一程。东方红‘223战团’的印甫盛、万润南负责送你安全出北京，并负责以后和你联系。”

印甫盛问我：“身上有没有钱？”

我说：“有，很少。”

他说：“李衍平也没有钱。”

我就请印甫盛先去人大找我姐夫联系，要点钱，并且通知家里，我目前安全，但因学校武斗升级，不得已需暂时逃离北京。

当晚，天黑下来以后，科学馆里人声嘈杂，许多414同学跑来保卫科学馆。有些老师、同学或干部躲进了科学馆。每个窗户都安排了两个人守卫，武器是用水管自制的长矛。

大约7点30以后，汲鹏带李衍平、周家琮和万润南来到科学馆。汲鹏给了我一把车钥匙，告诉我：“等一下你紧跟我背后出去，外面有位同学在等着你。他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他，但他认得我。他看见我，就把车给你，你开了车锁就骑走，什么也不用说。你走科学馆南边过小桥、工字厅、静斋门前，到停车场，然后径直到主楼前东校门。”

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有问题，停了一下说：“是，你一个人，走静斋老团总部门前，他们绝对想不到‘罗文李饶’的首犯罗征启敢大摇大摆在老团总部前‘胜似闲庭信步’！”一边说一边还给了我一身工人穿的工作服、一个平光眼镜。

最后汲鹏说：“你在主楼前广场上和李衍平、周家琮他们会合，出东门走林学院。再往哪里走，你们再商量吧！”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等了两分钟，汲鹏似乎听到什么信号，站起来说：“走吧。”

我站起来，背了一个书包，拿了车钥匙，对汲鹏说：“替我向沈如槐、宿长忠、孙恕涛等几位告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汲鹏说：“我们也感谢你对414的支持。”

我说：“我也是414的。”

汲鹏笑了，说：“对，咱们后会有期，祝你们一路平安！”

我低下头，紧跟汲鹏背后。汲鹏带着我们在众人中挤出一条路来。中间有些人认出他：“汲鹏……”他就说：“等一下我回来找你。”到一楼后门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安全，对进出的人实施很严格的检查，所以人很多，很拥挤。汲鹏好不容易挤出去，门外等着进楼的人很多。

汲鹏把我带到他说的自行车前，低声对我说：“走吧！一路顺风！”

我没回头，也没说话，开了车锁，立刻推车向南边的小桥走去。上了桥，我才骑上车，经过工字厅、静斋、停车场、二校门，我按照约定第一

个到了主楼前。不一会李衍平、万润南也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周家琮最后一个到，原来是自行车出了问题。会合齐后，我们出东门，经林学院，往市区去。

当晚住在政法学院周家琮的一个老同学所在的学生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就到周家琮另一位亲戚家里，等着上午和印甫盛及我姐夫会合。

突然推门进来一位男士，是清华建筑系刘鸿滨老师。这个世界可真是小，我越不想碰到建筑系的人，以免得人家追问刘承娴的事，就越碰到。打了招呼，我马上说请不要说碰到我，连（夫人）高亦兰老师也别说，以免像林维南一样被追捕。

印甫盛来了，通知说姐夫在北京站和我见面。我们转到北京站，见到姐夫，得知这些天，家里被搞得很惨，孩子也差一点被团派的人抢走，幸好大杂院里一些邻居出面反对，才把孩子保下来。鸿文最近一直躲在人大新闻系的暗室里，姐夫等人想过几天把她送到我妹妹那里（河北省赞皇县），等形势平静了再作打算。于是，姐夫给了我一些钱和粮票，我们就在车站分手了。

按照414总部的安排，周家琮的任务是送我离开北京，于是，我们也在北京火车站道别。

我和李衍平、印甫盛、万润南四人上了去武汉、广州方向的火车。印、万两人的任务是送我到保定，之后，我和李衍平经武汉去广州。

在火车上，我们约定了几件事：第一，我的家族在广州有不少人，“罗征”什么有上百个，在广州容易被认出来，因此改姓谢，称“老谢”或谢老师，通信时用。姓谢也有谢谢大家之意。第二，万润南送我们到保定之后，不回学校，不参加学校武斗，而回宜兴老家，在家乡再准备一个避难点，以便衍平家里不能用时备用。阿南留下了家乡地址。第三，老印送我们到保定后，也不参加学校武斗。因“223战团”本来主要是保刘冰的，现在形势有变，只好暂时停止活动，但还应该把材料转移，留待形势好转时再用。这段时间，老印负责中间联络。还有建8的同学沙春元（家在江苏常州）和笔名老沙的工物系一位同学（家在湖南长沙），他们都是“223战团”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中部，可以多搞几个备用避难点，都由老印联系。第四，如果形势危急，就发电报“老谢速来”，则走东线从汕头经福建到上海再去宜兴，这条路比较安全。第五，没有老印的指令，不要妄动。如果失去联络，则找阿南。一般同学都以为他家在上海，不知道

他老家在宜兴。

车到保定，老印、阿南和我们道别，下车。

我和衍平继续南下，目的地是广东——我的家乡，又是我很陌生的地方！

## 逃难到陌生的故乡

4月26日到广州后，我和衍平商量在广州多住几天，过了“五一”再去汕头。他去找了华南工学院的同学，我们就在他同学的学生宿舍住了几天。

我讲普通话，宿舍的其他同学都讲广东话。他们以为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讲话也不回避我，让我听了许多新闻趣事，有时听得我几乎笑出声来。最有意思的是十几个人一起骂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中一个同学说：“喂！喂！喂！不是隔墙有耳，是房中有耳！”另一个说：“不要紧，这只耳只听普通话，听不懂广东话，就是江青来听也不要紧。”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我出生和受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北京，只偶尔回广州看望祖父母。家里保持了广东的传统。父亲对我有三条规定：回家要讲广东话；吃要吃广东东西；娶老婆要广东人。我基本上满足了这三条，但我的第一母语是普通话，广东话发音还可以，说话就很慢，不流利。至于许多广东的习俗，就更不大了解。

5月1日，我们在广州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衍平的家乡汕头。

早晨7点发车，到汕尾之前，每到一站司机都用普通话和广州话分别喊：到××站，或休息三分钟、上厕所之类。到汕尾时，司机用普通话、广州话和潮州话分别报站，并在汕尾吃的午饭。过汕尾后司机则用普通话、潮州话报站，不再用广州话报站了。

衍平告诉我从汕尾以后是讲潮州话的地区了。

我这才开始对广东的广州、潮州、客家、海南四大方言有了初步的概念。在广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潮州帮很厉害，你小心，别惹他们。你看见他们打架也别理，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干涉他们的事，打架的双方就会一起来打你，把你打跑了，他们再继续打。但是，我在汕头住了三个多月，觉得人们很平和，很悠闲自得，喝功夫茶是人生第一需要，没见过打架的，连吵架的都很少见。

下午四点多到达汕头市区小公园广场——人们这样称呼。其实没有公园，是一个几条路向外放射的小广场，广场旁边有个百货公司。

衍平说：“我妈妈是这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我们先去看看她。”

衍平的妈妈很清瘦，她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广州话，但她能听懂普通话，这就可以沟通交流了。见过妈妈——我此后也称她妈妈，我们就先回家了。家离小公园广场不远，很快就到了。

到吃晚饭时，陆续见了全家人。衍平的父亲是干部，会讲普通话，但讲得不标准。衍平有一个姐姐，已结婚住在外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都在上中、小学，能讲普通话，但不愿意主动讲。我还发觉潮州人中很多人会讲广州话，但不愿意讲，似乎有什么隔阂。

衍平家并不富裕，甚至还相当困难。家里人口多，又都在长身体和受教育的时期，开销很大，但对我却是倾囊相助。而我当时是既无钱、又无粮票，在他们家白吃白喝，真不好意思！

汕头人讲潮州话，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潮州地区的传统习俗也比广州地区要浓厚得多。比如吃饭、喝茶都尊男性先。每次吃饭都是衍平的父亲、衍平兄弟俩和我，我们四人先吃，吃完撤下去的饭菜才搬到另一房间给女性用餐。这一习俗使我非常不好意思，但也只能入乡随俗了。男人们吃完饭就摆开茶具开始“架”（吃）功夫茶（潮州地区的人每日必“架”）。男人们吃饭、喝茶，可以在敞开的房间，路上看得见的房间，甚至在街上，在广场上，而女人则不可以。我对这种习俗始终不能习惯。

衍平还召集了他的中学同学。其中有一个是清华化工系的，但他不认识我。有一个是华南理工学院的。都因为学校不平静，到处都喊着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打打、杀杀的，只好“逃难”回来，加衍平一共有6个人。他们都不太关心两派的争斗，认为都是胡闹。

其实汕头又何尝“平静”呢？汕头和整个潮州地区只是比全国各大、中城市相对平静些，原因除了这里的人比较平和之外，还因为这里没有大学，所以总的来说不算敏感。两派也互相对骂，但骂骂而已。一派称“三六”派，另一派叫“二七”派，加起来都是九，广东话“九”与“狗”同音，所以百姓民众以“狗咬狗”来调侃两派之争。

这几个同学来到之后，一起商量怎样消磨“逃难”生活。我的身份是清华的青年教师，他们只知道我姓罗，但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系、哪个专业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问。因为我年龄和他们相差不到十岁，似乎也没

有什么隔阂。他们都随衍平称呼我为“罗老师”。

在一个小工厂当技工的姓陈的同学提出，想学打桥牌。华南工学院的陈姓同学说他会，但只是初学，凑合打可以，但不会教，不会计分。我说我可以，于是花了两天时间把叫牌和计分的规则写下来。他们很聪明灵巧，很快就学会了。从此，每天晚饭和功夫茶之后，就开始打桥牌。我和当技工的陈同学合作打对家，衍平和华南工学院的陈同学合作打对家。从开始不熟练到熟练，渐入佳境。我们在汕头三个多月的大部分晚上，我们都消磨在桥牌上。

汕头属于亚热带气候。天晴时非常热，下午五点天气就开始凉下来。晚上有海风，很凉爽。于是市民都喜欢晚上出来在海边“架”（吃）功夫茶。晚上绝对看不见“狗咬狗”的争吵，只能听见一片“架、架、架”声（一般主人给客人斟茶后都说“请”用茶，客人回敬也说“请”；潮汕人则说“架”）。

汕头青年很喜欢音乐，尤其钟爱印尼音乐，满街都能听到印尼歌曲的声音。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叫“穿套衣的少女”。他们最常用来弹奏印尼歌曲的乐器是“曼陀林”，一种热带、亚热带常用的乐器。四对琴弦音程和小提琴一样，左手指法也和小提琴一样，只是小提琴用右手拉弓，曼陀林用右手拨片。会小提琴的人，弹奏曼陀林没有问题，不用学。常用来伴奏的乐器是六弦琴吉他，还有一种辅助吉他伴奏的是“尤克里利”，四条弦的音程配置也和小提琴一样，因此左手指法也一样，右手是拨弦弹奏合声，或伴奏另一声部；低声部一般用吉他伴奏就可以，如果想音色再美一些，还可以加一个大提琴的拨弦。

有一天在街上，我们看见一个“流动小乐队”。一部自行车，骑车的人唱出“穿套衣的少女”的主旋律第一声部，吉他手坐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弹着伴奏，跟着是“曼陀林”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弹奏着带伴奏的主旋律第二声部。面向后骑坐在后座的大提琴手用拨弦演奏伴奏的低声部。

这个流动的演出，刺激了我们每个人的音乐细胞，“我们可以比他们更精彩！”不知谁说了一句。

原来，除衍平没学过什么乐器外，其他五位同学中，有一位会拉大提琴，加我有三位小提琴手，还有一位会“曼陀林”，只是没有吉他手。而我玩过吉他。弹伴奏不成问题。于是衍平出去跑了一个下午，居然借齐了各种乐器。并且，他发奋努力，很快学习了“曼陀林”的弹奏，弹个歌曲

大概可以“充数”了。此后，每天晚饭后，喝过功夫茶，在等齐桥牌的牌友前又多了一个娱乐的节目。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合奏，衍平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说：“好听极了，街上好多人停步听我们的演奏，都在打听是从哪里来的乐队，有人说是清华大学的。”

“清华大学有个小乐队到汕头了！”这一信息在一两天之内，就传遍这个海滨城市。但我感觉这并非好事，果然……

一天下午，大家接到派出所通知，要求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回到汕头的大学生以及外来人员都限期要报户口、登记。我考虑和衍平商量，并拿出工作证给他看。我说看样子不报户口是不行的，但用什么名义报？如果报“罗征启”，清华团派那边打个电话过来，就不好办了。我想用我们建筑系师生拿手的改图办法，用剃须刀片轻轻削下一层，把工作证上的名字改一下。怎样削改呢？这里衍平的几个同学都称呼我“罗老师”，所以“姓”不改了。然后第二个字是简体字“征”字，整个削掉。第三个字工作证上是繁体字“啟”字，我看工作证上的“启”和“文”分得比较开，可以将“启”字削掉，留下“文”字，那就成了“罗文”两个字。我觉得还满意，衍平说“没意见”。我看他是不在意。我想吃完饭再动手改。

接下去吃晚饭，喝功夫茶，玩了会乐器。打桥牌的人还没到齐，我还没有动手改身份证。忽然，人声嘈杂，进来几个民警，说是查户口。但民警说只查外地来的，本地的不查。结果只是我、衍平和华南工学院的那位同学三人属外地的户口，那位清华同学刚好还未到。

民警说：“你们三位带齐证件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

我心中暗自紧张，心想这下糟了！到那里怎样填报身份资料呢？

到了派出所，民警让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等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也不理我们。过了深夜十二点，民警来了，发给每人两张表格要求马上填写。

我因为工作证上的照片改不了，犹豫再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填了“罗征啟”，工作填“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籍贯填“北京……”。

我对衍平说：“没办法，只好如此。”

过了十几分钟，民警来了，非常严肃地说：“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从北京、广州等地来，那些城市、大学都在闹派性，骂来骂去。我们强

调，你们回家、探亲都可以，只一条，不许串联，不许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你们违反规定参与当地的文化革命，我们会立即赶你们走。如果你们同意，就在所填表格最下面写上：‘我保证不参与当地文化革命，如果违反，甘愿立即被送出境！’”

我们立即写了保证，签了字，交上去了。

几个小时以来，那位慈眉善目但是很严肃的民警第一次露出笑容说：“你们可以回家了。”

我们当然恨不得马上回到家，妈妈一定还在等着我们。

一出派出所的门，我看见门前这条不太宽的路对面有个大字报栏，我一看几乎昏倒！因为上面仅有一张“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通缉令”，内容是：最近清华大学正在开展对“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特勒令这个集团的成员立即前来报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张通缉令中没有提到“罗征启”这个名字，但三次提到“罗文李饶”，且分别在“罗文”和“李饶”上打了红叉。

可能是这边抄写大字报的人不知实情，以为“罗文”是一个人，“李饶”又是一个人，所以按当时的惯例，在反革命分子的名字上打了红叉。

这倒救了我。我想：如果我下午动手把工作证改了，如果我晚上下决心就填上个姓名“罗文”，那情况会怎么样呢？这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帮我，帮我“趋吉避凶”。我还得个教训，任何事都不要急，慢一步也许就自然解决了。

我们回到家，果然，爸爸、妈妈都还没有睡。衍平报告了经过，他们都讲潮州话，我听不懂，但看见他们眉开眼笑了。

衍平告诉我：“妈妈说，你是好人，菩萨会保护你的。”

除了打牌，玩玩乐器以外，还有一个节目就是游泳，到汕头海边游泳。其实，汕头的海实际上是内海，从汕头到对面有一千多米，在当中漂浮着几个水鼓，离岸约500米，游个来回就有1000米有多。但是要计算好涨潮和退潮的时间。要游出去到水鼓，须在不涨不落的退潮之尾，游出去休息一下就趁涨潮之始游回来。如果计算错误，游出去以后碰上退潮，可能被冲出内海，回不来了。所以我们每次游泳时，这里的人对我强调无数次，要计算好，而且无论如何，一定要有识水性的当地人陪同，否则不准游出去。

还有一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衍平家，是和他同睡一张挂了蚊帐

的大床上。这间房间不大，没有窗，只在东侧墙开了个小缺口，做了一个小天井，通风采光都靠它了。我们男人吃饭、喝功夫茶、小乐队、打桥牌和其他活动都在这间黑房间里。

1968年6月12日凌晨大约五点左右，天还黑着（每天都是我早起）。这时还不到起床时间，我朦朦胧胧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刘承娴老师两手各拉着一个她的女儿，从一个楼梯上面走下来，对着我笑了一下。我刚要说话，就醒了。

这时我觉得头脑很清晰。奇怪的是，我知道她有两个女儿，但从未见过，但在梦里面却出现了很明显、很清晰的形象。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1982年，我随刘达出访荷兰。刘达告我刘承娴的大女儿楼虹在荷兰读书。后来通过中国代办处（当时因荷兰政府出售潜艇给台湾使中荷关系从大使馆级降为代办处级）安排，我们见到楼虹。我感到很奇怪，她竟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想，也许她妈妈临终时把孩子托付给我。但是刘承娴和饶慰慈最好，又和文学宓同在统战部工作，本应将孩子托付给文、饶。但是我和刘老师以及她的爱人楼老师都在同一个系工作，而且她当时可能知道我已逃脱，所以……

我醒来之后，就叫醒衍平，把我的梦告诉了他。

他睡眼惺忪地说：“就是个梦吧，快睡吧，还能睡一会。”转过头又呼呼睡着了。

天亮了，吃早饭时，我见过妈妈，道过早安以后，我就将做梦的情况告诉她。我讲普通话，她听懂了，但她说什么我没听懂。后来衍平告诉我，妈妈说，罗老师想家了，你们陪他出去走一走。他心情不好，你们注意他的安全。

衍平叫来两位同学，一位是会拉大提琴的张同学，每次去游泳都是他骑车搭我去海边。他来了以后，大家商量先到公园去打桥牌。张同学又翻了翻日历：公历6月12日，阴历五月十七日。算一下下午还可以游泳。查阴历是因为算潮起潮落，要用阴历。也正因为如此，当天的日期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6月22日上午，邮局送来一封挂号信。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收到来自学校的好几封信，都是报告一些不好的消息，如5·30大武斗，双方死伤多少之类的。收信人都是李衍平。但这次却没有写收信人，寄信人只是写

“清华大学”。打开一看信的内容是：刘承娴同志于1968年6月12日凌晨，因为伤重不幸去世……

看到“6月12日凌晨”，我们都张大了嘴，屏住呼吸，立即想起我的梦！

收到刘承娴的噩耗以后，虽然逃难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可是大家情绪明显低落了。

一天晚上在桥牌局上，有人叹声气说：“这武斗要斗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另一个说：“毛主席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叫‘到底’呢？”

过了些天，又陆续接到学校的几封信。其中有印甫盛的，也有万润南的。他们报道了学校进驻了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初步消息，蒯大富被夺权了，414的困境初步解除了。

接着，派出所通知我们说：“清华的武斗已经制止，你们该回去复课闹革命了。”并连续两三天，天天来下逐客令。

于是，我和衍平决定立即回广州。我可以去鸿文家，衍平准备先回学校，观察一下形势，再通知我是否及时回校。

当衍平和他的几个同学商量并告别时，那位清华工物系的同学自告奋勇，可以帮我们买公共汽车的票。于是衍平把自己的学生证和我的工作证拿给他。

他看了我的名字，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挤出一句话说：“和我们一起打了几个月桥牌的，其实是个冤死鬼！”

八月五日，我们坐上去广州的公共汽车。妈妈搂着我哭了。爸爸送我们上车。车启动以后，他又骑车赶到汕头市出口的过海大桥的桥头送我们。

我在汕头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渐渐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也产生了一些感情。虽然很多习俗我不习惯，但一点也不会影响我对衍平的家人、同学，特别是衍平妈妈（我也称她妈妈）的感恩之情！我祝福他们！

从这时起，广东对我而言，渐渐地不再陌生了。除了在广州我有自己的家和妻子鸿文的家外，我又在汕头多了个家。

我常常想着回家看看老妈妈。局势大体平静以后，我曾寄过几次全国粮票给妈妈。衍平的弟弟高中毕业，正是“能吃”的时候，我想妈妈一定经常为粮票发愁呢！

1983年，我奉调到深圳大学工作。1984年元旦——我到广东工作后的第一个元旦，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看望我在汕头的妈妈。当时，衍平在广西工作，没有回来。我见到已经退休多年的年迈的妈妈，我搂住她叫“妈妈！”我们母子俩和在场的人都哭了。

这一段经历证明：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有的人帮助或救助过你，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要报恩的名单，比需要报仇的名单要长许多，而且越来越长。从这时起，我觉得我和基督山伯爵在对待“报恩”和“复仇”的处理和想法上分歧开始加大。

### 清华，我回来啦！

我们从汕头坐公交车十个小时后到达广州，我到鸿文的家里住下。鸿文已先期自河北赞皇县到达广州，我们也算是团聚了。她们家也是个大家庭。她父亲的兄弟姐妹有十几个，“梁鸿”这个辈份也有几十个。她的妈妈也是个慈祥、善良的妈妈，对我这个身陷困境的女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就在她的关怀照顾下在广州又住了一个半月。

我和北京、学校经常有联系。学校传来的信息还比较好，但许多人认为，老团的势力还很大。而且毛泽东“7·28”接见时对414批评颇多，虽然没有定性的结论，但也是够团派利用来攻击414的了。另外，据传文、李、饶还被关押在卫戍区；也有说并非关押，而是监护。所以，学校许多414的朋友一直主张我暂时不要回北京。

而我按照出逃时与汲鹏的约定，一直在等待印甫盛的通知。终于，9月中通知到了。印甫盛在信中说：蒯大富在清华的势力肯定翻不过来了，我们的意见是你可以回来了，工、军宣队也认为你应该回来了。你买好票后，想办法通知我们。为保证安全，你的行踪还是保密为好。

9月21日，我和鸿文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我们只通知了在人大的大姐夫和大姐。他们的意见是等安全到达北京后，再设法通知学校。

我们的票是硬卧中、下铺。列车开出广州站时，我们对面的上、中、下铺都空着。过了一会儿，上来两个人，对了一下号，就落座在我们对面。这时，我突然觉得其中一个年轻人很面熟，我拼命去想是在哪里见过。这时我的感觉和1·30事件团派到北京站我家里去抓我时一样。我听到他们两人讲的是普通话，我就用广东话通知鸿文，说对面那个人可能——不是可能，我已经想起来，那是八九老红卫兵保卫组的，似乎也监管过中层干

部的劳改队，所以肯定认识我。听说这批人后来大部分被吸收到团派总部的保卫组里。我告诉鸿文，我现在的感觉同1·30事件开始时一样。鸿文惊恐万分。我只好说，现在他们不敢怎么样，到北京时再说吧。

火车到达衡阳。是个大站，上、下车的人很多。这时上来两个人，他们用很标准的广东话和我们对面的那位打了招呼。

这下我知道坏事了，我们的“语言”优势没了，不能无所顾及地说话了。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话都不敢多说了。

这时，刚上来一位说：“我们在那边已买了卧铺票，离餐车比较近，你们搬到我们那边去，可以打牌啦！”

于是，对面那两个人收拾东西随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我才感觉到我已出了一身冷汗。

火车到丰台站了，我们整理好东西，我穿上出逃时汲鹏给我的工装上衣，戴上他给我的平光眼镜，做好下车准备。列车在减速进站。我们从车窗看出去，认出站上许多清华的人。我又紧张起来！难道又是为我来的？这时已经过了中午。

列车减速进站时，我从接车的人群中还看到我大姐的身影。她也看见我们了，但没来得及打招呼。

列车停下后，大姐挤到我们这节车窗前说：“别下车，我上来。”

说罢，她就拼命向车箱东门挤去。在乘客下车不到一半的时候，她居然挤上车来了。她说：“怎么办，站上全是清华的人，老蒯和老团总部的头头都在站台上，是不是冲着你来的？”

我茫然不知所措，脑子里空白了半分钟，等恢复了思考后对大姐说：“现在情况不明，但是拖延只能等死，必须马上行动。不然乘客走光了，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和鸿文分头走。鸿文直接回家，在家里等候。如果明天早晨以前没有我的消息，那就到学校报告工、军宣队。如果今天下午平安无事，那就通知我回家，明天回学校。我和大姐分头走，到火车站外的公交车站会合，会合以后先到日坛公园……”

大姐插话说：“不，去龙潭湖公园，那里僻静。”

“就这样定，走吧！如果吃过午饭情况没有变化，你到龙潭湖公园来会我。”我对鸿文说。

说完我就低下头跟着一位较高大的乘客下了车，向出站口走去。

在出站口两边等候接人的人群中，我认出一个建筑系的学生周坚（他

是支持414的，曾写过一篇著名支持414保护干部的政策大字报。他的观点是保护干部就应该像老母鸡保护她的小鸡那样……于是，团派的大字报嘲笑他，给他起了个雅号叫“老母鸡”。虽然他是个粗壮的男子汉，但团派大字报中竟用了“她”字。后来414的同学也亲切地称她为“老母鸡”。)我和他对视了一秒钟，他若有所思，我没有打招呼就径直出站了。

我在火车站外公交车站见到随后而来的大姐，我们上了公交车，直接去龙潭湖公园。

我们姐弟俩坐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等了一个多小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使我们没办法相互了解我们南下逃难的情况及北京、家里的情况，我甚至连孩子的情况也没有问一声。两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一百多米外的公园东门。

这是一个开放不收费的公园。但是除了我们两个人，可看到的地方，连个人影也没有。

“鸿文早就应该到了，怎么还不到？会不会出事？她虽然没来过这里，你把公共汽车多少路都告诉她了，又不需要转车，不会有什么事。”我说。

大姐坐不住了，说：“我回去看看，这来回也就半个多钟头。”

我说：“好。”

大姐临走又再三叮嘱我，不要到处乱跑，失去联系不好办。又给我一张白纸条，如果发现情况有变，也来不及躲藏逃跑，你就将这纸条扔在这个长椅下面。我们再和学校工、军宣队联系。

我答应了，并送她到公园门口，看着她上了公共汽车。

这时，偌大的公园，就我一个人了，够冷清的。

又等了三刻钟，还是没有消息，我有点不耐烦了，就向公园东大门走去。出了门就向他们来的方向望去，车很少，行人也很少。忽然，我看见一辆吉普车，就像“1·30案”中绑架我那辆车一样，也像张师傅开来救我回学校的那部车一样，总之就是很熟悉的一部车，肯定是清华的车。我马上紧张起来，仔细看一下，不对头！这辆车正以很快的速度朝公园大门开来。我急忙进了公园门，向我坐过的那张长椅走去。我脚伤尚未痊愈，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走到长椅前，回头一看，真要命！那辆车已进了公园的大门，且径直向我开来。

情况不妙，我赶紧把那张小纸条丢到长椅下，然后向长椅后面的灌木丛走去。当时，我的思想又是一片空白。

那辆车开得很快，到那张长椅前停下来了，我不敢回头，只听得一个女人用广东话叫我。

“阿启，不用怕，是工人宣传队的师傅听说你回来了，怕有什么事，所以派了一位姓刘的副队长来看你。”是我母亲的声音。这简直难以想象，但这是我的母亲无疑。

我转身走向汽车，妈妈眼含着眼泪跟我解释：工宣队来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不信，不肯说你的下落。他们再三解释，又拿出他们的证件，我才答应带他们来。

工宣队的刘师傅一边请我上车坐在母亲旁边，一边看着我一脸狐疑的样子解释说：“有人向工宣队报告说看见你回到北京了，工、军宣队考虑你的安全，派我们来看看，看你有什么困难。考虑到你离京有大半年了，家里的人都在等着你，所以我们想你先在家里休息一下，过两三天我们再来接你回去。”

这样一说就解除了我的疑虑，安心坐车回家了。

一进家门，第一个迎着跑过来的是我四岁的女儿。从这时起，一直到晚上睡觉，她都不肯离开我。我抱着女儿，在母亲的陪同下，去访问大杂院里的每一户人家，感谢他们关照我家的老小。靠近院门的那“告密”的一户，已经搬走了。

晚上十一点，父母窄小拥挤的一间半房间里，睡了六七个人。我已睡下，还未熄灯，忽然门外有动静，接着有人轻轻敲门。

我离门最近，起身先问：“谁？”

门外的人说：“我是工宣队的老刘。”

我披上衣服，尽快开开门。

门外一共有三个人，只有刘师傅进得门来。他说：“工、军宣队考虑再三，还是派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下。你回到北京，学校已经有所传闻。工、军宣队考虑，学校情况还很复杂，有人贴大字报，要求审判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也有大字报说工、军宣队不应该把罗征启保护起来，应该让他接受审查和批判，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清华的武斗……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形对你来说还有一定危险，所以才来建议你今晚回学校住，这样比较安全。”

我听他这一说很气愤，蒯大富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现在还不肯放手？

我本想愤然拒绝，但刘师傅和颜悦色，且温和地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今晚不做决定也可以，我们是考虑你和你家里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不要再大了，不要白白付出这些代价。我们工、军宣队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五条人命和七百多人的血，我们也不希望白白付出呢！”

我第一次听到五条人命和七百多人受伤，我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为了清华，为了学生，为了我们这些干部，包括我。但是损失比清华、比师生干部还大……

我默默地穿好衣服，告别父、母、妻子。孩子已熟睡了，我请他们替我跟孩子尽量解释清楚。我拿了一点衣物，就出门，跟刘师傅他们的车回校了。

夜里我们回到了清华。刘师傅对我说：“带你去见两个人。”他叫车子开到新水利馆，在三楼的一间屋里，里面有一男一女，都披着军大衣。灯光较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听到声音。女的还比较和气，男的则傲气十足，有点匪气。

刘师傅小声对我说：“这是迟群、谢静宜同志。”

然后接着说：“迟主任，这就是罗征启同志。”

迟群拉长了声音说：“哦，你就是罗征启？”

之后，他们两人低声商议了一会，抬头对刘师傅说：“那好吧，就按商量好的意见办吧。”

汽车又把刘师傅和我送到生物馆。刘师傅和我到了二楼东头南的一间教室，几位工宣队师傅把教师的讲台拉出来，放到教室中央。

刘师傅说：“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还住着一些人，你暂时不能和任何人联系。你要上厕所盥洗室，打开门朝楼梯那边打个招呼，我们会给你安排。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你这个门平时要从里面锁上，你早点休息吧。”

我铺好床，关了灯，也颇有睡意。但是，几分钟功夫，我身上就起了许多大疱，痒得无法睡。我起来开灯一看，是臭虫，而且多得随便动一下就能碾死几个，翻个身都可以压死一片。我此生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我开门打了招呼，三个师傅过来看了忙说：“对不起，我去拿药。”

他们拿了一瓶杀虫剂，还有一个喷雾器，留下一位师傅帮我，对臭虫来了个歼灭战，这天晚上才能睡觉。

第二天，我问师傅要了扫帚和簸箕，扫了一堆死臭虫。

我发觉，在二楼当中楼梯附近的一间教室住着二十几个人。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我要去厕所，就要把他们关在教室里，等我用完厕所，再放他们出来。每天早晨，他们集体搞卫生，包括走廊的卫生。从第三天开始，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他们搞卫生的时候，有个人故意在我住的教室门前多逗留了一会，故意咳嗽一下，我听出来是何介人。

我趴在门上轻轻说：“何介，是我。”

听得出来他笑了。“罗卜，我知道就是你。你没死？哈哈！饶慰慈和文学宓有消息吗？”

我说：“不确切，听说送去卫戍区监护起来了。”

何介人又说：“工字厅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行了，再谈。”

以后有好几次，我们都是借打扫走廊的机会说上几句话。

十月中旬，有一天早晨，我感到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早饭后，工、军宣队师傅特别来我住的教室看了看。过了一会又有一个海军的领导来巡视一番，工人师傅向我介绍说，这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副总指挥，姓刘，我们都称他刘队长，代表海军派来工作的。

我说：“我不认识他，但似乎见过。他是不是‘7·27’前来过？还有几位海军军官，对414比较好。当时他们就是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的。”

工人师傅没有回答。

我想不管怎么样，今天似乎会有什么变化，希望往好的方向变。回校三个星期了，没有人理我，只有一天三次吃饭时听全校广播。

刘队长来过以后，住在楼梯附近的教室的“走资派”们（我对何介人这样称呼他们，何介人也牙还牙，称我为“反革命”）似乎有些动作。不到九点都不见了，生物馆中只剩下几位工宣队师傅和我了。我确定一定有事。

将近十点，生物馆有动静了，一个看着像领导的工人师傅带着几个人到我住的教室。他粗眉大眼，戴个眼镜，看起来正派、严厉，肯定是一位说话算数、毫不妥协的人。

一位师傅对他说：“老柳，这就是罗征启。”

同时，扭过头对我说：“这是工宣队副总指挥柳一安同志，他来看你。”

我冲他点点头。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微笑地说：“你就是那个什么集团的头头？”

我说：“对，反革命集团。”

他笑道：“瞧你这样，一介书生，说你是反革命，没人信。”

工人师傅们都笑了，说：“我们都不信。”

柳一安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不管怎样，你都该见见群众了，在这里过隐士生活不行。上趟厕所吧，跟我走。”

出了生物馆，上了柳一安的车。他和司机在前排，我一个人坐后座。沿着小河就到了大礼堂后面。我这才发现，礼堂前的广场上坐满了人，大台阶搭了个台，挂了个大横幅，我从后面看不清写了什么。我正胡思乱想：不知开什么会，不知柳一安说的“该见见群众了”是什么意思？

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开会，并说“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清华大学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拉上台！”台下一片口号声。

立即，我的思想和注意力被拉回到台上。我看见两个人把蒋南翔校长从台后左边押上台，让他低头站在前面中央。当然，这比66年‘斗黑帮’时好多了，他的头没有那时压得那么低。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高沂以及罗征启拉上来！”

听到我的名字，下面哄然乱了一阵，然后是一片口号声，我和高沂分别从台后左边和右边押上台。高沂站在蒋南翔的左边前台角上，我站在右边前台角上。台下黑压压一片，两个人各擒住我一条胳膊，头也是押得不太低，我认为至少比以前文明多了。

然后就是批判，具体内容我没多少印象了。发言大体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蒋南翔的；二是挂在蒋南翔名下批高沂；三是挂在蒋南翔名下批我，主要是建筑系的“假四清”等等。念一段稿子，喊几十个口号。

在这一片口号和批判声中，我不知道蒋南翔校长怎么想，但是我知道高沂的感受。

好多年以后，我见到高沂，我问：“你当时怎么想的？”

高沂苦笑着说：“我当时一点没有听进去，批南翔同志的发言还没完，我已经睡着了，到批你的发言快完的时候我才醒过来。他们批你干什么？而且把你和南翔同志摆在一起，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说，我的思想迷惘、混乱了一阵子。

上午的批判大会开后，工宣队送我回生物馆。

午饭以后，一位师傅说：“明天开始，你归队吧。他们那间教室，已经给你腾出了位置，以后吃饭睡觉都跟他们一起了。你今天对大会有什么意见？什么想法？”

我说：“我很不满意，就这样让我去‘见群众’？这无异于告诉群众：工、军宣队对罗征启已定性。至少蒯大富他们可以利用来欺骗广大群众。”

整个下午，我反复思考，但不得要领。我承认，大会后我的顶牛情绪很大。

五点半饭厅的广播开始了，今晚的节目就是报道上午的会。

我忽然想起，宣布大会开始时，主持人说：“现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清华大学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拉上来！”接着又说“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高沂以及罗征启拉上来！”这两句话意味深长，不但把蒋南翔和高沂、罗征启都划开来，就是高沂、罗征启也用“以及”两个字划开了。这既很高明，也很巧妙，每个人都提到了，但又有所不同。想到这里，我脑子里消极顶牛的情绪和意见一扫而光了，我非常认真地听广播。

我发现这不完全是现场的直播。一是比较简单，二是凡是有明显的“打倒罗征启！”“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在大会中我肯定听到的发言或口号，在晚上广播里被删掉了。

我自己在听，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我自己笑了起来！我真希望鸿文能听到，我估计今天大会以后她一定又会紧张起来。

正当这时，海军刘队长推门进来。他微笑着说：“怎么样，听说你很有意见，两顿饭也没吃好？”

我笑了笑：“有点意见，我没有思想准备。我认为蒯大富他们会利用大会说已经把我定性，用来大做文章。但是听了广播，明白了，没什么意见了。”

刘队长这时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不敢忘记。他说：“你迟早要见群众的。但是怎样见呢，在我们的保护下去见吗？等着我们给你平反，做结论？开群众大会，替你解释？这样行吗？你想想。如今在清华，有几千人说你是反革命。414再好，最多打个平手。我们不来，414也得完蛋。我们再强，也不能强迫团派接受我们的意见。你们是

不是反革命集团，我是知道结论的。但是要广大团派同学接受，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让时间来帮助消化吧。清华打成这样，我们很痛心，你们难道不痛心？难道只是蒯大富的责任？你们414没有责任？你们教师、干部没有责任？怎么办呢？可以这么说，清华要和解，还得两派一起努力。而且原来吃亏受压的应采取主动。就像这次工、军宣队让蒯大富们打了、流了血、死了人，工人不干了，解放军不干了，要和解只能由工人，解放军采取主动。你很聪明，的确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听听广播也可以明白我们的用心。希望你好自为之。行了，再见吧！”

他走了，我后来再也没有单独见过他。但是他那一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8年底，我们这个学习班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住了。文学宓也回到工字厅了。

接着，有一天，宣传队一位师傅来找我，说：“饶慰慈身体好转了，我们觉得她应该回来和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但是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罗征启死了’。我们告诉她：‘罗征启没死，好好的在工字厅学习班。’她摇摇头还是说：‘罗征启已经死了。’等一下她来了，你做做她的工作。”

她来了，面色苍白，精神有时还有些恍惚，但我们见了面，握了手。也请文学宓过来了，大家相对沉默，面带一点微笑！

大家，尤其是饶慰慈，不能再提起这场噩梦，不能再提起刘承娴老师……回忆这些事，对她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而把“罗文李饶反革命案件”彻底搞清楚、彻底平反，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达、林克、胡启立等同志来清华主持领导工作之后的事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平安地回到清华了。

## 清华两派的前途—宽恕与和解必胜！

1968年7月27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闯了大祸——向进驻清华的工人、解放军工作队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和解放军战士。

按说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确定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失败无疑了，然而蒯大富居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和处理，甚至没有见过群众。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审判“四人帮”时，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领袖”才受到人民法院的审

判和追究刑事责任。紧接着，文革中凡能找到主凶的命案，也都陆续依法受到审查和判刑。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冤案本应随着蒯大富的倒台而得以平反、结案，但当时在清华执掌大权的迟群只是在组织批判“516集团”时，顺带揭批了一下蒯大富为首的个人搞的肉刑逼供和残暴无人性，并没有进一步公开揭露、调查和追责，对受害人也没有给予公平、公正的结论。

1978年，刘达到清华主持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组织人力对清华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期间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清理，对遗留下的数以百计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和处理。“罗文李饶”案件也是在这时才得以彻底平反和解决。

我也参加了部分清理、平反工作。但到后期总结时，我已奉调去深圳大学工作了，不太清楚详细的战果，但我相信数字是惊人的。

这些冤假错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少家庭已经破碎，多少人受苦遭难，多少人犯错误，多少人葬送了大好前程，多少人背上了“打砸抢”错误的包袱……

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凡经历过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期间历次政治运动劫难的人，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都是失败者；也没有得益者，都是受害者；国家没有进步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刚吃完午饭，就有人敲我家门。

“谁？”我问

“是罗征启老师家吗？”

我去开了门，一位女士对我说：“罗老师，您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孙铮。”我认出了她。

她说：“我代表孙耘和我自己来向您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您和您的家人，很对不起你们。”

我问她：“孙耘现在在哪里？”

她说：“还关着，在海拉尔公安局监狱。”

“为什么还关着？”我问。

她说：“他是罪犯，这十多年里大部分时间是被关着。”

我问：“判刑了？”

“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她的态度很诚恳。

我问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

她说：“我们只希望您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他一定亲自来向您请罪！”

当时，我家很小，比较拥挤，我妻子和孩子都在注意听我们的谈话，无法午休。

我就把她带到我在工字厅的办公室，对她说：“你等一下。”我拿出信纸和笔……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1968年初：幽灵似的吉普车，寒冷的三堡疗养所，阴森的化学馆牢房等等，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但是，除去那永远忘不了的爱人、孩子和老母亲的恐怖、焦急、无助的眼神，不幸遇害的胞弟的身影以外，在记忆里的孙耘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一个英俊的北方小伙子，他是当时的主审人，孙铮负责记录。但他们问过什么问题，我是怎样回答的，这些都成为模糊的、散淡的、不清楚的记忆了。

我尽量集中精神，很快地给海拉尔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我信中大致内容是：孙铮代表孙耘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

我把写好的信先给孙铮看了一下。她当场泪流满面地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您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送走孙铮后，我还把这封信给我妻子、父母、姐妹都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于是，我将这封信通过清华的办公信箱寄送给北京市公安局，请北京市公安局转海拉尔市公安局。

一个月以后，孙耘和孙铮一起来到我家。

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的同志看了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

我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

他们说：“我们两人想报考哈工大的研究生，不知行不行？”

我说：“我赞成！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考试。”

我说：“政治好办。”立即打电话请政治教研室给我一份研究生入学考试复习提纲转给他们。

他们参加了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孙耘总分第一，孙铮也考得不错。但

是，哈工大看他档案里面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

他们对我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们说：“我想再试一下。”

我又写了一封信给黑龙江省招办并转省委（见附件）说明情况。不久省委派了两位干部来找我，查询这封信的事，我说明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我的信，不敢做决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批示：这是件好事，责成中纪委第二办公室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给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工大党委，通知他们这两个学生可以录取，这样的人才应该爱惜，此事可以登报。

我没有看到原文，是新华社一位记者给我看的一份文件的复印件，我只记得大意。

我当时已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大群记者拿着有这个文件的复印件找我，要采访我，谈登报的事。

我认真考虑以后，又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关于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使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这样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必要，是否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了，仍请那位新华社记者带回呈胡耀邦。听说胡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后来，新华社“大参考”把我的信摘了几段写了个报道登出来，我在中央党校看到了。新华社还寄了一份给我，被同学传阅时丢失，没能保留下来。

此后，我和孙耘、孙铮成了朋友。他们经常来看看我。我调到深圳工作后，他们还来过几次。

1982年，他们到清华看我，告诉我哈工大有意派孙耘去美国深造，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这样的事还问我干什么？”

他说：“我今天的一切都跟您的宽容有关，我必须听您的意见。”

“你自己的意见呢？”

“我不想去。”他很坚决。

我知道全国当时正开始清理“三种人”（注：所谓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反军乱军分子以及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很

难批准出去，即使批准出去也可能半途被调回。因此，我说：“我同意你的选择，你们先干出点成绩再说吧。”

孙耘夫妻二人很明白，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指示和干预，他们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他们每年都到胡耀邦家中看望。尤其是耀邦逝世20周年时，他们到江西共青城耀邦墓前拜祭，又写了一些诗文以为志（见附录）。我看了也深为感动，很受教育。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彻底地卸下包袱了，我也更加体会到胡耀邦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意义：不仅犯错误的人放下了包袱，受害人得到平反也放下了包袱。

孙耘的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之后，清华校内了解内情的人当中，无论是团派还是414的多数是支持的，但有人说我这是“以德报怨”、是“东郭先生”等等。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要我背《论语》，当时我能背下来，但不懂。父亲有时也讲解一些章节，但讲解过的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模糊地记得其中有一段是关于“以德报怨”的问题。父亲说：“孔夫子不赞成‘以德报怨’，更不赞成‘以怨抱怨’”，但是应该如何，我不记得了。

当我听到有人说我是“以德报怨”，我不同意，立即翻阅《论语》。结果因多年不读，一时找不到有关的段落。直到前几年，偶然听到电视节目里讲《论语》，刚好讲到这一段：“有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何以报德？’然后孔子解释，‘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应该怎样就怎样，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怨仇，这才是正确的。

我不同意有些人说我是“东郭先生”。因为我在对待个别残暴无人性的打手的处理时，并没有手软，比如对冯家驊。专案组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现在哪里，找到他再说，不能轻易放过他。

专案组查找的结果是：他在河北省北部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因为他在文革中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周围没有人理睬他。‘老团’不理他，‘老四’更不理他，他一直独来独往。后来找了一个女工结了婚。当那位女工知道冯家驊在文革中的暴行时，竟然吓疯了。由于冯家驊知道她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精神失常，所以只能一直守着她，法律也不允许离弃。

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看怎么办？”

“算了，到此为止吧，上苍已经有惩罚了！”我说。

我脑中立即浮现出这个五短身材，小眼睛，留着寸头的小个子同学。

他凶残地打我的情形历历在目。尤其是他打饶慰慈、文学宓更是残忍，打得他们浑身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我曾无数次地发誓一定要惩罚他！但是现在，我想如果抓了他去坐牢，那么他的妻子谁来照顾？够了，够了！这就是“以直报怨”了！

2009年，在一次聚会时见到汲鹏。汲鹏告诉大家他见到“牙科大夫”了（因为冯家驷曾用老虎钳子拔牙来逼供，所以得到这样一个外号）。接着，汲鹏介绍了他与冯家驷见面的情况：

我（汲鹏）：说“这不是‘牙科大夫’吗？”

冯家驷说：“是的，我错了，我现在改行了。我学了针灸，现在为人治病，已经治好了一些人。我要用救死扶伤来洗刷自己过去的罪行。”……

我注意在场的人都很安静地听汲鹏讲，并且都点点头……

这件事更加引起我的深思：我为什么不管冯家驷是否改过自新，是否对自己错误有认识，是否已经受到道义或法律的惩罚，就发誓绝不放过他？这是“以直报怨”吗？当然不是！我认为我还沉浸在谁是谁非、报仇雪恨的情绪里。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都是要“报怨”，是怎样去“报”的问题。“报怨”又是为什么呢？

我对照《基督山恩仇记》中的报恩复仇情节反复思考着，我认为基督山伯爵报仇的手段太狠了，过分了。而我们对冯家驷的态度不是也太狠了吗？

我认为自己这样的思考太浅薄了。我想，我们应该把“和解”的旗子亮出来。这个仇，报还是不报？何时报？如何报？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和解。两派要和解。清华清理了积累多年的冤假错案，也是为了达到全校的和解。全国也一样，应该和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演义着各种各样的冤怨相报，不断仇杀的历史。这种冤仇相报的意识和文化，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有仇必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了仇，才够中国人所谓的“义气”。二是怨仇必报，不过报的手段、方法和程度比较理性。三是以直报怨或以德报怨，“报”的目的是“和解”。

孔子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关于“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论述，留了相当大的空间。看来，他并不赞成以怨报怨的杀戮文化，也不赞成不加分析的“以德报怨”的东郭先生的愚蠢做法。他主张的

“以直报怨”，似乎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复仇观：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目的是要“报”的。

而佛教则主张“以德报怨”。目的是化怨解仇，达到“和解”。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少用“和解”、“和谐”、“妥协”等词。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和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而代行其道的是胜王败寇的“镇压”。这种以暴力取得的胜利，只能用暴力来维稳。这样的维稳，只能越陷越深，越维越不稳，不可能持久稳定的。

在中国历史中，多数是第一层次。达到第二个层次的也极少，第三个层次几乎没有。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却有许多达到第三个层次的事例。

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从1861年到1865年南北双方打了四年仗，各死伤数十万人。直到南军弹尽粮绝，南军的李将军不得不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请降。李将军在带领部下前去投降时，要求部下穿着整齐。他说，我们打败了，但要败得有尊严。在请降的谈判中，李将军提出希望：我的骑兵和炮兵部下，许多人是带着马匹来参军的，希望这些属于私人的马匹能够还给他们。格兰特将军说：这已经在我们的考虑之内了。如果没有马匹，他们将无法收获下个季度的庄稼。不仅马匹，甚至武器也发还给个人。就这样，没有绞刑，没有屠杀，没有监狱，很快南北和解了。从此美国没有再暴发过内战。和平使美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之强国。

再如南非，本是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国家。曼德拉本人就被白人政府关押了几十年。但他在当选为总统后，立即签署了取消种族隔离。达到民族和解的法令。他自己带头宽恕在种族隔离时期对自己犯罪的人和事。又如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尼，自己是黑人，受过种族迫害，但她自己也犯过错，最后觉悟了，讲出自己的错误，即用真相换取受害方的宽恕，最后达到和解。一个看来绝无可能用和平的方法达到民族和解的南非，他们成功地运用了“真相—宽恕—和解”的办法，确确实实达到和解，实现了真正的和平。

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阶级为斗争为纲，以斗争哲学为自己的主要价值取向的国家，要出现这样感人肺腑的故事，是不太可能的。这难道不让我们这样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大国脸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吗？！

要化解清华各派之间的矛盾，只能走“真相—宽恕—和解”这条路，这才能真正体现清华人的胸襟，才是对清华校训的最好诠释！

用真相换取宽恕，最后达到和解，希望这种宽恕、和解的文化，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附件：1、我当年写给黑龙江省招办，并转省委的信

2、孙耘（孙毓星）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3、孙耘（孙毓星）写的“清明追思”——纪念胡耀邦总书记逝世20周年

2011年9月6日完稿

附件1:

工大研究生科负责同志：  
这是我给省招办的信，请考虑。  
罗征敦。

0039

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负责同志，并请转省委负责同志：

我收到孙毓星(孙耘)同志的来信，得知他通过了哈工大的研究生考试，总分415.75。但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错误，哈工大决定不予录取。哈工大这样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仍想向党组织反映一些情况，希望有关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孙毓星在1968年初，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1968年3月27日凌晨，我越狱逃跑。孙做为“专案组”组长，参与过追捕我的行动，并于4月初的一次抄家行动中，将我的弟<sup>2</sup>罗征敦(第一批麻厂工人)绑架殴打窒息致死。实际上，当时直接参加这美行动的(包括绑架和刑讯逼供)是校内一些工人和另外几个学生。但孙毓星做为“组长”，在我弟<sup>2</sup>死亡以后，就和王庆章、张建国两个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责任，而且孙毓星被做为“首犯”。十一年来，孙两次入狱，多次被隔离审查，长期被定为敌我矛盾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828)

0040

第 页

而且我认为，他是承担了较多的责任的。

今年初，孙皓在单位及海拉尔市公安局派人来京调查，向我介绍了孙的表现，据说孙在劳动中，工作中表现是较好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许多青年人犯了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的错误，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主要的不应由他们自己来承担。第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十二年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和判处十二年徒刑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快十年了，应该尽早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第三，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账的。在海拉尔市解决了孙毓星的问题以后，他曾给我来过信，并借出差过京三便，到京找我面谈过，我以为态度是诚恳的。同时，这个青年人也表现出有过人的才能。他考入清华时，成绩就不错。这次在狱中复习了功课，能考出较好的成绩，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

(1229)

0041

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象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年青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党组织考虑我的意见，重新研究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如果从各方面考虑，目前不宜录取，可经请组织上出面找他谈，鼓励他继续努力，来年再考。

我并非对哈工大的决定有意见。他们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反映一下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请考虑。

此致

敬礼！

罗征启

罗征启同志保钱文蔚同志，罗征启同志现任钱校党委书记，以上意见供参考。

宣传统战部  
1980.8.20

(1440)

## 附件2

罗老师：

您好！

我给您发去的信收到了吗？我最近收不到来信，因为邮箱已满，但发信是可以的，现在经过清理又可以收信了。为稳妥计，有关文档再给您发一次，并增加一份我当时写给胡耀邦的信。收到后请告知。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孙耘

1980年暑假，我为读研究生的事曾想找一些领导申诉，比如通过其女儿（哈工大学生）转信给李昌，通过亲友转信给黄火青等，也给胡耀邦总书记写过信，是通过德华的同学转交的，不知耀邦同志看到没有。我想他看没看到我的信都会做出同样批示的。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

我叫孙毓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67届毕业生，现在海拉尔电机厂任技术员。今年我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考试成绩是415.75分，计：数学100，物理84，电工97，英语79.75，政治55，其总分和数学、英语均为第一名。然而，该校研究生科负责同志告诉我，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问题，经党委研究不予录取。

文化革命中我是清华一派群众组织的总部委员之一。1968年初总部决定对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同志搞“通缉”。4月3日晚由我带十来个人去罗父亲家抄取照片。在我带人进屋抄家时，留守在车中的王庆章张建国驱车抓住了偷跑出来的罗征敷（罗征启的胞弟），并将它捆住按在车中。由于王庆章堵口时不慎将棉纱塞住喉咙，使罗征敷同志“窒息而死”（法医鉴定）。这是一起致人死命的严重犯罪事件，我应负一定责任。为此，从68年至今我受到多次审查。半年前，罗征启同志亲自表示：并不主张再追究你们学生的个人责任。此后，有关部门才作出“不予追究”的正式结论，彻底解决了我的问题。

12年中我有7年半时间是在审查处分中度过。十二年来，我时时怀着对罗征敷一家的深深内疚反复体味“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一切。我是先害

了别人又毁了自己。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大地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给了我们新的勇气和力量。78年10月，我和我爱人一同投考哈工大计算机专业进修班，并分别以182分和160分考取（据说我考第二）。我因被拘留审查没能赴学。但我并不灰心，我相信党的政策，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用自己的知识为四化服务。所以，拘留期间（78年11月到80年2月）我一直坚持身体锻炼和业务学习。我学习了高等数学、物理学、电工学、电子学、工程数学和英语，共写了廿万字的笔记和练习。当时许多同志给与我热情帮助和支持，有人拿出十余元为我买业务书。后来我准备报考研究生，又得到海拉尔各级领导的一致支持和鼓励。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清华党委副书记罗征启同志还寄来复习提纲。他们的鼓励与信任对一颗受过损伤的心来说是多么宝贵呀。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我党干部的胸怀和远见，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党的温暖。我十分痛心的是辜负了党的多年培养。在1962年高考，我曾获得天津市和河北省第一名（约560分），但这十年来却虚度了光阴，无所作为。

敬爱的耀邦同志，我相信党不会摒弃我们、歧视我们，不会让我永远戴着无形的打砸抢帽子（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我们愿意，而且正在改正错误，立功赎罪。我十分渴望能继续深造，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四化做出更大贡献。

盼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这个政策性问题，并给以解决。

此致

敬礼

海拉尔电机厂 孙毓星

1980年7月18日

附件3

## 清明追思——纪念胡耀邦总书记逝世20周年

清明节，中华民族追思故去亲人的日子。近年来，清明又被赋予极富时代特色的含义。33年前的今天，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冲破压城的黑云，愤然喊出自己的声音。二十年前同一个仲春，1989年4月15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由此引发了又一场天安门风潮。中国人民第一次忘情地呼唤民主、自由，表达出对高尚人格的崇敬和对美好人性的赞颂。胡耀邦，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从此载入史册，而且必将流芳百世。

我有幸亲得耀邦同志关照，当然还包括诸位师长友人的帮助，得以到哈工大读研究生，从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以及我们全家的命运。

清明节前，我和铮（糟糠之妻）专程经南昌到共青城，搭乘摩托车去拜祭胡耀邦墓。其后又冒雨转赴浏阳，再驱车近百里到敏溪河畔中和镇苍坊村瞻仰胡耀邦故居。在拜祭前的一个不眠之夜，我写下这样的话：

清明将至，又逢胡耀邦总书记逝世20周年，特至耀邦同志墓前拜祭，以表敬仰与感恩之情。

泱泱中华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颠倒昆仑

“人才难得  
既往不咎”（注）  
关爱我辈  
将心比心

人格高尚  
党之“良心”  
人性光辉  
岿然独存

注：录自胡耀邦总书记1980年对我和井冈山读研究生的批示

胡耀邦墓坐落于鄱阳湖畔，背靠风景秀美的富华山。墓园规模宏大，沿石阶上行，回首遥望鄱阳湖，虚幻缥缈，水天一色。路边绿树丛中点缀着鲜红的茶花，山坡绿草坪上有紫红灌木组成的四个大字：耀邦陵园。再往上就是朴实无华的三角形墓碑，我感觉它像高山，像旗帜，更像大写的人。陵园内设展室，在“先天下之忧而忧”题下写道：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时期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之一。胡耀邦的个性、风采以及他的品格，都闪耀着大写的独特的人生光辉，魅力永存。这是今天能给与耀邦同志的最高评价了。然而我却以为，胡耀邦的人格魅力，他为民请命、“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牺牲精神等等，都超越了党派、政治的樊篱，具有普世永存的人性光辉。

## 没有明确结论的结局

——“7.27”事件和“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案件结束了“昙花一现八百天”

1968年底，蒯大富终于要谢幕了。

1968年7月到9月，我不在清华，逃难到广东。对于清华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我不能妄加阐述和评论。至于“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件，我已在前文中作了交代。

怎样评价蒯大富在清华执政这八百天的表演呢？有人说他彻底失败了，有人说他虽败犹风光了一阵。在法庭开庭审问蒯大富的时候，他态度不大好，但却获得不少同情。在走出审判场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记者问我：“你是当事人，你为什么不言语？”我没有回答。她又说：“我是支持414的。但是，我今天挺同情蒯大富的。你们414赢了，我为你们高兴。你不发言，一定是有什么想法，我想采访你。”我摇摇头说：“我不接受采访。”过了一会，我像是自己跟自己说：“在这场大疯狂中，没有胜利者，都是失败者，都是输家！”

蒯大富是输了，输得很惨。但是谁赢了呢？414赢了吗？如果工、军宣队不来，414恐难支持下去了。工、军宣队赢了吗？除了死伤七百多人这巨大的代价以外，只是让迟群、谢静宜赢得了清华大学以及整个教育界九年的领导权。在这九年里，他们胡作非为，把大学师生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大学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只允许办阶级斗争一个专业的所谓“大学”。如果说，红卫兵运动造成的破坏，是自发的，主要是物质上的破坏；那么，迟、谢的胡作非为造成的，则是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文化传统上的破坏。直到他们倒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极左的教育路线的流毒还没有清除。谁也不能肯定，钱学森的担心现在已经解决了。

有人说，假如“7.27”蒯大富没有下令开枪镇压，没有七百多人流血死亡，假如蒯大富们炮制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没有搞出人命，假如开枪镇压的是414而不是蒯大富，那么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是否要改写？

研究历史，首先要搞清史实、真相，而不是靠假设。史实、真相是蒯大富下令开了枪，造成几百人的伤亡血案。史实、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个”和“彻底砸烂”理论必然要发展到武斗和内战。如果这次不开枪，在另外一些时间和机会里，还是会开枪的。即使蒯大富会暂时与迟群、谢静宜结成同盟，最后还得分手。因为极左思潮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思想上是倾向于否定一切的，在组织上是倾向于分裂的。史实和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个”和“彻底砸烂”理论必然发展到反对公检法和军队。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是由毛泽东、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孕育成长的，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肯定要被历史抛弃的。

至于“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也就是因为死了人，又和“7.27”联系在一起，否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案、要案。全国类似的案件很多很多，都处理了吗？整个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多少人，都搞清楚了吗？刘承娴老师的死，还是个无头案。

“7.27”之后，蒯大富还曾抱怨迟群、谢静宜“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迟、谢也只是把他送去工厂劳动。名义上是审查，实则拖延，观察形势，再作处理。因为，对蒯大富这样一个钦点的红卫兵领袖如何处理，是个大难题。他有命案在身，而且许多挨整的干部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他却是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当着他们的面，一再叮嘱中央几位领导“不要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3）所以迟、谢只是在批判一个更加荒诞的“516”案件时，把蒯大富的“7.27”和“罗文李饶”两个案件挂在“516”案件上揭批一番了事。

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倒台了。清华文化革命的案件和解放以后到文化革命所有的冤假错案，才在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处理下，大体上得到解决。但是，文化革命这场动乱留给我们的疑团和悬念太多了，我们只能说大体上解决了。

至于蒯大富在清华执政八百天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没有明确结论的结局。这样也好，没有明确的结论，将来就不必改来改去。没有明确的结论，也许就是最好的结论。

# 高等教育扫地出门 知识分子理想破灭

——迟群、谢静宜统治下的清华大学

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闯了大祸，灰溜溜地走下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失。一个曾经对历史有过一定影响的人物，是不会随着他的下台，他的影响就会倏忽消失的。蒯大富在思考，他也不愿意就此消失。沈如槐也在思考。两派的群众，不论是否参加过武斗的，许多都在思考。清华的这段历史，给大家留下了许多悬念和问题：

首先，为什么“7.27”这么大的动作，却没有人给老蒯先“通个气”，“打个招呼”？为什么一向明确支持“老团”而欲置“414”于死地的中央文革，也突然步调一致地收声沉默，不接电话，不对老蒯作任何点拨，由得老蒯钻进死胡同，闯下大祸？从“7.28”召见时毛泽东的口风判断，他一点也没有甩掉老蒯的意思。相反，却不失时机地“插空子”敲打一下“414”。而召见以后，虽然“最高指示”说“不要整蒯大富啦”，但结果还是整了。这又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思考，也有很多个不同的答案。但是谁也不能找到一个能说服自己和清华大多数教师生的答案。不仅老团，就是“老四”也百思不得其解：在走投无路的危机时刻，突然救兵不请自到……

第二、毛泽东动用了他最后的一张王牌——8341部队。这是否说明他已经感觉到，由于他发动了这场“大革命造成的大动乱”，已经使他筋疲力竭，山穷水尽，再没有可以相信的，可以动用的力量了？抑或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和过去几次危机一样，只要他发个“最高指示”，只要他随便说几句话，青年学生就会一拥而上，誓死捍卫，坚决拥护？而现在他发现，经过这几年的“大乱”，已经不可能回到“大治”了，所以，他动用8341部队作最后一击。结果，没有成功！

第三、从“7.28”召见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定有个估计，认为过去“414”胆敢顶撞中央文革，甚至连最高领袖的批评也不听，这么大的压力，还坚持抵抗了一百天，这次“7.27”的行动，首先起来反抗的必定是“414”，而且必定抗战到底，决不会首先缴枪，拆毁工事。至

少“414”是要等“团派”先缴了枪，拆毁了工事，才会有所行动。

“7.27”当日两派的不同表现，是完全出乎中央许多领导人的意外的。

大家都在思考。但是，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是要前进的。历史是不会等待所有人都想清楚了才前进的。这时，清华园的两位新权贵——迟群、谢静宜强势登场了。

从68年7月到76年10月，迟、谢这两个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甚至根本不懂教育的、文化不高的人，手执同样不懂高等教育的“最高领袖”的尚方宝剑，统治了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和教育战线长达八年，对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破坏，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迟、谢统治清华这八年，我基本上生活在体制之外，所以对他们的办学理念，办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方法，没有透彻的了解，只能在外围冷眼旁观。现将我在迟谢时期所见、所闻、所经历、所感受，记述如下。

## “两个估计”是极左思潮的根源!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和教育战线上的罪过，最主要的是贯彻“两个估计”。如果记蒯大富给清华留下的是硬伤，他们留下的伤痛比蒯大富留下的深得多、痛得多。

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长达三个半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最后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这个《纪要》全面地、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不仅对解放前的高等教育给以否定，对建国以来17年的教育工作也给予全面彻底的否定。

《纪要》宣称：建国以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精神枷锁的、影响极为恶劣的所谓“两个估计”。

为实现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迟群、谢静宜首先改组了校、系两级领导层主要领导，由工、军宣队的领导出任。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废除过去大学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实行“群众推荐、组织审查”的办法。于是，教育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一落千丈。影响所及，直至现在不能恢复。

但是，无论是蒯大富还是迟群、谢静宜，他们对教育的摧残和破坏，都不是他们的发明，解放初期，已经有之。1951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初的三五反运动，接着下来是学习苏联高等院校系调整和帮助知识分子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开始的反对建筑设计上的复古主义的学术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胡风反革集团，由此引发了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接下来是整风反右运动，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整社及又一次三反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运动”，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领导权问题，另一条是知识分子问题。后者还是领导权问题，就是走一元化大一统的路线。大学就是要办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只有一个阶级斗争专业的大学。这样，解放后的大学，就一定是一无是处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大学了。所以蒯大富就一定要“彻底砸烂”了。蒯大富在给迟群的一封信里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种一元化大一统的办学思想和路线，至今仍然是教育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要求，就如同军队整队出操一样。学术上则是专制主义的。学术政治化，外行专了内行的政，出现了一片越来越严重的衰落腐败现象。

### 第三次隔离审查

蒯大富垮台了，“罗、文、李、饶”案件也应该结束了。但是，工、军宣队对此案却讳莫如深。自从全校在大礼堂前开了万人大会批判蒋南翔校长同时让我和高沂陪斗以后，工军宣队将我“放回到群众中，让群众审查批判”，同时将我安排到生物馆二楼大房间和刘冰等校级领导干部住在一起，继续隔离审查。

于是，一时间校内师生传言：一则毛主席指示，不要整蒯大富；毛主席又不喜欢414，现在抓不到414什么把柄，那就把“罗文李饶”拿来开刀。另一则说“罗文李饶”确实有问题，工、军宣队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材料。所以现在“罗”的待遇比刘冰他们还高，而文李饶则与蒋南翔一样，在卫戍区监护审查。对此，一位军代表找我谈话，问我听到点什么没有？我如实回答。他问：“你是怎么听来的？”我说：“提审我的群众提问时说的。”军代表说：“你别信那个。”

在批判的同时，要我写一些材料。我向工军宣队提出：要我写材料，

只能由工、军宣队提出要求，并且材料只交工军宣队。而且重复的我可以拒绝。工军宣队都同意了。这样，要求写材料的，甚至提审问话的越来越少，一两个星期后就没了。

十二月中了，天气进入寒冬。到冬至前后，工宣队陆续遣散了生物馆监管学习队，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回家住，参加本单位的学习。最后只剩下我。有一位工宣队师傅送我到工字厅报到。从生物馆到工字厅没多远，这位师傅（人都称他为李师傅），是新华印刷厂的工人。7.27进校时，新华厂是主力，死伤也较多，对蒯大富很痛恨，对414较友善。一路上和我闲聊，向我解释，这次这样安排和上次批斗蒋南翔让我和高沂陪斗一样，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和群众的情绪，希望我能理解。又说最近我态度较好，较合作。

到工字厅，我被安排在第一进大院的坐东朝西的厢房。一共三间，我住在北边一间，从当中一间进门，住着我的两个“警卫员”——都是团委的同志，也都是“老团”。我要经过两个警卫员住的房间，才能进到我的房间，另一间则空着。我用的厕所则是东侧院里最东面的一个厕所。当然没有热水，我就是利用清晨工字厅的大门尚未开值班的人都没起床时使用厕所，用冷水擦身，然后在院里活动一下，开始我一天的生活。在这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在工字厅工作，其实，很多房间，包括现在我住的东厢房，我从未进去过，甚至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现在变成我的卧室、牢房、冥想室、静思室或隔离室。

一切都差强人意，至少比前几次红卫兵的牢房要好。除了一件事：每日三餐饭要在“警卫员”的监护下，自己到一员工食堂去买。这还不算，进了一员工食堂，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毛主席像鞠躬，然后挥动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大声喊叫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饭吃，我一定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再鞠躬，再去买饭。我宁愿不吃饭，也不愿表演这乞讨的丑剧。环视周围，发现在我“表演”的时候，我前面直到买饭台之间（毛主席像在买饭台上方正中），很多人避开，形成一个20平米的空地，周围有些用餐的人站起来观看。我在一员工食堂用餐许多年，许多人包括炊事员都是认识的。这时引起小小的轰动。我发现，有不少老师用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和点头和我打招呼。一位买饭的老师低声对我说：“老罗，保重。别搞那请示汇报那一套，我们搞了一天也都不搞了。”一个在卖饭的炊事员大声说：“老

罗，我是414的，到我这边来，没事儿！”那天，我买了什么菜我记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我记得清楚：他给了我一大勺，明显地多给了我不少。

正要离开饭堂的时候，看见吴良镛先生领头，带了一小队人进饭堂，集体做了一次表演。不过他们可能表演了几次了，我感到似乎没有我那么轰动。但我没有看到汪坦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吴先生、汪先生和梁先生在两次生物馆的监管队里都没有出现。汪先生还可以理解，他的名气和地位不如吴先生，但梁先生则不知为何，一定是生病了，而且是重病，我心中十分惦念。（梁先生病故于1972年，终年72岁。汪先生病故了。吴先生现健在，高寿已93岁。）

吃过午饭后，我在隔离室里静思了一整个下午。我想过去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无非就是要这些知识分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公开承认自己错了，自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要互相揭发批判。这样，几乎每个人都说过过头话，都说过慌，说过违心的、甚至违背道德良心的话。每个人都背上一个大包袱，而且不敢反悔，即“翻案”。我虽然也十分缺乏政治经验，但总比吴先生、汪先生等老知识分子知道的多一点。记得1967年8月的一天，二校门北第一教室楼前的大字报栏上有一张大字报，署名我忘记是什么人了，标题是“先专后红比白专更危险！”从内容上看，大概是建筑系的人写的。详细内容不记得了。一眼看过去，我发现上面有我和黄报青先生的名字。大字报说：“清华的教师和干部大部分是先专后红的，比只专不红的更能迷惑人。”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有吴良镛先生的一小段批语（大意是）：“是的，罗征启和我都是先专后红的，但是现在罗在党内是个领导干部，因此，他的迷惑性更大，比我更具有欺骗性，危险性。”这说明，在政治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整糊涂了。今天在一员工食堂见了一面，虽然短短地对视了两三秒钟，不能说话，也不能打招呼。他是我的老师，我微微点头以示敬意。

新年过后，大约在一月底，全校又开了一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落实政策万人大会。这次最突出的是汪坦先生上台亮相，承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蒋介石属下的中统和军统的双料特务。甚至空投敌后，因天气不好，无功而返。我们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确实是他自己上台讲的。四人帮倒台以后，由于推倒冤假错案的需要，我曾找汪坦先生谈过一次。我直截了当问他“双料特务”的事。他也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全是

假的！全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是准备空投敌后，那是日本鬼子的‘敌后’，而且也没有投成。那时虽然心里很矛盾，不说不行，说也不对。我不如黄报青，他能坚持，坚持到底。而我受的压力比他小多了。”我说：“我也不如黄先生。”黄先生的追悼会后，蒋南翔校长对黄先生的夫人吕俊华说：“黄先生的品质，我们应该学习。但是，也不必太过坚持。邓小平不是也说‘永不翻案’吗！我自己也喊打倒蒋南翔嘛！也喊过打倒刘少奇！在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首先是保存自己。黄报青被打死了，谁打的？谁负责？现在是无头案。我们只能追悼一下而已。”汪先生说：“这讲的很深刻。但是在当时，我们是很难掌握的。”

春节快到了，我预感到，这一次的“隔离审查”快要结束了。

一天，工字厅生产处的一位姓刘的工人找我谈话。这很奇怪，这次不是工、军宣队的宣传队员找我谈话，这是否意味着，审查结束了？可以回家了？我暗暗高兴。这位刘师傅在两派斗争时似乎是团派的，当然一定是较温和的，而且，一定没参加过武斗。但实际上，他和我谈话前后不过三次，以后也没有再谈过什么了。而且态度很和善。

他开门见山：“快春节了，想家了吧？”

我说：“当然，主要是担心梁鸿文。”

“还想女儿吧？”他笑着说。

“女儿嘛！想是想，可女儿有爷爷奶奶照看。老婆身体不好，孤零零一个人……”

“是呀！其实，老罗，关键在你这里，你争取主动，早点把问题交代清楚，不就早点回家了吗？！”他讲得很轻松。

我沉默了一会，微笑着答道：“请问，我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清楚？外面的大字报，说这个那个的，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你们让我怎么交代？我已经没东西可交代了，干脆我住在工字厅不走了！”

我们两人一起笑了。他说：“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工宣队说话才算数。但是，老罗！工宣队让我跟你谈话是让你回家的。你爱人身体不太好，你回家照应一下会好一点。”

听这话风，我有点紧张了。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在我追问之下，刘师傅说：“有天晚上，你的邻居发现梁鸿文把蜂窝煤炉搬到房间里了。又在枕头下面发现一百多片安眠药片！你回去注意一下。今天下午就回去，你现在收拾一下，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下午刘师傅送我回家——荷花池单身宿舍（又叫第一宿舍）。我身上带着钥匙。见我开了门，他就走了。周围邻居还都在学习班上没有回来。宿舍里比较安静。计算一下，我离开这个“家”已有整整一年了。走廊里还看不到什么变化，仍然是那样乱七八糟。我推门进我的家，却倒吸一口凉气！

房间里清冷得很。有好几个窗户玻璃碎了，看来是从外面用弹弓打的，现在用包装箱的纸堵住，只能说是大体上堵了一下。回头看看窗户对面的墙体上，更加可怕。弹弓射进来几块黑乎乎的拳头大小的石块，力量太大，居然都嵌在墙上或天棚上。房间像很久没有人住了一样。鸿文这几个月就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难怪她想把蜂窝煤炉搬到屋里面，她太冷了，真难为她了。

我正搬椅子放在桌子上想把那几块石头拿下来，鸿文回来了，面上毫无表情，只是说，工宣队师傅通知她，你已回家了。怕你没房门钥匙，所以赶回来。我抱住她说真对不起你。两人相对泪如雨下。她指着放在桌子上的椅子问这是干什么？我说想把几块嵌在墙上和天棚上的石头抠出来。她赶忙说：不要不要，这个是窃听器，是工宣队监听房间里动静的。工宣队还叫周围邻居都监视我们家。我说，邻居都在关心我们。工宣队也在关心我们。没有工宣队，我们根本回不了家呢！她默然，坐在床上低声抽泣。

她两次阻止我去抠那几块石头。我终于说服她在一旁看着我吧石头抠下来，给她看过，就是石头，不是什么窃听器。

第二天，邻居把我的小提琴送回来了。他们说：“我们商量，你家里大概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可能最宝贝的是这把小提琴了。所以冒险从你房间偷了出来，现在完璧归赵了！”

至此，第三次隔离审查终于结束了。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空空如也的家，并且开始重建这个家了。同时，鸿文继续在建筑系的学习班学习。我则编入工字厅宣传部、党办、团委的学习班学习，开始接受另一种形式的“被政治审查”。

## 学习班——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审查

隔离审查，肯定是非法的，但这早已有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记得五十年代初，当时正在搞“三、五反”，我们刚刚入学，是一年级学生。师兄、师姐们就教我们：“清华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必有虎，而且是

大老虎。经管钱财的，随便抓一把，肯定就有几只。”受教以后，就分配我们工作。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夜班看守老虎，还有看守日记。我记得在一篇看守日记上写道：“这只老虎很狡猾，不交代问题，整天装着唉声叹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我们两人商量了，今天早饭不给他吃，也许饿一下会老实点。”

1954年由批判胡风开始的肃反运动，我也跟着师兄、师姐们“审问”过几个“反动分子”，学着师兄师姐们拍桌子瞪眼睛，凶神恶煞地“审问”过人。我当时已是三年级学生党员。我还单独“审问”过一位土木系一年级学生。一位师姐告诉我此人极不老实，装着听不懂普通话，说也不说清楚，好像是故意的。后来我知道他是香港人，讲广东话的，讲普通话很紧张。我就让他讲广东话，我发现他放松以后态度很好。但是我已经骂过他，后悔莫及。后来土木系和建筑系合并，系团委和系学生会都合并了，我是系团委书记。我想找到这位同学，向他道歉。但已找不到了，听说已经退学回香港了。

反右派运动也是一样。建筑系600个学生中划了23个右派。掌生杀大权的不是我，但最后学生中的右派一个个都是我签字的。对此我十分内疚。有一次在男生宿舍三号楼入口旁的会议室里召集所有右派分子开会，按上级指示，要安抚他们，让他们好好学习，不要放弃。我当时问他们：“共产党和你们有什么仇，你们为什么反党？”室内安静了一会，突然一位女同学说：“罗先生，我没有反党！”说完号啕大哭，室内则哭成一片。我都不记得那天是如何收场的！

苍天在上，这世界还是很公平的。我常常想，在这荒诞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大体公平的报应。有些人，伤害了别人，也受到了伤害。有的人伤害过人，也道了歉。有的人到如今仍未认错。我相信，他们的良心永远会受到谴责，而且迟早会得到报应的。

政治审查，其实就是整人。现在的学习班，其实也就是整人，还有互相整。我整过人，也被整过。箇中滋味，我是很熟悉的。整人术最厉害、也是最可怕的一招，就是在威逼高压之下，要你没完没了地检讨，直至挖出“私”字一闪念，挖到体无完肤，尊严扫地。还要你揭发检举别人，还要大义灭亲，揭发亲友。这种精神上的摧残、迫害，比逼供时的用刑，打你几拳，踢你几脚……更可怕。一旦你的精神被打倒了，他们要你说什么你就会说什么。于是到处是坏人，到处是反革命。你只能乖乖地听党的话

了。总体来说，在这方面，清华还算好的。据一些老同志讲，过去在延安的“抢救运动”等几次运动，比这厉害多了。说你有问题，拉出去就枪毙了！看来，整人在我们队伍内是有传统的。

第一天上午休息时，突然，团委的两位青年同志（就是在工字厅监管我的那两位），从外面冲进来，凶神恶煞地喊着口号：“打倒张慕萍！”“打倒反革命分子张慕萍！”“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喊完就把张慕萍带走了。张慕萍文化革命前是团委书记、党委委员，是青年团干部中级别、职位最高的一个。

后来知情人告诉我们，张慕萍在学习班上发言批判刘少奇时，很激动地挥舞着小红旗喊叫：“你这个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没想到他的面前正是毛主席像，被认为是“借机恶毒攻击毛主席！”

两天以后，张慕萍回来了，作了一个“沉痛”的检讨。我估计，这两天他就住在我隔壁室里。大家互相打招呼：“以后各方面要小心点。”

又过了几天，在学习班休息的时候，忽听得有人说工字厅西侧的新华书店有毛主席像章卖，于是有的人就跑去买了。我没有去，上了趟厕所以后，就在学习班休息喝水。有几个人回来了，正在谈论像章的事。曾经看管过我的那两位团委的年轻人突然又冲进来，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林泰！”“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林泰满面惊恐，呆呆地站起来，摸不着头脑，就被这两个人带走了。有人说，看见林泰从新华书店走出来，就问：“还有吗？”林泰说：“回去吧，别去了，差不多卖完了，就剩下几个两毛钱一个的破玩意了！”

过了两天，林泰和张慕萍一样，也作了一个“沉痛”的检讨，回到学习班来了。林泰和我是同班同学，文革前是党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部长是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兼任的，第二副部长是陈圣信，我是第三副部长。

我自己碰到的既滑稽又让我紧张的一件事是：工宣队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画一幅蒋南翔校长的肖像。这难为我了。工宣队一位师傅找我谈话说：“许多单位都在批判蒋南翔时，因蒋南翔不在场，情绪上不来。于是他们画了一张蒋南翔的肖像，对着肖像批判，情绪就上来了。我们考虑，想请你画一张像。你们学建筑的都会画，而且你是高材生，又跟蒋南翔工作过，对他很了解，肯定可以画好，给你两天时间。咱们周末开批判会，怎么样？”我面有难色，解释道：“不是学建筑的就能画人像，我就不

行！”那位师傅说：“你不行，在工字厅里也算最行的。听说那时候工字厅劳改队每人一个黑牌子都是你画的，不是也挺好吗？”我只好说：“我试试吧，尽力而为啦！不过得给我一张照片，我凭空可画不出来。”

“行！”师傅一口答应。

搞了一天半，前后五稿，总算完成，工军宣队很满意。他们除了万人批判大会上，远远地看上一眼，基本上没有见过蒋南翔，所以满意。清华的员工，尤其是在工字厅工作，比较熟悉蒋南翔的，大约一半人笑一笑说：“还可以，难为你了。”另一半人只笑一笑，不说什么了。他们怎样想，我是可以猜到的。

会也开过了，大家都发了言。有的人跳到主席台前，对着画像，挥动小红宝书，激动地批判一通。我觉得很可笑，但是不敢笑。我知道如果我一笑，可能立刻就会带回隔离室去。我因从三堡休养所逃跑时，摔伤了右脚，这时还未痊愈，走路时有点瘸，站着的时候，有时会发抖，工宣队师傅注意到这一细节，认为我画了像，又发言批蒋，心里害怕，所以发抖。在学习班上总结批蒋成果时，李师傅说：“立场不稳，所以腿就发抖。”他看看我，又说：“能够全力投入，努力完成任务，也算有很大进步啦！但是还是要注意站稳立场。”

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一样，是学习班里最丑陋、最让人难堪的一件事了。本来，强迫人跳舞，就够糟糕的了。五十年代解放初期也有过“扫舞盲”。当时，跳交谊舞还有些顾虑，所以发动大家都跳，顾虑就小了。有强迫性，但不跳只是有些压力而已。每次我遇到周末有舞会，我就拿上小提琴报名去参加乐队伴舞，都能混过关。而如今，跳忠字舞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不跳或跳不好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我很晚参加学习班，所以，能不能跳忠字舞，还要经过工、军宣队的批准！我小心翼翼地过了忠字舞这一关。

从各方面比较来看，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师傅水平比较高，比较宽容，允许你讲话。当然如果是铁板钉钉，上级下了结论的东西，就不允许你随便讲了。几位师傅常常找我个别谈话。

这时陆陆续续有几个学习班的学员，学成“毕业”，“干部解放”了，也恢复党组织生活了。有的干部级别比我还高，按理应该排在我后面的，但他们都陆续“解放”了，好像把我撂在一边，没人过问了。我有点急了。这时有两位好心的同志给我打了个招呼：他们出身好，两派矛盾时没

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吸收在专案组里工作。他们说：“你千万别着急。这里有个计划，有个程序，有个次序。轮到你了，你不想解放也不行，你检查肯定通过。没轮到你，你检查多么深刻、多么沉痛也不行。你老罗现在还没有排上计划，老实等着吧！”如他们所讲，从他们打招呼起算，到我得到“解放”，差不多又过了近三年时光。

一位工宣队师傅对我说：“你不要急，你知道毛主席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原本是人民内部矛盾，你态度不好，就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原本是敌我矛盾，态度好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说：“李师傅，问题是：什么叫‘态度好’？”“那当然是首先彻底交代问题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首先还得放下屠刀吧。”“你这里有个假设，就是人人手里都有把屠刀。也就是说，我手里也有把屠刀，不放下就态度不好。这种说法，在违法私设的‘罗文李饶’的刑堂上，是最常听到的。你承认反党、反毛主席，你就是反革命。你不承认，你就是态度不好，那矛盾就会转化！你还是反革命。”李师傅笑了，并且说：“你们知识分子好问题，好辩论，我说不过你们。等我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你！”过了好久，他对我说：“工宣队领导叫我转告你，好好学习，不要‘拉二胡’：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我无言以对，只好唯唯而退！

又一位可能是专案组的李师傅找我谈话，问我一个问题：“工字厅学习班有个你们都很熟悉的成员，在肉刑逼供的压力下，交代了一些问题。现在有人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压力下，丧失原则，交代问题，应该开除党籍，你认为怎么样？”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也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因此，我立即回答：“我认为不应处分。这种事例在文化革命中很多，关键问题是有没有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没有伤害其他同志。如果没有，那就没有错误，不应处分。如果有，那首先是审问方的问题。受审者是被动的，是不应追究的。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同志？（其实，我是知道的，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逼供情况下，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再处分，无异于伤口上撒盐。）我相信他是个好人，而且到如今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错误。”师傅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也赞成你的意见，到此为止，不说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位很好的同志，官至正部级以上，口碑很好，没有瑕疵。

工、军宣队与红卫兵相比较，虽然都是一个“左”字，但工、农、兵和青年学生到底不同，要讲理得多。而且工、军宣队由于进驻学校时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也比较同情和理解学校师生前阶段所受的苦难。因此，学习班使师生多少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等新一轮教育革命的指示，使中国的教育碰到了新一轮危机。基本意思是大学不办了，要办也是工厂、农村、兵营式的“大学”。正在这时，林彪的一号战令，打着备战的旗号，把大学都搬去农村，把单纯政治学习的学习班变成专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边劳动、边思想改造的学习班。

## 扫地出门，大学不办了！——举家迁往江西鲤鱼洲

1968年从“7.27”以后，到1969年，毛主席陆续发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主要是说：高等教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阵地。培养出来的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很明显，大学就不要办了！虽然后来又补了一下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怎么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哪里是办大学？还是不办了。

这些抽象的、莫名其妙的“最高指示”，使高等学校师生如入迷雾之中，前途渺茫，走投无路。这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大中学毕业生找不到出路，毕业就是待业——不能说“失业”，只好称之为“待业”。于是再发一个指示，让大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对大学教师们——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何安排？这成为一个大难题。

林彪的一九六九年“第一号战令”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落实第一号战令——准备打仗，因而将高等学校砸锅摔碗，搬到农村，似乎说不过去。因而改为“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清华先后连带家属有三千多人去了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锻炼，走五七道路。”

对鲤鱼洲这段生活的回忆，是十分沉重的。但是，如果没有血吸虫，没有累死人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没有那可怕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一生中，有这么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到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作朋友，一起劳动，和牛、羊、鸡、鸭生活在一起，也是蛮有意味的。这里有血吸虫，但没有非法绑架和恐怖的逼供。我宁愿多点艰苦

的劳动，也不愿在学校里坐在学习班上，无休止地“斗私批修”。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们也不必把鲤鱼洲的生活说得一无是处吧！

传达过第一号战令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动员起来。1969年上半年，就去了两批，算是先头部队，作住房、吃饭等生活上的准备。土建系是先去盖房子的。鸿文很快就出发了。我对鸿文一直不放心。她身体、精神一直不很好。用现在最常用的词，就是“忧郁症”。但是从她到鲤鱼洲后写回来的两封信看，似乎好了很多。她说，在蓝天白云下，在新鲜空气中，在劳动时不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感觉很好。

这时陆续传来，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畔，有很多血吸虫。毛主席著名的诗《送瘟神》，就是写鄱阳湖畔余江县这个地方消灭血吸虫的情况。清华、北大的师生还是有些害怕。工军宣队的解释是：第一、已经治理过了，有毛主席的诗为证。第二、已经有了预防的办法。第三、知识分子就应该到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锻炼一下。当地农民就可以长期生活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不就不行？于是，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及解放军英雄人物王杰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成为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一小队人行军碰到一潭水，估计是有血吸虫的。但是大家挺起胸膛，高呼那两句口号，“下定决心……”，大踏步地趟着水走过去！直至两、三个月以后，陆续查出一些血吸虫病患者，才使领导清醒和注意起来。清华比北大“左”，因此患血吸虫病的就多很多。

走五七道路的第二个高潮很快到来。这次比第一个高潮要犀利得多。首先是举家迁走，扫地出门，老人、孩子一样要走五七道路。我女儿才四岁，也要去。我本想提出把孩子留在北京我父母身边，但是还未开口，就得知建筑系吴良镛先生的夫人刚刚生了个儿子，也必须去！再看看，在“罗、文、李、饶”案件中被打的浑身伤痛的饶慰慈，被打得至今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文学宓，也都要去，我也就不敢开口了。

其次是下决心不回头了。虽然这样决定，心情很迷茫。我以为远离政治，远离阶级斗争，倒不是一件坏事。谁知，当时的清华大学已经只剩下一个专业——就是阶级斗争了。因为扫地出门，决不回头了，所以家里有什么东西都抖落出来，这是个机会，可以检阅一下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些什么家当。原来都是一些旧的衣物家具，相当一部分家具还是借学校的。工宣队决定大家一律轻装上路，向学校借的家具还给学校，多余的

东西自己找地方存放。工宣队找来两辆平板三轮，要选两个人，身体较好，会蹬三轮的，把这些要寄存的家具和衣物用三轮送进城。在工字厅宣传部的学习班中，艾知生和我身体较好，66年和67年“劳改”时，也都蹬过三轮，因此我们两人被选中。我问艾知生，“你行吗？”他笑笑：“不行也得行。如果我不行，你就得送两次，你不行我就得送两次。还是咱们结伴一次送完吧。我看了，东西不少呢！而且经过西四、后海、地安门内大街、八面槽、王府井、东单、崇文门、花市、……等等，都是闹市区。任务很重呢！”我说：“我蹬过三轮，但没出过学校。”他说：“我也一样。试试吧！”第二天，我们完成了任务。

我父母亲当然不愿意我去，担心我身体受不了，而且身上的伤痛尚未痊愈，又是血吸虫疫区。尤其不放心四岁的小孙女到农场没有人照顾……。能不能再等两年再去？能不能等一些机构比如说托儿所、幼儿园建立起来再接孩子去？能不能至少你先去看看，再回来接孩子？……等等，一系列的“能不能”，我很为难。其实这些也都是我的问题。我能说什么呢？父亲刚从蒯大富的囚房里放出不久，余悸犹在。他只说：“算了，听天由命吧！说了也没用，还惹事！”母亲更开明一些：“既然如此，你就带孩子高高兴兴地去，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孩子在你们身边，也许比我们带更好！”

再一个问题是，经过几次抄家，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生活本已十分拮据，现在要举家搬迁，更是困难。鸿文走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点点积蓄用掉了。当时学校工宣队通知说，有一批文革中的查抄物品，经过两次拍卖，现在还剩下一些，你可以去认领。我去看了看，原来是还有一个皮箱，质量非常高的，是我母亲陪嫁的，箱子里面残存有两张我的照片，因此找到我。但是我看到这个皮箱时，简直哭笑不得，原来抄家的人撬不开那把高质量的锁，就用刀整个割开，把东西全拿走以后，留下这个残破的箱子。我只好买了一个质量很差的箱子给她用，但这也用完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了。当时我已穷困到连饭票都没钱买了。现在轮到我和孩子要走了，要修理这个皮箱也没有钱。我找到一个存折，大约有三十几元。银行看了以后说，你是有问题的人，因此已经暂时封存，要等问题解决以后才能启封。

天无绝人之路！我忽然收到两张邮政汇款单，每张20元，汇款人姓名、地址都不详。仔细研究，其中一个汇款人一栏有个王字。我左思右想，似

乎记得，这可能是一个1958年入学、1964年毕业的工农调干学生，叫王福勤。当时工农调干生已有家室，负担很重。不知家里什么人生病，急需用钱，我帮助过他20元。估计现在寄钱来的，一定是他。我含泪到邮局取出这救命的20元，用19元修好了破皮箱，给我母亲那里也有个交代。另外的20元也取出了，买装被褥的行李包和打包用的绳子等物。

孩子那里，几乎不用动员。我只说，“威威：爸爸要去江西了。”她立刻说：“去江西找妈妈啦，那我也去，我也去！”“好，我们一起去找妈妈。你看你有什么东西要带去的，你自己收拾一下，别麻烦爷爷、阿嬷。（广东话称祖母为阿嬷）”我父母亲看见小孙女很高兴，就把眼泪藏起来，什么都没有说。

就这样我们父女就上路了。我两个姐姐都到车站送行。大姐带了一包大蒜头，叮嘱一定每顿饭吃一瓣。这在当时卫生条件极不好的情况下，起了很好的作用。二姐则塞给我十五元钱。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并说：“我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爸妈年纪大了，也只靠你们来照顾了。”

不太懂事的女儿，总是高高兴兴地，嘴里总是念叨着：“我要去江西找妈妈了！”而家长们心里默念着的是：“血吸虫！”

## 农场生活散记

### 团聚·盖房子·安家

火车顺利到了南昌，改乘汽船，沿着鄱阳湖大堤向鲤鱼洲进发。车厢或船舱里不时有孩子的哭闹声。总的情况还算好。我们父女俩则形影不离。女儿跟着我，左手提着铁桶，右手攥着我的衣服。不时问我：“什么时候到，我是不是很快能见到妈妈了？”

进入到清华的地段了，我看见一小队人在大堤上和我们船同方向跑。最后一个女同志，我看象鸿文，我指给女儿看：“你看那些人里有没有你妈妈？”他看了看说：“好像最后的那个是我妈妈。”船到码头，好多人来接，笑语喧哗，好不热闹。鸿文也到了，她证实我和女儿看到的是她。

带家属的暂编为九连，工字厅为一连，建筑系为八连。鸿文很想把孩子接到八连跟她一起，她觉得我带个女儿住在大统舱里不方便。但是总领队已经讲了，暂时按出发时的编制不变，农场正在安排。因此前两三个星期我就带着女儿了，包括吃饭，洗澡，睡觉，换洗衣服，等等。第二天天

刚亮，就有人轻轻地叫醒五六个男同志说：“洗脸水要到200米以外的水井去打。这里有个大水缸和水桶，你们做做好事，趁大家没起，把大小缸担满水，谢谢啦。”我注意到工字厅又是我和艾知生每天早晨担三至四担水。

第一天就开始劳动，任务是担砖，盖房子用的砖，距离约400米，每块砖约6斤多。第一次，我前后各装了14块。一位工宣队师傅看见了就说：“那位老师，你装这么多，半路上就得扔下，少装一点，慢慢来。”旁边有个人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笑了说：“你是罗征启呀，你的伤还没好，少装点。”我笑了笑，前后各拿下两块。就这样，我担了24块砖。走了一半路就后悔装多了，又不好意思卸下几块，只能咬着牙担到目的地。离我们住的大统舱没多远，我忽然听到我熟悉的声音，是几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地上摆了几杯水，大声说：“叔叔阿姨们，你们辛苦了。喝点水，歇一会儿。”我们几个满头大汗的劳工都眉开眼笑了：“快到了，回来再喝啦，谢谢你们，小朋友！”我们感到步子轻快了许多！那天下午，我一共只担了四趟，第二、三趟我前后只各装11块，最后一趟前后只各装了10块。晚上脱了衣服，看到肩膀压得通红，而且有点痛。右肩用得更多，也红得多，痛得多。晚上睡在大统舱的通铺上，数着又红又痛的肩膀上血管的跳动，我笑了，这就是劳动锻炼！

担砖的话，只有三天就干完了，然后就是盖房子，砌砖。是基建队的一位卢师傅带我们干。在1966年和1967年我们“劳改”时，我曾在卢师傅手下干过。这位师傅对“劳改犯”们非常好，这次又碰到他，我很高兴。第一天，卢师傅叫我出列，对大家说：“工字厅的干部只有老罗一个人会砌砖，其他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供灰浆，另一部分填心填灰浆，我和老罗把角砌外皮。”一天下来，我累得半死，但是总算完成任务。到农场后的前两个星期，都在砌墙盖房子，没见下田搞农活。我暗自庆幸，远离血吸虫也很好嘛！

第三个星期接到命令，连队调整。原基建队的工人师傅，完成主要的基建任务以后，就返回学校。余下的基建任务由八连——即土建系的连队完成。八连离工字厅的一连很近，走路不到10分钟，主要任务是盖房子。家属都跟所属的连队，我的女儿就跟妈妈到八连，并且分到一间房子。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有这样的待遇，已经算是很满意的了。我入编在一连，主要任务是务农。

从九连到八连直线距离不远，但经过泥泞的田野，步行要走近半个小时，车行要十分多钟。我把她们母女的衣物以及我暂不用的东西打包送上机械连的拖拉机，送去八连。我则带孩子穿过田野走过去。我和孩子看到新分配到的房子，很满意，比清华的荷花池一宿舍还大三分之一呢！孩子送到，我就回九连了。临走，鸿文忽然问我：“你脚上的伤好了吗？干活时小心点。”虽然只是两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却使我感觉到了久违了的温馨。而且最难得的是她的身体在劳动中有好转。第二天，随工字厅的大队人马一起行军到一连驻地。

### 当了牛倌儿，干上农活

指导员是原校团委的一个部长，连长是科研处的一个科长，都很和善，安顿我们住下。我们这个连队没有家属，有一两个男孩子就跟爸爸睡通铺。连长又说，我们连队分配到三部拖拉机：一部丰收27型（轮式27马力），一部丰收35型（轮式35马力），一部手扶拖拉机，两头水牛，一头黄牛。拖拉机我们动农系、机械系的人都会开车，不成的话我们派人去学。因此，我们成立一个特务班，专管牛、机械、仓库等。我们都不喜欢“特务”这两个字，因此实际上一直叫牛班、机械班等等。连长点我的名字，要我去管牛，从此我又多了个名字叫“牛倌”。但是连长单独向我交代说：“分配你去养牛和使牛。理工科大学没人会养牛，更不会使牛。我们一连有个老头王世敏，六十多岁，马上退休了。他是赶大车（马车）的，几十年了，就让他带一带你。我跟他谈了，说叫罗征启跟你学学行吗？他说，就是‘罗文李饶’那个罗征启吧？我是赶马车的，牛没使过。而且这里是南方牛话，和北方马话不一样，还得现学。”

我去见这个老王头之前，有人告诉我，这老王头有严重历史问题，生性狡猾，你得小心点。我见到他称他为老王师傅，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您多指教。”他说：“我也不会，咱们一起学吧！”他又说：“咱们这两条水牛，一个五岁，一个六岁，咱们就叫他们小五、小六。他们都干过活，所以你得搞清楚这里的牛话怎么说。今天你先到附近农村去问问他们怎么说，我们北方叫他走是‘架’！叫停是‘余’！你就问清这两个就行。我刚才试了，用咱北方话不行。”于是我就去学江西牛话。我一边走，一边想：怎么这么多人“有严重历史问题”？这老王头给我的印象还不错，他很详细地给我讲了他赶马车的经验。但是他声明，说了半天都是马

的，不是牛的。而且没有用马耕田的。咱们还得从头学。江西话我实在听不懂，你去学，回来教我。他还说：“我有个毛病，早起得一暖壶水，沏茶喝。没喝早茶我一天没劲，所以这放牛也得劳驾你了。”

我在一连附近看到：有个老乡用牛耕田，两条水牛用一条，另一条休息，那牛非常听话。但我听不到老乡说什么，几乎一直安安静静不说话。后来，那位老乡看我不走，就笑着用很重的方言口音问：“哪里来的？”“北京来的，清华的。”我说。“看什么？有什么问题吗？想问牛话吧？”他笑着问。“是呀，农场给我们两条水牛，怎么吆喝它都不动，我看你用牛耕田根本就不说话呀！”

他得意地笑了。“先要养好、喂好。然后才能用好。早晨你要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带它到青草长得好的地方，放开让它吃个饱。然后你吃早饭的时候，让他有时间反刍，叫‘反刍’。然后带它去干活，你不说话它也乖乖地给你用。中午、晚上你吃饭时也带它到水草好的地方让它吃饱。这样牛就好用了，让它走喊‘嘿’！或‘哈’！叫停就轻轻地叫‘啧啧’！初时一边喊一边动缰绳，以后只动缰绳牛就懂了。最重要的是喂好，让它吃饱。”他指着牛的脊椎骨旁后腿上方肚子的地方说：“肚子这里塌陷下去就是肚子空了饿了，这时你强迫它干活，它就不高兴了。这里鼓起来都平了，就饱了，吃饱还要给他时间反刍。所以，中午不要让他吃太多了呢！”

最后，我感谢他教我这么多，他才说：“你们农场从我们这里买过牛。从小养大的，不愿卖呢，它们也不愿走呢，已经干了几十年活了。最难的是教牛干活，以后我再教你吧！”但是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他了。以后我们一连发展到十头水牛，一头黄牛。我在假日休息时常到附近农村去看，重点是看牛，看老农干活，自己也捉摸着，学会了许多东西。以至后来教牛干活，用牛干犁、耙、耖、耩等农活，拉车，给牛穿鼻孔，教小牛上套等，我都比较熟练了。有两头母牛生崽了，队里谁也不能走近，只有我可以。

有一次，有个连向我们一连借两头水牛和牛车，说是要借一天。连长同意了，就让他们连牛带车牵走了。到十点多钟打电话来说：“你们的牛生病了，不肯动。我们想换另一头牛，结果套不肯上，两头牛都躺在泥潭里不肯起来！”连长叫我赶快去把牛和车牵回来。我赶过去一看，两头牛躺在泥潭里，两对狡猾的眼睛看着我。我轻轻地说：“起来！”它们立刻

站起来。我给一头牛套上车。另一头跟着。我坐上车，两头牛不用下命令，自动向回家的方向走了。兄弟连的人说：“老罗你怎喂的，这牛欺负人！”我笑着说：“这牛是我喂的，一直跟我干活的，当然听我的！”

一个军代表在从八连回一连的路上，看见我在犁地，坐在田边看了半天，笑着说：“这犁地最难的，老罗你怎么整的，这牛这么听你的？”我随口说：“我听毛主席的话，牛就听我的话。”这句话被作为“五七战士的豪言壮语”登在连队的墙报上。虽然并没有写明是谁说的，但是关于牛的肯定是我说的了。与我有患难之交的文学宓笑着对我说：“老罗！这话可不像你讲的！”

1971年秋农场撤回北京了，提前几个月就把牛卖掉了。附近农民来牵走时，我的‘小五’、‘小六’、小公牛等都流眼泪了，我也流眼泪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我就不吃牛肉了！

农场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还办起了小学。一连和八连合办一个，请了土木系的一位老师，叫孙元，带着这两个连队的几个孩子。孙老师整天笑眯眯，对孩子们很和气。有一天，早晨广播电台说：日中友好人士“西元寺公一”到访。孩子们说：“广播说孙元是公鸡！”一时传为笑谈。

一次我的女儿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朱伯伯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了。”她说的朱伯伯是原科研处的副处长朱成功。大我十岁，因此孩子们称他为“伯伯”。我问她：“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哩！谁告诉你的？”她说：“孙老师说的：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所以朱伯伯的妈妈一定叫朱失败！”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使小“牛精”耩一块地，这时几个孩子顺着田埂跑过来。女儿问我：“爸爸，你这条牛是牛爸爸还是牛妈妈？”我知道这又是孙老师跟孩子们讲的。就回答：“它是牛爸爸。”她就拍手笑着说：“它是小牛的爸爸，所以叫牛爸爸，就像你是我爸爸一样，所以我叫你爸爸。”

我们带着孩子的老师在一起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农场生活还是有許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如果没有血吸虫，让孩子在农场生活一段时间，是很有好处的。苦中作乐，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还能够坚持活下来的一剂良药。三千多鲤鱼洲战士（包括家属），有一千余人患上血吸虫病，不能说凯旋而归，但总是保持原来的建制，班师回校。

## 八七风暴——1971年8月7日立秋日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报纸上、电视上一提起风暴、台风、龙卷风等字眼，我就会想起“八七风暴”了。那天是立秋，在江西，可以说正是最热的日子。早上毒热的太阳高悬天空，一点风都没有。午饭以后，天气更闷热了。下午四点左右，东北方向，也就是鄱阳湖方向，天边一大堆雨云，慢慢升起来。但见云层中电光闪闪，上下攒动，真有点恐怖。这时，接到连部的通知：“可能有风暴，迅速撤到安全的地方。”所谓安全的地方，我们知道是指砖、瓦的建筑。像我们住的茅草房很可能大风一吹就散掉。但实际上，我们认为最结实的食堂，却是第一个倒塌的！我赶快收拾家具把牛赶回连部的牛圈。那天跟我干活的是“小五”，这时看见天气有变，也急着回家。经过一连食堂南边的池塘时，“小五”迫不及待地跳下去。这时“小六”也到了，也跟着跳下去。我把栓缰绳的铁钎插好，就跑去牛圈查看。牛圈新盖的，比较矮，估计比较安全。碰见一连的战友，互打招呼着去食堂吃饭。我不放心水塘里的两头牛，又去看一下，检查一下缰绳，都没有问题。这时，茶炉房的老陈师傅（他眼睛不好，因此分配管茶炉房，外号陈瞎子）打开茶炉房的门。风已经很大，他用身体顶着门叫我：“老罗，大风到了，快上来！”我马上跑上来。水塘在食堂的南边，食堂的入口在北边，从水塘到食堂入口经过茶炉房，陈师傅迅速开着门用劲顶着门。这时已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风太大，我走不动。陈师傅说：“老罗！到茶炉房来，这里安全，吹不动这锅炉。”我来不及想什么，使劲向茶炉房靠拢了两步，被陈师傅一把抓进茶炉房。这时天黑不见五指，只电闪时能看见东西。茶炉房里已经有人了，连我和陈师傅算上已经有四个人了。我趴在茶炉房的小窗房看外面。忽然我听到外面有人喊叫，喊叫什么听不清楚。借闪电的光亮看外面似乎有些不对，再闪一下我大叫说“食堂塌了，快救人”。我打开门看，风雨已经小了，但屋顶塌下来的砖瓦木块散落一地，有的还在滚动。雷鸣电闪还在继续。因为停电，整个连队漆黑一片。有几支电筒在扫来扫去，并且有人喊：“有人吗？食堂有伤员，快去抢救！”我正要去食堂，有个熟悉的声音问：“你是谁？”“我是罗征启。”我答。那人说：“我是方惠坚，你帮个忙，食堂塌了，有很多人受伤，我也伤了，现在去缝针。在厨房里面的办公室里，有个书桌，应该是锁着的，里面是账目，你帮我看住别让人动，最好交到连部办公室去！”方惠坚文革前是校团委的第一副书记，当时似乎是一连的食堂管理

员或者司务长之类的。我很感动，他受伤了还想着工作。我立即去食堂，只见一片残砖败瓦，真个顶棚没有了。砖砌的烟囱倒塌了，碰到屋顶上，屋顶也就塌了。我按方惠坚的叮嘱，找到他的办公桌。看到连部已经派了两个人正抬着那张办公桌，我就没有吱声。

农场各连队陆续传来消息：各连的食堂的烟囱全倒塌了。伤员有几十个，大部分是房屋倒塌砸伤的，也有几个雷击伤的。较重的伤员有三十多个，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农场的驻南昌办事处已派了农场的游艇来接重伤员到南昌治疗，较轻的就留在农场医治，要各连抽调一些没有受伤的抬送伤员去南昌。天亮时，游艇到了。我们戏称之为“鲤鱼洲号巡洋舰。”

我们一连派了几个人抬送伤员，有我一个。我们虽然一夜没睡，但接到命令都很兴奋。各连都派拖拉机把伤员送到一连，在一连码头登船。在抬送机械连的一个伤员上船时，刚刚安置好，他忽然说：“这不是老罗吗？怎么着，你不认识我了？”我一看，马上认出是汽车实验室的张德禄师傅。我说，“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从三堡跑出来，您开车把我接回学校的。张师傅您怎么啦？”他说：“我让雷打了，那时跨步雷击。雷雨的时候你不动就没事，你走动就有形成一个跨步电压，就有可能被雷击。我这算轻的，可是还有可能落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我说，“不会，不会，好人得好报，您是大好人，会有好报的。”他笑了说：“那可难说，说不定没劈死我也就算是好报了。”我说：“张师傅，您救了我，我连谢都没说一声，真不应该。”他爽朗地笑起来，并且说：“这不？我救过你，你现在来抬我，一还一，打平了。别再说了，哈哈。”

船到了南昌，我们把伤员送去医院。忙乱之中，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因为天气热，我们都习惯了光着膀子干活。平时只穿一条短裤衩，脚踏人字拖，有时光着脚，不穿鞋。工宣队师傅说过我们多次，大家互相尊重，讲点礼貌。但是，实在太热了，顾不得这么多了。开全连会时，如果哪位多穿一件线背心，他今天肯定有发言。这次我们忙了一夜，船一到马上走。没顾上穿件“礼服”，一个个光着膀子就到南昌来了。抬着伤员还好，在街上，就这样走，活像一群要饭的，谁也不会相信是一些大学老师。南昌办事处也通知我们，没事不要上街，等回家取回衣服再出去。据说已经有人被南昌市公安局扣查过了。

过了几天还是乘我们的“巡洋舰”回到农村。虽然风暴过去才个把星期，但已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还没顾上回家看看。风暴那天，我碰见八连

的人，请他告诉家里，我没受伤，现送伤员去南昌，过两天就回来。

我先去看我的十多条牛，它们都很好。那条两岁的小公牛，跑过来欢迎我，我叫它小“牛精”，广东话是“蛮子”之意。我已训练它干各种农活，拉车，都能干，但就是不让人骑。有一次我试着骑上它，它发起牛脾气，把我颠下来。我摸摸它的头：“这回我得训练你让人骑上。”旁边老王头搭话说：“不必了，这次风灾加速农场撤离，我们的牛已经全卖了，过几天就牵走。连部已经通知，让我第一批撤。你什么时候撤，我不知道。都很快了。”我没说话，心情很复杂。离开血吸虫疫区，固然值得高兴，但我舍不得我的牛，也有点舍不得这个农场。

### 农场收摊，撤回北京南郊团河一区赶上“9.13”事件

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战令，把我们都分配到农村。而“9.13”事件，林彪葬身温都尔汗草原，我们才有机会回来。这并非很确切，可能有点巧合。农场的收摊、撤退，有些在“9.13”以前已经在安排。“9.13”、“八七风暴”和血吸虫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加速的作用。

一连大部队“9.13”以前就撤离农场了。我是留守部队，做收摊工作。牛卖了，连长叫我改行，开拖拉机。任务是抢收地里的粮食，和各连队撤退以后留下的物资。9月初，天气闷热，政治空气也非常沉闷不透气。我去给文学宓送行时说：“你经过上海、回到北京时到市里走一走，到新华书店走一走，看看有什么变化？”他说：“好！我也觉得可能出问题。”我问他：“你觉得这次该谁了？”他笑笑问：“你说呢？”我说：“咱们学周瑜和诸葛亮吧！写在纸上。”“好！”两人亮开一看，都是个“林”字！但他走后，很快就接到来信，说北京、上海都没有什么变化云云。直到9月底，“9.13”事件正式传达。我因为尚未“解放”及“恢复组织生活”，不能听传达，只好约文学宓传达以后再给我传达一下。当然，我们都很高兴，尤其是因“罗文李饶”一案，我还有一笔账，就是说“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现在这块压在心底的大石头也就放下来了。无论这话是不是我说的，也无论这话是对是错，总之不会再追究的了。

农场撤回北京了，但并未撤销，在北京南郊团河继续办，只是编制缩小了。原来鲤鱼洲农场有九个连队，每个连队有百余人。现在只有一个连。连长是个解放军连长，姓王。指导员是林泰，每两周放假两天，学校派车接送。原来鲤鱼洲撤回的人，大部分归队了。只有我，还是那句

话：前途渺茫。

一个星期一早晨，我刚回到农村，忽然接到通知说学校有电话找你。吓了我一跳，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我用连部的直线电话，接通以后，知道打电话的，就是前次通知我不要急，时候到了一定可以解决的那两位专案组的同志。他们说：“已经到时候了，下周学校通知下达，下周以前解决。你注意，不要乱检查。”我放下电话，王连长问：“什么事？”“没事！”我答：“家里来了人，我说下周末才能回家。”

下一周的周二下午，军代表王连长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也该解决了吧！这星期开个会，你作个检查，得到大家理解就了结了。我说：“连长，请您指示一下，怎样检查才好？”王连长说：“还是那几句话：抓住重点，深挖私字一闪念。”我问：“文化革命以来，我已经检查过无数次了。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抓住重点？”连长说：“还是首先看你的态度：态度好不好，一听就知晓！抓住重点才是态度好，你的重点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他又要我回去好好想一下，明天下午再来谈谈。

第二天（星期三）下午，我又到连部。王连长似乎有点急，但是我已经得知：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无非就两个问题：第一，议论过江青的“文攻武卫”论。第二，说过文革中立了很多毛主席塑像，让毛主席风吹雨打，看门站岗，很不恭敬，都应该砸掉。专案组认为，还是应该提高认识，否则，解放干部和恢复党组织生活都拖到全校倒数的冠亚军了，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说不过去呢。

任连长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没有什么问题。”连长有点生气，又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连一闪念的东西都挖不出一丝？我就不信。我就有过一些想法，说了不就没事了吗？”我说：“连长，这态度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尤其应该实事求是。比如，我对江青同志说的文攻武卫很有意见，现在她也没收回，我也坚持我的意见，她讲这话，不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她讲了以后，报纸文件上和其他领导同志讲话里，对‘文攻武卫’都没有肯定过。现在我还认为我没错，您说，让我怎样检查才是？”连长有点不耐烦，摆摆手说：“回去好好再想想，别钻牛角尖哪！”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喂猪。连部通知我：“下午到连部，连长和指导员一起找你谈话。”午饭的时候，我在食堂碰见林泰。我问他：“指导员

同志，找我谈话呀？”他说：“别开玩笑，说正事。连长让我参加跟你谈话。本来你我是同班同学，又都在宣传部工作，我应该回避。所以前两次谈话我都没有参加。现在他说你态度生硬，他没办法，所以要我参加。这可难为我了。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都有台阶下才行。”

周四下午，在连部，连长、指导员正襟危坐，一副严肃的样子。我不知如何开始，就低头看地，不说话。连长打破静寂说：“怎么样，老罗？有没有什么进展？”这时，林泰抢先说话了：

“罗征启，你我同学、同事这么多年，总算比较了解的。连长已经把这两天跟你谈话的情况告诉我了。我说点意见跟你商量：我们党的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为人处事，不可能不犯错误，没有缺点。比如说吧，周恩来总理，工作这么繁忙，能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吗？却从来没听你说过什么。可是对江青同志就不同了，说一句话就意见一堆。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这问题。这说明：你对个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同志缺乏无产阶级的感情！”

不知道林泰是在帮我找台阶下还是在批我。根据我对老同学的了解，他确是在帮我分析问题。我来不及多分析了。于是来个顺杆爬说：“你这么分析对我有启发，我确实是对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谢谢你。”连长大喜说：“还是你们知识分子老同学互相了解，这不就解决了吗！明天开个会，老罗作个检查。指导员，怎么样？通知开会吧！”

第二天晚上开了会，我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全校大概还剩下一个人没解决，就是蒋南翔校长。到1974年，蒋校长才解决。那天晚上，阔别很久的党组织生活算是恢复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回家”、“归队”的感觉。挨过无数次的批判，做过无数次的反思和检讨，到头来没有进步，甚至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这次的检讨，和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我作的第一次检讨比较，比较没什么变化，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有的同事、朋友问我，“老罗，你入党这么多年，折腾来、折腾去，后悔吗？”我说，“我还没闹清楚，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国家、社会到个人搞得一团乱到底是为什么？！还不到后悔的时候。”

周末回到学校，接到人事处通知：“下周一到政治部报到。”我说，“我不想再在政治部工作了。”人事处的同志说，“这你去找政治部谈吧！”周一，我还没有回农场收拾行李和辞行，就到政治部去，见到政治部主任胡宝清。是解放军海军的一位大尉。他说：“欢迎你回政治部工作，

刘队长跟我提起过你。”我立即表明不想再搞政治工作。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你找副主任艾知生同志谈谈吧，他对你们都了解。另外宣传组组长胡大圻同志你们都一起工作过，我们本来安排你回宣传组工作的，现在你不愿意，就先找他们谈谈再说吧。”

艾知生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讲：“我已经和胡宝清主任谈过，征得他的同意，给你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到处走走，到处看看。这样安排有两点考虑：第一，你的安排要迟群同志定。他很关心你，前天团河农场的王连长来向他汇报你的恢复组织生活问题，让他大骂了一顿。我不知你说了什么，只听说迟主任骂那个军代表，人家骂你、玩弄你，你还表扬他！真是笨蛋！所以，我们想安排一段时间让你离开工字厅远一点，可能好一点吧！”他看我点点头，知道我同意了，才接着说：“第二点，农场上星期汇报，血吸虫问题，我已过关，检查阴性通过，校医院还把你列为‘嫌疑犯’。因为你整天和牛一起在水塘里，有时要下河拉牛，而且上次农场普查作‘环卵试验’，你有问题，所以你还还要查一次，有问题就要治。”

所以，农场生活还没有结束，还要过血吸虫这一关。

### 血吸虫

办农场的初期，由于对血吸虫问题不太重视，再加上当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感染血吸虫比较多。然而大家仍跟着毛泽东“送瘟神”的诗句：“华陀无奈小虫何？”称之为“小虫”和“小虫病”以表示藐视。但是，不好的信息越来越多，感染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的人“二进宫”、“三进宫”，治疗的办法是打一种针叫锑剂，这是一种剧毒的针剂。它对人身体的伤害，甚至不比血吸虫小。在鲤鱼洲农场里，甚至有谈锑色变的感觉。已经有人拒绝这种治疗了。学校和农场都紧急研究有没有毒效小一些的办法。另外对检查定案也较仔细，不轻易下定论，同时也比较尊重病人自己的意见。

三月底，校医院通知，鲤鱼洲一连的同志要普检一次。按规定时间排队等候登记，还是要重作“环卵试验”。

依顺序先登记，发张表填上各种数据。都是农场一连的熟人。有人打招呼说：“老罗！你不用查了，准有！整天跟牛一块在水田里还能没有？”这时一位负责登记的护士喊了一声“罗征启！”我应声答“到！”

这护士低头迅速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抬起头问我：“是这三个字吗？”我说：“是！”她又抬头看看我并且问道：“咱们学校有几个罗征启？”我一时不知所措。排在我后面的印刷厂姜师傅笑着说：“就一个罗征启还不够呀！”全屋的人捧腹大笑，那位护士也笑了，说：“对不起，我们校医院都以为罗征启是个老头呢！”这样的笑话在鲤鱼洲已经有过几次了。一次在担土修大堤时，我担完一担，再去装土时，一位工宣队师傅看见我就喊：“罗征启，这里来，我给你多装点。”在我前面铲土的一位校医院护士听见“罗征启”三个字，像听见鬼叫一样，扔下铁锹，转身瞪大眼睛对着我说：“罗征启！在哪儿，在哪儿？！”搞得在场许多人哈哈大笑。那位工宣队师傅笑着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前面那个就是。”她说：“我们校医院都以为怎么着也得有五十来岁了。来，来！我给你装吧。”工宣队师傅说：“还是我来装吧，他腿上有伤，没完全好，不能装多。”

一个星期以后，“环卵试验”的结果出来了：“阳性”！我陷入“治，还是不治”的迷茫之中。校医院通知：为了安全，已经联系请中日友好医院给这次检查阳性的同志再检查一次。这个医院可以说是血吸虫的专科医院，比较权威。检查方法是用直肠镜检查，看直肠里有无虫卵。查过之后，可以请医生咨询治疗办法。那里的医生都比较有经验。初步商定，这次治疗不用锑剂针剂，准备用口服锑剂和口服乳酞粉，这个药毒性小，对身体的影响小。校医院还通知说已经安排了床位。四月中以后可以入院治疗。

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人，就是承宪康。当天下午，居然在校园里就碰见很久不见的承宪康。他原来也是校团委的，文革前，当过团委副书记，分管体育代表队。文革中，他没有介入两派矛盾。有一段时间不知所踪。后来知道他找到一个工厂去劳动了，因此口碑很好。可能是第一批或第二批到农场的，也就是血吸虫患者的先头部队。据说他已经是“三进宫”（即治疗三次）了。我认为这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战友都是血吸虫病的权威，最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是咨询小虫病的最佳人选。

我说明为什么想见他，他说他也正为此想找我谈谈。他已经听说我查出了小虫病。我们在校园里边散步边谈。谈了一个下午。

他首先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查出了，但我不想治。”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看你们几进宫，太可怕了，我情愿不治了。”他摇摇头说：“不对，你这个想法不对！”接着他说了一番道理。

“第一个是‘戴帽子’的问题。什么‘帽子’？‘血吸虫病患者’的帽子。你要知道，这病是很厉害的。我们几进宫的人当时就吃这个亏。重伤不下火线，结果把身体搞坏了。注意：宁愿没病错戴上‘帽子’，不要有病不肯戴‘帽子’。你看，你、文学宓、饶慰慈身上都有伤，但是有哪个医生肯开个证明说是几度伤残？结果你们还得去农场劳动。听说69年你还献了一次血，所以血吸虫病患者这项帽子一定要戴上！”

“第二个是戴了帽子就得治。这锑剂是毒药，可不认人的。虫病没害死人，治小虫病的药可能害死人哩！我告诉你，现在药物有改进了。首先针剂改口服的了。其次，即使是口服的，那你自己就一定程度可以控制的了！针剂的主动权掌握在医生手里的针管上，你没办法不打，打多少也由不得你，而口服的药基本上是掌握在你的手里。”

我发现我听了这段话以后，眼前一亮！

“还有第三呢。”老承继续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每人身上有多少条小虫也是不一样的。你能从三堡跑出来，饶慰慈就绝无可能。你使牛的整天泡在水里，接触疫水的机会多。他们盖房子的，开拖拉机的就少些。但是治疗时用的药和剂量都是一样的。这也给你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一番话给我开了窍。我明白对身体的问题切不可大意。也不可以简单化处理。我又找了几位同事商量，大家一致意见：第一，你即使中日友好医院检查找不到虫卵，也要治，因为你是牛倌。第二，小心用药。第三，治疗过程中请承宪康多去医院看看。四月上旬，开始治疗。

第一天，平静无事。

第二天，大便稀烂。身上开始有锑剂的味道。

第三天，混身都是锑剂味道。承宪康来看了，说他们打针的第二天就是这个味道。我开始减药。

第四天心跳减速，医生开始紧张，每天检查好多次。

……

第十四天心跳降到40以下，最低38次。承宪康来看，意见停药。

第十五天，停药一天，心跳恢复到52次，继续服药。

第十六天心跳持续50次，最后一次服药。

总结我的半个月服药过程，算是比较顺利的。我自己减药将近一半，是否太多了，影响疗效？我和承宪康都认为，从服药倒数第二天心跳降至

38次的情况来看，如果不减药，肯定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多么大的问题，那就很难讲了。服药以后要静卧20天，以便将药的毒性排出。而我也没有静卧，每天都偷偷溜出去到荒岛、气象台一带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甚至偷偷跑到气象台顶上玩了一次，这是我在清华园几十年来心底里的一个愿望。另外我看到校医院发给每个病人每日三粒维生素C片剂，还有一些维生素B片以及酵母片、钙片，大家都不吃，只有我天天吃掉，自己还买一些来吃。我劝大家尽量都吃掉，结果基本无效。我把周围病友的多余不吃的维生素片都拿来吃掉。到20天期满检查身体，全体病友，只我一人肝功能正常，其它指标也都正常。校医院医生说：“我们收治了这么多病友，只你一人是这个情况。”但是，承宪康不许我把自我控制的情况说出去。他说：“你这样自己控制是否肯定全是正效果，没有负效果？很难说哩！医学这事，没有经过大量试验证明，是不能随便说的。”我遵照他的旨意，现在才第一次公布此事。我现在已加入“80后”的队伍了，仍然基本健康，这不能不感谢承宪康对我的帮助。他比我小几岁，却于前年因肝癌不治离我们而去。“肝癌”！听到这可怕的病，我们鲤鱼洲的战友都会立刻想起血吸虫病。我也会立刻想起承宪康同志。老承，你现在在哪儿？

## 迟群、谢静宜的“政治部”

治疗血吸虫以后，休息了两个月——如果不治血吸虫，这两个月份就没有了。这验证了承宪康的意见是很实在的。然而，两个月时间倏尔而逝。我又去见我的老上级——艾知生。他笑脸相迎。我听说迟群对他还好，很信任他。因为他处事谨慎，不乱讲话。又听说胡宝清要回部队，艾知生就是接替政治部主任的最佳人选了。他问我，“怎么样，小虫病算治好了没有？”

“连治疗带休息三个多月了。您上次说，让我休息三个月，到下面走走。我休息完了，就是没有到下面走一下，现在就是来听您安排。”停了几秒钟，我又说：“老艾，我说老实话，我不想，甚至很怕回政治部工作。”

艾知生微笑着说：“可能最后还得回政治部。现在先不定吧！”他又说了一些情况：“迟群最近可能听到李北汗讲了一些情况，对你态度转变了一些。有一次迟群问‘罗征启现在在哪儿’，大家说‘在治疗血吸虫。’迟群问‘治完小虫准备安排他做什么？’‘还没定。’大家说。

‘听说他会写文章？’迟群说。刘冰说：‘过去帮蒋南翔和刘冰写过一些文章。’胡宝清说：‘这人敢讲真话。原来工字厅的人对他反应都不错。’迟群没说什么。我（艾知生自己）补上一句：‘工军宣队救了他，这人是会感恩的。’”我说：“感谢你们大家为我说好话，但是我还是很不愿意回政治部，尤其是不愿意再搞宣传工作。”他最后说：“还有点时间，再看看吧。”

又过了几天，艾知生找我说：“我已经和土建系的张凤瑞说过，你可以参加系领导的会，可以把有些情况带回政治部。原来这个系是我联系的，现在就交给你了。”他继续说：“这样，你的工作就是土建系和政治部各一半。你离开政治部已多年了，尽跟牛、水田、牛车等打交道。当然，你表现也不错，可是和政治工作就生疏了。有一个过渡期可能好一点。土建系张凤瑞他们都欢迎你，他们甚至想把你调回土建系，但胡宝清同志不同意。”于是，我过了几个月悠闲的生活，继续休息了一段时间。

年底，我还是被召回到了政治部。在宣传组，组长是胡大昕，他文革前就在宣传部工作，排名在我后面。所以胡宝清专门和我谈，问我以前他在我后，现在他在我前，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没关系，他能力比我强，能胜任。我们也会很愉快地一起工作。胡宝清就没说什么了。

开始，政治部宣传组的工作并不多。直到有一天，在校刊《新清华》的编辑室里，我正和徐葆耕闲谈，忽然迟群闯进来。他披着一件军大衣，我见过他，但他可能认不出我。他爱搭不理地、一脸轻蔑的样子，然后跟葆耕说话。他忽然注视着我，似乎在问：“你是谁，干什么的？”葆耕笑了说：“迟主任，您不认识他吧，他就是罗征启。”迟群听了，仔细打量了我几番。点点头，似笑不笑地说：“你就是罗征启啊，听说你文章写得好。正好，我这里有两篇文章要写，我来看看你怎么样！第一篇是我在市里的一个发言，等会我叫胡宝清把这任务交给你。说完他就走了。”徐葆耕说：“我看迟群脸色很难看，你可小心。给他写东西很麻烦，改来改去不说，还得经常挨骂！原来宣传部这帮写手里面，他比较喜欢李北汉，可能因为出身贫下中农。但李北汉已调到教育部去了。他不喜欢你，还要用你，这样就有机会骂你！”

任务交下来了。（注：这是第一篇文章，第二篇就没有再提起过）题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还是右？》我还未动手，迟群又找我和胡宝清单独谈了一次。他说，“‘左’和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们有

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蒋南翔公然讲，‘批刘少奇我恨不起来，批林彪我就能恨起来’。在蒋南翔看来，刘少奇是右的，他自己也是右的，因此恨不起来，而林彪是‘左’的，因此就能恨起来了。你们把这段话写上，这很重要！”

从迟群房间里走出来，胡宝清说：“怎么样，心里有底吗？有这段话可能生动一点。”我说：“未必，我先查一查出处再说。”当天，我打电话给蒋南翔专案组的葛长华、王光伦，向他们查证。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说过，肯定没有！”

过两天后，我交了一份初稿。当然，我没有写上所谓的蒋南翔那句话。初稿先交给胡宝清看。他看了说：“他让你写的那句话，你就铁了心不肯写了？你就照写嘛，反正是他去发言，又不是你去发言。”“那让他自己加上就行了！”胡宝清摇摇头。一连四稿，都打回头，越来越短。胡宝清说：“他要问你，你就说我没看过这稿子。”

忽一日，接通知，宣传组，校刊，全体政治课教师十点钟到工字厅东厅开会。什么会？会议内容？主持人？却不知道。我早到，座位很空，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胡宝清也到了，他坐在我的左侧隔一个座位。陆续大家都到了。十点整，迟群披着个军大衣走进来。一屁股就坐在我和胡宝清之间的空位上，立刻宣布开会。原来是他召集的会议。他又站起来说：“今天开个会，主要跟你们谈谈宣传工作的。宣传组是管宣传的，校刊是管宣传的，政治课也是管宣传的，但是你们干的怎么样呢？叫你们写篇文章就这么难！”话锋一转，对着我来了！“你们看，这是号称清华第一号笔杆子的罗征启写的！”他抖一抖手中的稿子，并且念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 · · · ·什么、什么。你好大胆子，好大口气，你不就是给蒋南翔写过两篇稿子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清华大学是海淀区委领导下的！亲切关怀，正确领导，你吓唬谁呢！……”如果迟群他讲话有点水平，我倒要怕他几分，但他这几句的水平太低了，我不禁笑起来。平时他讲话不要人写稿，讲话还有点水平，而且不会很长，今天不知为何失了水准？他讲到这里，忽然说“散会”。又对胡宝清说：“你们回去研究一下。”说完他就走了。他出去后，我看看表，二十分钟。我再看看胡宝清，他没有任何表示。于是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安静地走出工字厅。只有原党史教研室主任贾观老师在走出工字厅时轻轻对我说：“你小子好大胆，他都气疯了，你还在那里笑，还摇头

晃脑满不在乎，他不就更生气了吗？！”我问他：“你说叫我怎样回他？”他说：“我今天可吓坏了，你看我心跳还快得很。”

我回到政治部，把稿子的开头按迟群的意思改为“在北京市海淀区委领导下……”我到胡宝清的办公室把稿子往桌子上一放，扭头就走。过了一会，胡宝清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要什么小孩子脾气！他气坏啦！”我说：“我也气坏了呢。你今天也看到了。这样高水平的领导，我服伺不了，算了！我不干了！”

胡宝清把我留在他办公室谈了好半天。他说：“你刚回来，好多情况你不知道。你们蒋南翔校长不是要求你们‘听话、出活’吗？蒋南翔的重点是要你‘出活’，而迟主任则要求的重点是听话，他最烦恼的是你们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他常说我好歹也念过几天书，虽然没上过大学，算个知识分子也可以啦。听说你们开始连刘冰也看不起，说刘冰是土包子，经过反右整了一下，你们就老实了。所以他说知识分子就得整，把我们压平了，棱角压平了，就老实了。你最晚回来，还有点棱角。他要‘杀鸡给猴看’，明白今天他的用意吗？你看今天参加会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理论家，笔杆子，都是你们的老部下。不听话怎么成？”

我听完了胡宝清的这番训斥，就说：“要不你亲自来抓这篇稿子？”他赶快摆手说：“别，别，别！我现在还可以暗地里帮你一把，给我留条路，其实也是给你自己留条路。你要我来抓，我们大家都无路可走了！”这话虽然不错，但是这个稿子怎么办？这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回到宣传组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宣传组的人和校刊编辑部的人都过来了，宣传组组长胡大昕也过来了。大家也都不讲话。不知谁先了腔：“组长大昕上吧！”大昕立即说：“不行，今天很明显，他要骂的是老罗，你给换了个人怎么行？”又有一位宣传组的成员说：“不就是那句话吗？给他写上不就完了吗？”校刊编辑组的任彦申说：“不行，将来这事是要查的，一查是老罗写上去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老罗是被迫写上的。‘自古欺君者死罪’！不能写。”胡大昕说：“我同意小任的看法，还有谁有什么想法？”还是任彦申说：“我建议这样：这句话写上，但不写蒋南翔说的，就写‘有人说’。将来如果查起来，这‘有人’是谁，我们大家一起作证，是迟群！”我说：“我十分感谢大家帮我出了好主意，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议论了。”这篇稿件终于通过了。改由谢静宜到市委去发言。她发言时，念到这一段：“有人说……”放下稿件，脱稿

而说：“这个人就是蒋南翔。”

据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纪委真的派人来清华查过。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任彦申。蒋南翔校长也专门向我查询此事，我如实地反映了情况。他说：“这个同志很聪明，既能够实事求是，又能够保护自己，不容易呀，这是一种智慧。”

经过这一役，我多少明白了一点，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从最高领导就是极左的，那下面基层就很难实事求是。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比如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说起谢静宜，认为她比较和蔼善良，我当年也曾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从她的教育背景、生活和工作环境来看，她只可能越走越“左”，越来越极端。极左路线掩盖了她的和蔼善良的一面！

我知道迟群是不会放过我的。果然，他动手了。

## 专业也成为迟群整人的手段

迟群来到清华，感到最烦恼的、最使他感到自卑的是，他没有专业。刚进校的时候还好，总的倾向是大学不要办了。反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世界，他进清华的任务不是办学，而是搞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整得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毛泽东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在清华刚搞完清理阶级队伍以后，迟群慌忙拿出“梁效”的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以下简称《创办》）的文章，想把毛泽东的极左的教育路线的一大漏洞堵上。结果他们没想到的是：蒋南翔、何东昌的办学思想和路线又抬头了。蒋南翔的“双肩挑”，一政治、业务两个肩膀一起挑，何东昌关于教育质量的许多看法都变成清华师生议论的热门题目。如何东昌说现在工农兵学员的质量不好，应该是基础打好专业知识才能好，现在是如烟筒上下一般粗。这话我们都是听他亲口讲的。清华派干部一般都认为何东昌是典型的“双肩挑”干部，比较了解学校的情况。而迟群对“专业”两个字就特别敏感，总感觉这两个字是针对他没有专业知识说的。而且他还发现，“专业”两个字的背后还浮出一个“清华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的”思想。而且他认为在这里“搞搞振”的，就是一批“双肩挑”的干部。因此他下手了。他发动了一个矛头针对何东昌的、历时三个月的反资本主义复辟或反回潮的运动。对清华师生，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了一个来势

凶猛的封口运动！

这一手，虽然也是一个损招，但是并不成功。因为大家已厌倦了搞运动整人。上上下下以提前封口来反制，真正挨整的，只何东昌一人。于是迟群又出一招：把这支双肩挑的队伍彻底打散。工字厅的一个不留，全部遣散。

林泰调基建办，又转调到人防办公室搞技术。我也调至人防办公室，属林泰指挥。他把我安排到水暖工种，跟着几位老师傅搞上、下水道，暖气安装等。我非常感谢林泰，因为这工作不重，危险性也不大，还能学到好多技术。当时地下食堂砖瓦工已经完成，只有水暖电工正在搞。电工对生手有一定危险，所以安排我在水暖工。经过地下食堂的水暖安装工程，我已经可以独立设计安装一个中等大小的建筑的水暖工程。

陈圣信、胡大昕安排回无线电系。我们有时见面，大家都很满意。虽然说是惩罚性的发配，但是回到专业岗位，远离政治，也是幸事。我暗自高兴，迟群这两招没有成功，反而给我们各送了一份礼。欢送我们离开了政治部。

虽然逃离了政治部，然而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迟群的视线。我们始终还是迟群心目中的一批“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

## 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迟群做最后的挣扎

连毛泽东都预感到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即将以失败告终了，何况迟群，这个8341部队的一个宣传科长吧！制止了武斗，恢复了上课，使清华师生振奋了一下。然而，清理阶级队伍和所谓的“教育革命”，却使师生大失所望。迟群又急忙搬出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的典型，但是都不奏效。批了何东昌，教育质量却越来越差。毛主席的这“两个兵”，越来越暴躁，已到了失控的地步。迟群最恨“双肩挑”干部。据说他已开始策划要像考教授一样考倒他们。前一批“双肩挑”干部下放到基层，反映还不错。迟群就很不高兴。他曾经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弄不动这批人。”但是基层是要用人的。所以，胡大昕、陈圣信等人很快就成为技术骨干了。

我在人防工地将地下食堂的水暖工程安装完毕以后，学校决定要上一个地下粮库。林泰当时已是人防工地的高层管理人员。他找我谈，问我能不能承担建筑设计和工程技术工作。我一口答应下来。很快从系里调来几

个人，每个专业只一个人，校对、审图都是互审、互校。我不但完成了设计任务，同时还研究了防水、防潮、防冻等技术，学了不少东西。

我调离工字厅到人防办公室工作这段时间里，工字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以刘冰和工宣队柳一安、卫戍区惠宪钧、防化兵吕方正为首的四个高层领导干部，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信到毛泽东手里，他批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样引发了一个揭发批判刘冰等人的政治运动。政治部通过人防办公室通知我和林泰回政治部开批判会。林泰工地有事没出席，我出席但未发言。却暗自庆幸有机会离开政治部这个大陷阱。在毛主席有批示以前，校内已有些传言，听说有人告状，有些人就想参加联署签名支持。但这个莫名其妙的批示下达以后，许多人又是一个大失所望。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引爆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由于迟群、谢静宜在清明节时期下令不准悼念，不准上天安门广场，不准送花圈等等，清华的工农兵学员愤怒地抬着自制的花圈在校园内游行，把抗议的大字报贴到迟群办公室的门上。迟群马上发动又一场整人的运动，除去少数工农兵学员如土建系的张家林，电子系的周为民等成为整肃对象以外，他又推出以教职工为主的一批人来，如附中附小的何惠莲老师等。又因为何惠莲老师和文学宓只一墙之隔，直线距离很短，常有往来，所以开列了十来人的一个大名单，认为是个反动的裴多菲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的领袖当然就是何、文两人。工字厅内有人通知我，内定我也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因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人防工地工作或劳动，很少参加活动，他们掌握的证据不够。所以“内定”我的“级别”和文学宓一样，但处理上有点区别。

我立即约了文学宓到饶慰慈家商议对策。他们也都听到了风声。我们都认为应该勇敢面对。文学宓说：“蒯大富的罗文李饶专案都熬过来了，这次就不会害怕了。”

我认为有三条原则一定要守住：第一，勇敢乐观对待，决不自己伤害自己，也不伤害自己的同志。即便是与我们素有嫌隙的人也不要伤害。第二，大部分工宣队师傅和军宣队军代表都是好人，虽然有时表现“左”了，也是受了“左”的影响。“7.27”当时的表现，是真情的表露，我们永远都要感谢他们。现在无论他们如何表现，我们都不可伤害他们，以免有人利用他们的不慎重去挑拨是非，去伤害他们。第三，尽量抓紧机会锻炼身

体。

文学宓又加上一条：注意教育好子女，小心不要讲错话。他又说，“我真希望他们早点动手。”我说：“这就像我们周围的丛林里有人拿枪或弓箭瞄准你，子弹或箭没有射出来，但随时可以射出来，你总得小心。如果射出来，却没有射中，这就放心了。”文学宓又说：“我估计这一次他们是先从我和何老师处动手，但你们也得小心。”

我在清明节后的第三天中午，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一趟。来回不到三小时。广场上的情况真是感人。我当时想，能参加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当中总算是不虚此行了，即便这次出了问题被捉住，也横下一条心，不承认，反正我上班时间都在办公室。

清明节之后，迟群们就动手了。首先是全校动员大会，迟群在会上杀气腾腾点了几个人的名，会后立即隔离审查！我以为他要点我的名哩！等了半天，没有！

当晚，接到土建系总支的通知，明天到土建系党委办公室报到。我作好思想准备——可能是又一次隔离审查。

#### 第四次隔离审查——这次是“日托”不是“全托”

次日早晨，我依通到土建系党委办公室报到，又转到学生宿舍一号楼报到。两位工宣队师傅和我谈话。他们开门见山说：“罗征启，有啥问题快交代，咱们别浪费时间。交代完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跟我们玩小聪明，玩小聪明我们可玩不过你。‘1029’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是你写的吧？”我吓了一跳，赶快说：“不是不是，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报告呢，而且这文章见报的时候，我还没‘解放’，更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呢！”他们马上转了话题：“跟你讲一下，这次你回到土建系来接受审查和教育，现在给你宣布几条规定和纪律。”说着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一片字。我说：“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记一下？”工宣队师傅说：“别记，也没什么好记的！”

这规定和纪律大致是：

- 1、你的监管由暖通专业党支部和学生负责，支部书记是吴佩昱。下面则指派两位学生负责。班上有学习和批判活动，你就跟学生一起活动，没有活动你就在暖通生产实验室劳动。晚上学生有什么活动你也参加，除非他们通知你不必参加他们的活动。你没有活动时，无论白天、晚上，都

到暖通实验室自己学习。暖通实验室归教研组管，暖通教研组的负责人是吴增菲老师。

2、一般情况下不准离校。如有特殊情况，离校必须向吴增菲老师或监管的学生请假。

3、一般情况下，未经吴增菲老师或监管的学生同意，不得参加校内外任何活动，不得与校内外的任何人联系。

宣布完了，就问我有没有意见和问题。我说：“没有，但我原来负责人防工程的设计工作，走时并没有交代。如果工地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和我联系？”那位师傅似乎是有准备的，马上回答说：“你不必管，他们有问题叫他们来找系里，找我们。你别管。”

就这样，开始了我在文化革命中的第四次被隔离审查。这次审查，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次，也是最“无厘头”的一次。前几次，好歹也拿出一两条罪名来，这次，从头到尾，没有拿出一条罪证。这次审查，白天非法限制自由，晚上可以回家睡觉。因此，我们戏称之为“日托”，非“全托”也。

## 迟群的覆灭

这次“审查”完全是没有一丝一毫道理的，是完全非法的。但根据我们几个人商议的意见，我坚持给他们一个平和的态度，不急不怒。这样真难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宣队员了。

我的专案组由一个工宣队员和两位老师组成。整了几个月，整不出任何像样的东西。迟群倒台之后，系党委副书记刘小石在党委会上问：“到底你们整出点什么东西了？”一位专案组成员说：“很难。要他们自己承认，还有举报人和证明人。三头对证才能落实。”刘小石问：“那罗征启的案子你们有没有落实什么？”答：“只一条：文学宓揭发一件事，罗征启也承认了。梁鸿文在场旁证也有了。”刘小石再问：“那是什么事？”“在罗征启家，罗征启对文学宓讲怎样做广东叉烧肉！”引起哄堂大笑。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

10月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我家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两个清华的学生印甫盛、万润南。他们脸色凝重、却又暗含微笑。我问：“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本身都是很红的家庭出身，尤其是万润南，

先和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结婚，离婚后又与李昌的女儿结婚。他们在这么紧张的政治气氛里来看我准是有什么事。而且看他们的脸色，一定是好事。

果然，他们带来了四人帮倒台的大好消息。同时，迟群、谢静宜也被捕了。

天亮了，中国有希望了！

第二天，我如常一样到暖通班同学那里。同学们还没有动静，似乎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下午，刘小石到学生宿舍来看望，我估计他肯定是知道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了，因为他的爱人是外交部系统的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刘小石在找机会向我通报这个大好消息。但是很多学生在场，找不到机会。接着到了周末，我把这消息送到尽可能多的朋友那里，大家都很兴奋，也有个别人听了很高兴但又害怕是谣言。

又过几天，确实天亮了。我和文学宓，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四人帮倒台的全市大会上见面了。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真正笑逐颜开了！

## “假四清”目标是我 却殃及黄报青先生

如果问我，到底有没有“假四清”这回事？我会回答：有所谓的“假四清”，但没有当时大字报所揭露、批判的“假四清”。

我在《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一记一九六六年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写过：“一九六五年”政治形势日益严峻。……艾知生召集宣传部、政治课的一批干部研究校内的思想倾向，又传达蒋南翔的意见：清华是理工科大学，意识形态上不如北大活跃，问题也不会那么多。但是建筑系是最敏感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问题。与其将来让人来查，不如自己先查，有问题自己先解决。决定由我带宣传部、政治课几个人进建筑系，不要说“四清”，也不叫工作组，看看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假四清”。但是从来没叫过“四清”，也没有叫过“工作组”。说有，又没有；说没有，又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这个当事人真是很难做。在批判会上，或者在审讯我回答问题时，常常不能自圆其说。

大约一九六五年底，艾知生在甲所会议室又召开一个会，参加会议的人宣传部有我和李兆汉，建筑系有刘小石、李德耀（这两个人是建筑系党总支的领导），黄报青（是系秘书，总支委员）。还有几个人我已记不清了。艾知生首先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北大“四清”情况有点乱，主要是干部思想较乱。有的乱揭乱批，也有顶牛的。我们（清华）一向比较稳定，但也要有所准备。个别不稳定的单位也有，如建筑系、校医院和体育教研组。后两个单位似乎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建筑系是南翔同志比较担心的单位。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顶”，不承认有问题。这里要提一下黄报青同志，不要像批大屋顶时那样“顶”。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沉默一会再说。再一方面会不会有乱揭乱批的现象。这两方面都不好，都会搞乱。所以党委意见先派罗征启带几个人去建筑系观察一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自己先主动改，比将来人家来揭批要好。罗征启注意，不要叫“四清”，也不是派工作组，以免下面紧张。带什么人你自己在宣传部挑选吧。艾知生又征询刘小石的意见，刘小石说：“这样安排很好，

我没有意见。给多长的时间呢？三个月行不行？”艾知生说：“三个月太长，一个月吧，新年前汇报……”

会后，刘小石又单独和我谈了一次。刘小石是建筑系的领导，非常平易近人，实事求是。记得我一年级入学时经常看见他很晚才去饭堂吃饭，我问他：“你们工作怎么那么忙哪？”他笑一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叫什么，你是不是青年团员？”我说：“我不是团员。”他笑了笑，挺亲切的。不像有一位美术课教授，入学时代表系里和我们个别谈话，问我是不是团员时，我回答不是，他睁大眼睛说：“哦！你不是团员！不是团员！”然后在小本上记下什么。我和同学都非常讨厌这种作派。刘小石就比较平和。我毕业以后，他找过我谈话，叫我做学生工作。但是我们对高年级同学都有一钟敬畏的心情。记得一次听莫宗江教授讲写仿宋字，莫先生叼着一根香烟边讲边吞云吐雾。突然，一位高年级同学走进来，径直走到莫先生跟前，伸手从莫先生嘴里把烟拿下，对嘴点了自己的烟，又把莫先生的烟塞回莫先生的嘴里，扭头走了。这人，就是刘小石。据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他出面保了我，免去因建五班会问题把我打成右派的厄运。我离开建筑系，调往校党委、团委工作后，一直还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把他当作老大哥一样尊敬他。

刘小石对我说：“党委要你来做调查，我以为非常合适。你比较了解情况，处事又比较稳健，不会胡揭乱批。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怎样帮助你？”我说：“工作上我暂时还想象不出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把黄报青先生放在这么个位置上来考量。我认为他很好，很实事求是。他是我毕业设计的导师，人很好，又有才华。是不是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刘小石解释道：“你当时在念书，情况不了解。在批梁思成先生复古主义时，报青不同意，一直顶。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市委常务副书记）和中央好几位领导同志都做他的工作，他就是不同意，一直顶到底，到最后都很勉强。党委担心，将来有工作组下来调查，有个什么不适合，他又死顶，那就麻烦了。”我说：“我估计不会的，我会尽可能和他交换意见的。”听了刘小石这番话，我对黄报青先生又增多了几分敬意。

我和李兆汉分工，我去听梁思成先生给建7、建8讲的《中国建筑史》，另外还查阅建筑系这几年的会议记录，特别留意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还有研究最近几年校党委及建筑系党委接到的举报教师讲课中的一些问题。李兆汉主要检查陈志华老师的《西方建筑史》和吴焕加老师的《西

方近现代建筑》这两门课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举报。但是这时，已跟五十年代批复古主义时已有很大不同了，是进步很多了。纯学术问题，一般不干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就要认真分析，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一个星期以后，李兆汉报告说，他检查的基本上都排除了，没有问题。只剩下陈志华的《西方建筑史》埃及修金字塔这一段话，有些人举报说，很像是指桑骂槐，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大意是：埃及这些奴隶为皇帝修金字塔，每天只有一点点啤酒，却在烈日下干很重的活，他们是饥肠辘辘的……

我说，这一段很典型，我们来破解一下：这段话如果基本上是抄的或者是翻译过来的，那就没问题。但如果是自己造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但是怎么能查呢！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异口同声说“找桂生”。

桂生是刘桂生，是学历史的，这时在党史教研组，博览群书，攻于考证。我们在同一饭厅吃饭的时候，常常有人半开玩笑的问：“桂生，筷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说：“唔！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第二天，他就在饭桌上侃侃而谈：筷子是何时在何处开始出现，为什么叫筷子……于是又有人问：“桂生，这饺子在中国是何时何地开始的？”桂生又说：“唔！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查到。”再过一天，他又来讲饺子……

我请他来以后，讲了我们的困扰。我说：我很想查到这几句话的出处，否则这一类的课程很难讲，谁敢讲呢？动不动就是攻击。他说：“我明白，我试一试吧，但是这一次可比较难，我可没把握，时间也说不准。”我说：我当然理解，查不到也谢谢你。

大约十天以后，他来了，抱着一大本厚书，书名：《古代东方史》，我估计有上千页。他翻到其中一页读给我听，除了“法老”换成“皇帝”以外，一个字也没改。我们如释重负，特别感谢刘桂生。

就这样，我向党委汇报了。艾知生听了，微笑地说：“你的意思是，梁思成先生和这几位先生的课，不但都没有问题，而且讲得很好，应予表扬，他们的教材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呀！”

我说：“是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精了，他们说话，写教材、文章，都有出处，抓不住小辫子了。”艾知生自言自语的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他抬起头来对我说：“等我向党委汇报以后，定下来要不要写个书面报告，再通知你。”此后，再没有通知我。后

来批判“假四清”时花了很大力量来追问我，要我交出书面报告。我再三解释，还是不肯罢休。直到后来工宣队也追问过此事，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因为本来，这就是一桩荒唐无厘头的公案。

但是，整个一九六七年，在蒯大富掌握清华大权以后，这份混账被炒得很热很热。直到主要人物之一黄报青跳楼身亡，才慢慢冷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黄报青先生已被打得身心严重受伤，吐血、尿血，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下半年时，我听说他第二次从精神病院回家了，每天在家写字。他毛笔字写的极好，尤其精于魏碑。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找他想向他学写魏碑。他想了想说：“可以，你要拿出500小时，而且不能中断，你行不行？”我说：“那我还要过一段时间。”他说：“你准备好再来找我吧，字帖我有，笔墨纸砚你自备。纸好办，就用普通旧报纸就行。”说这些话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他已经沉默不语了。我很想去他家看看他，但似乎这个师生关系不是很方便。

有一天，建筑系的一些“革命群众”叫我到建筑系问话，还是关于“假四清”的问题，当然也提及黄报青了。但是这些问题对我都是毫无兴趣和毫无刺激作用了。快到中午我离开建筑系，骑车经工字厅门前回家，正巧黄报青先生也骑车走这条路。我很高兴问道：“黄先生，您身体怎样？”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说：“还好。”我说他们又问我“假四清”的事了，他说：“啊！他们也问我了，我已经没东西可说了。”我说我也是。他嘟囔了一句：“这到什么时候算完呀！”

听说，如果不叫他，他就在家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一篇一篇地写毛主席诗词。

年底，蒯大富为贯彻江青讲话精神，又要召开大会，批判罗征启在建筑系搞“假四清”、包庇黄报青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喇叭狂叫：“罗征启必须到大礼堂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叫万润南问一下414总部，我是否应召出席？总部说千万不要去，并叫几个人陪我在科学馆二楼一个房间里听会。

火炉里无烟煤烧得很旺，大喇叭叽里呱啦吵个不停，我们根本听不进去，说说笑笑。忽然，建筑系的老师冯钟平（建0毕业生）推门进来说：“罗先生，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里，我来告诉你，黄报青先生跳楼了。”……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低头默哀几分钟。我穿上棉衣，准备去看看。冯钟平等人问我：“罗先生，你上哪儿？”我说：“黄先生是我

导师，我要去看看，向遗体告别致意。”大家说：“你不能去，不能去。”冯钟平说：“我替你去吧。你们都别动，我去一下，半小时左右回来。”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说是他（黄报青先生）住在五楼，今晚他在北屋写字，听到大礼堂方向大喇叭狂叫：“罗征启，黄报青搞假四清……”他开了北窗就跳下去了。我去看时，已经用草席盖上了，我替大家向他的遗体鞠了躬致了敬。

那晚上，我一句话没再说。

那晚上，印甫盛、万润南护送我到人民大学教工宿舍我姐夫家里。

那晚上，我一直坐到天亮，没有睡觉。

我一直在想，这么好的一位老师，一位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就这样走了。我一直不愿意听见别人说他有精神病。他绝对不是精神病。打他的人才是精神病，残害他的人才是精神病。黄报青先生只是在这从领袖到平民、从战士到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迷乱了、都疯狂了的情况下，迷失了自己。他很快会清醒过来的。因为他没有错，没有害人，没有搞阴谋阳谋。

我相信，黄报青先生现在一定在天堂——如果有天堂的话——和梁思成先生、汪坦先生、周卜颐先生、程应铨先生、刘永娴先生一起，谈笑研究北京市的规划哩！而那些残害他的人，迟早会得到报应的！

## 缅怀黄报青先生

我们建五班同学都很熟悉黄报青先生。他是位德高望重、业务精深、才华横溢的老师。我们班设计图的标题，多是他的魏碑双沟，而且不用打格起稿。大家都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不肯向极左势力妥协，结果屡遭迫害，终于含冤而去，但是详细情况却不甚了了。我在学习期间曾任班长和系学习委员，和系秘书黄报青先生打交道比较多。黄先生和关肇邨先生同住一宿舍，我常到那里去。黄先生又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毕业后，我留校教学和做学生工作，黄先生也一直指导和配合我的工作。

文革大动乱开始以后，戴高帽、游街、批斗干部老师是平常事。但是黄报青先生就不平常了。在批斗时，黄先生坚持蒋南翔是好领导干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喊“打倒黄报青”可以，喊“打倒蒋南翔”坚决不行。他找出许多报刊资料，说明中央一直肯定蒋南翔是好的领导干部，怎能一夜之间要打倒？一次再次，他宁愿挨打至尿血，被赶到小河中，但绝不妥协。1966年9月在东大操场“劳改”时，大家蹲在地上拔草，刘小石（系党总书记）悄悄对我说：“报青被打得不行了，你和他比较好，跟他说说，叫他别顶了。”我慢慢移动到黄先生身边，对他说：“黄先生，您不要顶了，中央的意图我们也搞不清楚，硬顶没用，保护身体要紧。”他说：“要打倒我可以。我现在要拔草、劳改，都可以。但是要我说打倒蒋南翔，打倒共产党，这不可以。”我说：“你可以不说。”他说：“不是我要说，是他们逼我说，我又不能说假话。”我又说：“不是要你说假话，但你可以沉默。”他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些话不能不说。”这样，他被反复批斗、用刑，导致精神崩溃，两次送进安定医院。出院后，他沉默不语，每天不停地抄写毛主席诗词。

1967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科学馆里听着大礼堂里“缺席批斗罗征启”的大会广播，指我受党委指使到建筑系搞“假四清”，千方百计保护黄报青。广播里不断点我的名，有时也点到黄报青。忽然一位建筑系的学生进来说：“黄报青先生跳楼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我起身想去现

场看看，与老师告别。周围学生不让我去。建筑系的冯钟平说：“我去看看。”半个多小时后，他回来说：“黄先生一直在家里写字，不言不语。今晚校内大喇叭又说‘假四清’，批判罗征启、黄报青，他听了就从五楼跳出窗外……”

粉碎“四人帮”后，刘达出任党委书记、校长，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我又被调回工字厅工作。我给刘达写个报告，提出现在还有人认为黄报青、刘承娴是“叛党”、“自绝于人民”，至少文革中这一流毒没有肃清，我心里很难过。像黄报青先生这样坚定、正直、有骨气的共产党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刘达马上批示，要郑重开追悼会，为黄、刘两位老师昭雪，嘱我向南翔同志报告并请南翔同志到会。我到科委见南翔同志，他说：“好，我一定参加。黄报青是个好同志，值得我们学习。我知道他不肯喊‘打倒蒋南翔’，其实不必，我自己也喊过，小平同志也承认过自己是走资派嘛！追悼会后，请你陪他的夫人来我这里，我想见见她。”

追悼会开了。悼词是我写的，内容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但我记得我是动了感情的。南翔校长也来了，许多人都哭了。我想，报青先生忠魂有知，当会略感宽恕吧。

事过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想，发动这场大动乱的罪过且先不提，那些动手打黄报青先生，用刑逼供、迫害、侮辱报青先生，导致他精神崩溃，以致跳楼的人，到现在却不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现在不会追究责任了，但我相信，良心——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会谴责你们一辈子的。

## 追 思

文革之前，清华的政工干部都知道，水利系的政工干部有“三宝”，即陈宝玉、谢宝栋、徐葆耕。陈宝玉现在的去向，我不知道，似乎早已离开了清华。谢宝栋在文革动乱结束后就恢复了工作。在胡启立主持的一次研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会议上，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因心脏病发作，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前些日子，清华传来噩耗，葆耕也离我们去了！

读着他给亲朋好友留下的那封信，不禁悲叹感慨，思绪万千……

他的信，是他坎坷屈辱的一生的写照！

他的信，你看不见抱怨和仇恨。即使是对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人，也没有半句不好听的话。这与我们平日和他相处时的印象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曾经关心、帮助过他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一定不会忘记，而且必当“涌泉相报”。

他的信，对我有很多溢美之词。

其实，作为当时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一，我常常为自己在人人自危、荒诞混乱的日子里，只顾自己的安危，没有很好地关心和帮助葆耕，没有在他受到委屈时给予安慰而感到羞愧。与其说我帮助过他，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他帮助过我。

1960年开始，我从校团委调到党委宣传部，分管校刊、对外宣传和写作，以及学生的文艺阅读等工作。我这个人，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读文学书少，对文艺创作根本不熟悉，干这个工作自知是不适当的。而葆耕在这方面比我强多了。我曾跟宣传部的顶头上司艾知生谈过，我问道：“为什么不把葆耕调来搞这个工作？我不行。”艾知生说：“我当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我行吗？也不行，只好边干边学。你说徐葆耕行，我也听说过，你可以向他学习，将来可以将他吸收到你这条线上来工作嘛！”于是，我曾经两次与葆耕长谈，听取他的意见，得益匪浅。在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他的喜好在于文艺创作，而不是政治理论写作、宣传稿件的写作，更

不是教政治理论课。而当时学生文艺社团的文艺创作，政治性太强，我认为把他调过来也是浪费人才，所以我一直没有再提此事。但是对于一个文艺工作干部，应该读哪些书，应该注意具备哪些修养，我从葆耕那里吸收了许多养分，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文革动乱时期，我和他没有联系。我印象中葆耕和其他几个“写手”一样（如李兆汉、钱逊、张正权、任彦申等）都被留在校本部，没有去鲤鱼洲劳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1973年我回到政治部宣传组工作的时候。

我离开工字厅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在政治部宣传组该干什么，怎么干。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到校刊编辑室，看见葆耕独自埋头工作。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写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正在这时，迟群推门进来。他盯住我看了一眼，又转向葆耕。迟群应该知道我，但可能不认识。我只是1968年9月从广东“潜回”北京那天，由工宣队把我接回学校，先送去新水利馆一个房间，见了迟群、谢静宜一下。他们不会记得的。

葆耕见迟群一脸疑虑，就笑问：“迟主任，你认识这个人吗？”

迟群再看我一眼说：“不认识。”

葆耕说：“他就是罗征启呀！”

迟群睁大了眼睛说：“罗征启！”

又转过头，眼光对着我从头扫到脚，又从脚扫到头，好像我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怪物一样。

“你就是罗征启？”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然后，他说：“你就是蒋南翔的第一号笔杆子？”

我说：“不是，其实好多人写东西比我好，葆耕就比我好。”

“那好，我出两个题目，你写两篇文章我看看。第一篇：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还是‘右’？是应该反‘右’防‘左’，还是反‘左’防‘右’？给你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这篇，再写第二篇。”

他又对葆耕说：“他刚回来，你们是老同事了，帮他一下嘛！”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就走了。

迟群走后，葆耕对我说：“不好，他盯上你了，他在考察你。迟群是非常阴险的人。谢静宜水平不高但是人好一些。你快找李兆汉商量一下，他了解许多情况，主要是他们认为你是414中极右势力的代表。‘7·27’工宣队进校时414马上拆工事缴枪，逃过了这一劫。其实，真正否定文化

大革命的是414，可是没抓住把柄！”

我问过李兆汉，他说：“的确如此。迟、谢认为清华有一个拥护蒋南翔的‘地下复仇军’，有一个营，你是政委！”

我问他们：“那我该怎么办？”

李兆汉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趋吉避凶。”

葆耕却说：“现在的形势，有大凶、小凶，无大吉。我觉得只能趋小吉，避大凶，甚至趋小凶避大凶。”

他们的忠告，尤其是葆耕的忠告，在我后来经历的那段险恶环境里，能生存下来，起了很大启迪作用。

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又失去了自由。这时我听说葆耕被调去创作一部名为《反击》的电影，真为他们捏把汗。钱逊被调去“梁效”写作组，因为在批判他的老子钱穆时，他发不出言，最后被梁效开除，送回学校，反倒平安无事了。葆耕就没有那么幸运。

粉碎“四人帮”后，我奉命重组清华党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在宣传部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过去老宣传部的同事，互相都了解。在对葆耕考查时，大家一致认为：葆耕在迟群、谢静宜当政时期，受命写过一些东西，但是他第一没有害人，第二也没有害自己，他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应该让他放下包袱，做一些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后来的岁月，虽然在他一生中只占了少部分，但是他真正干了一些他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写了一些他自己想写的东西，如他主编的电影《邻居》……

大约是1994年末，我忽然接到清华中文系打来的电话，大意是说1995年是中文系成立十周年，葆耕请我去参加系庆活动。我感到很奇怪，我和中文系没什么关系，为何请我参加？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打电话问葆耕。他爽朗地笑称：“建议恢复中文系的报告是你亲笔写的，刘达校长批准的。这是我系复建的第一份历史文件，你说你应不应该来？”后来，我有事没能成行，但我十分感动。我想了好久：这就是徐葆耕！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葆耕，你安心地走吧！我们大家会永远怀念你的！

## 刑满出狱，现身深圳

1988年初夏，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在深圳大学演会中心的工地上，和几位技术人员一起，讨论处理工程进度和一些细节技术问题。

我们很投入、很专注地边走边议。深圳初夏的天气已有点热了，没多大一会，我们的额头上都挂着汗珠了。这时，我隐约感到后面有个人跟着我，盯着我。

我有过多次这种体验：有时会感到有人在注视着我，结果证实是真的。有时心里忽然闪过多年不见的同学或朋友的身影，过一会他会来电话或者干脆就出现在我面前。我相信目光或者意识都是一种有能量的信息波，是可以被一些敏感的人接收到的。如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一定有另外一些接受信息的渠道，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可以感知不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信息的。

这时，我感到跟着我的这个人走上来，从后面靠近我。和我一起讨论工作的几个人的目光也显示，我后面有人走上来了。

“罗老师！”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汉子在叫我，听声音虽然有点熟，但我并不认识他。于是我没有理会他，很快转过头继续和大家讨论工程上的问题。但是，我的注意力已经有相当部分在快速地搜索和处理记忆中与身后的这个中年汉子有关的信息了。他是什么人？我认识他吗？

“罗老师，你认识我吗？”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立刻干脆利落地回答“不认识！”

“罗老师，我是蒯大富<sup>(注1)</sup>！”他执着地说。

这时，我猛然一下就认出了这个文革中的著名人物，用文革时的语言说，这个“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人物。我注视着他几秒钟。文革中是他把清华搞得乌烟瘴气，又是他莫名其妙地把矛头对着我，搞了一个“罗、文、李、饶反革集团<sup>(注2)</sup>”，害得我们几个人留下满身残疾伤痛，害得我家破人亡，害得刘承娴同志<sup>(注3)</sup>伤重含冤而去……虽然多年不见了，但我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个家伙的。只是，他变样了……

现在，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了，面对着面，一瞬间所有的夙仇旧恨，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我有点不知所措。

短暂的沉默后，我哼了两声：“什么时候出来的？你怎么这么胖！”我说话本来声音就小，中气不足，现在就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了。

但是蒯大富听出来了，他说“我已经刑满出狱。多年来无所事事，自然就胖了。罗老师，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想……”。

我打断他的话：“你不看我正忙着吗？等我忙完了吧，你等一下。”

一抬头，我正好看见不远处王天平老师在跟人说话，文革时他是清华机械系的教师，是支持反蒯大富的414派的。我喊他过来：“王天平，你看这是谁？认识吗？”

王天平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认识。”

我说：“老蒯呀，蒯大富！”

王老师这才认出来，皱着眉头说：“你这个家伙胖得不像话了！”后面又扯了什么，我也没听见。我干我的事去了。

等我忙完了工程上的事，招呼老蒯到我的办公室，这才发现，他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原本听闻，他出狱以后竟有六十多位年轻的女士写信给他，表示愿结良缘，结果他选了这位，北大毕业的，还读了研究生，刚结婚不久。这位应当就是他新婚的夫人了。

坐定之后，老蒯把他年轻的夫人介绍给我，我认真地问她：“你嫁给他不害怕吗？”

她认真地微笑着答道：“有点！开始还没什么，后来听的多了，了解的多了，越来越害怕！”

十多年后，有一次蒯大富的女儿告诉我：“我爸怕我妈，他打不过我妈。别看他这么大块头，我妈轻松就能把他撂倒。我妈是散打冠军。”我问过蒯大富这是不是真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真的。”

蒯大富一本正经地说：“罗老师，我今天特地来向您请罪。文革中我做了很多错事，犯了罪，危害了学校，也伤害了许多同学和老师。尤其是对您。我知道这不是说几声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但是，我总得面对。在法庭审判我的那天，我知道您一定在场……”

我插话说：“我是在场。”

老蒯停了一下，继续说：“但您没有发言，其实您最有资格发言，控诉我，但您没有。”

我说：“讲到‘资格’，我觉得清华任何一位老师和同学都有资格控诉这场大混乱和控诉你！”我嘴里说着，心里却在想：一位红卫兵领袖，坐了牢，出来以后，带着新婚的夫人，来当面承认错误，这不容易啊！当年大批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领袖们，又有多少能像蒯大富这样，能面对自己的错误呢？他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我们大多数的受害人也不会再追究了，他可以不来找我认错的。我知道，文革大混乱中，那么多的无头命案，还没有处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难道都是江清亲自动手杀害的吗？几十年了，又有谁出来认错呢？

“是，是！您说的对。”

我接下去又说：“你当时在审判会上还抢着讲话，说什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不认为你这话是错的，我只觉得你那个钦定的‘红卫兵领袖’的架子还没有放下。你以为你是谁？在那个场合，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当时你虽然身在法庭接受审判，可自我感觉还是个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小将，可以为所欲为，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最多也就是小将犯错误，怕

啥！”

“是、是，是、是。”老蒯苦笑着。房间里沉静了几秒钟，大家都在思索。接着，老蒯又说：“我出来以后，又听说您把孙耘<sup>(注4)</sup>放了，还鼓励他们夫妻上研究生，我们真感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感到清华的派性消除得很快，团、四<sup>(注5)</sup>之间现已没有什么隔阂了，这都和您的宽宏大度的引导有关吧。”

我不大认可他的看法。可能他被关得久了，不大了解情况了。我和两派的师生都有许多接触。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清华两派之间已经动用了长矛、步枪、手榴弹、炸药，甚至土坦克、穿甲弹和有毒的弓箭，怨仇怎样才能化解？但是我们发现，清华师生政治上是非常敏锐的，也是很动脑筋的。虽然两派都叫井冈山，两派都“誓死捍卫”同一个领袖和同一个路线，然而早在1967年，就有人把两派的分歧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是红线主导，应该充分肯定，还是黑线主导，应该彻底否定？另一个是十七年的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应该彻底砸烂？固然彻底砸烂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是蒯大富们提出的，许多坏事是蒯大富干的，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蒯大富能成为目空一切、大胆妄为的红卫兵的领袖吗？而中央文革难道就是罪恶的源头了吗？蒯大富也好，中央文革也好，他们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发动起这场荒唐的“大革命”。想到这些，就不会再纠缠在两派的矛盾和怨仇里了。

就我所知，414派的不少人，1967年上半年开始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最著名的是414的头头沈为槐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什么严重错误》（指干部队伍），另一篇是《什么彻底砸烂》。还有周泉纓的《414思潮必胜》，都把这两个分歧挑明了。而且已经比较公开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了。团派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当时也不能交流讨论，但我肯定团派中一定也有不少人有这种思考。据我所知，有些同学虽然支持蒯大富，然而也反对“彻底砸烂”。有人支持“彻底砸烂”，仅仅是因为“虽然毛主席没有说，但他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地地道道的‘彻底砸烂运动’，连刘少奇都砸烂了，还不是

彻底砸烂吗？”

这时，蒯大富又开启了另一个话题：

“罗老师，我出狱以后，好多同学，两派都有，支援我一笔经费，让我有机会周游全国，受点教育。这个活动，现在已近尾声了。我深感改革开放的形势，全国来说广东最好；广东来说，深圳最好；到深圳一看，是你这里深圳大学最好！……”这家伙，本性难移，原形又现，活像他当年在清华大礼堂上胡说八道一样。

我觉得好笑，立即叫停：“得了！你可别说你想来深圳，来深大，不可能。你虽然已刑满释放，但你可比‘三种人’<sup>(注6)</sup>厉害多了。‘三种人’都不能进深圳，何况你蒯大富？！我看你现在还不甘寂寞，不肯善罢甘休。你最好找个小点的城市，找个技术工作，悄悄地赚点钱，让大家把你忘了。千万不要再掺和政治了。”

“是、是、是。”蒯大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不搞政治了，我想赚点钱，搞经济。我看好多同学都想设法赚钱，这个方向对头。”

这次会面，总起来讲，大家总算是心平气和的。我对自己还比较满意——我可以平静地接待老蒯，平和地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甚至恐怖的事情，就像见到多年不见的学生、老师、同学和朋友一样。如果是二十年前——1968年，这是不能想象的。

当年，大家像是有深仇大恨的死对头一样。那时，我和许多师生一样，一想起清华园里一个个冤死的老师、同学，想起7.27<sup>(注7)</sup>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倒在血泊之中，想起被迫害冤死的黄报青<sup>(注8)</sup>、刘承娴老师，想起当年代替我枉送性命的胞弟<sup>(注9)</sup>，想起莫须有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我总是怒火中烧。我知道蒯大富肯定要自食其果的。那时我想，以后见到他的时候，我虽不会抄起一把铁锹冲上去砍他，但至少也会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十恶不赦的混蛋！”还要加上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时间是医治一切创痛的良药。慢慢地，一切都归于平静和理智

了。这才有了眼前的“仇人相会”的一幕。但是，小有遗憾的是，蒯大富当面认错，我却没能讲一句鼓励的话。我讲不出口。一方面，我没有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再看看。”我对自己说。

1977年刘达同志任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胡启立任副书记，组织“大批判”，要我代表“罗文李饶”控诉蒯大富，把蒯挂在四人帮线上来批。我和文、饶等同志商量：矛头要向上，向四人帮，不要向下，不要向团派群众；只点名一个人即蒯大富，而且只点一次。

1980年开庭审判蒯大富时，坐在听众席上，我已经又平静了许多。我想，这小子还很神气，他自我感觉还是个红卫兵领袖。他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个受害者。如果背后没有人支持，像个木偶似的，上面有人牵着线、指挥着跳舞，他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清华园搞得乌天黑地，瘴雨蛮烟？

但是，我决定保持安静，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我自己不也同样是被人牵着线的木偶吗？相对来讲，我现在比蒯大富们自由一些，但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当木偶太累了。我很想隐没台下，当个观众，看看这场戏还会如何发展，如何了结？然而，在当今这个社会里，有谁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学习和工作，又有谁能始终安坐台下只当观众呢？

此后，由于89年的“事件”，我有几年没有主动和外界联系，也有几年没有回北京，不大了解蒯大富的情况。但是，清华文革中两派的头面人物常常有人来深圳探望我。414派的自不必说，团派除了蒯大富之外，鲍长康、马小庄、吴炜煜、段永基、李康群<sup>(注10)</sup>等头头都造访过我家。我们不再谈文革中的事了。不必再“认错”了。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已不重要。

其中，最值得记下一笔的是鲍长康。文革中我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后来陆续听到一些传闻，说他得了病，精神有点不正常，还有的说他已不在人世。92年，突然有一天他来敲我家的门，我开了门，不认识。

他自我介绍说：“罗老师，我是鲍长康！”我有点惊讶地说，

“听说你病了……”他接着说：“不止病了，还死了！没有的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襄樊市一个药厂里当工程师。”说着，他拿出几盒药，“这是我开发的安眠药，非常好，没有副作用，也没有依赖性。你试试。”

我的老伴在旁边说：“给我吧，他（指我）从来不吃安眠药，我来试试。”

药吃完了，感到效果很好，想再要一些，我按照鲍留下的电话去找，已不见踪影。有人说在广州，也有人说去了东莞。我问蒯大富，蒯说他在广州，我估计这比较准确，后来证实是在广州。

93年，海南有一位想投资办教育的老板请我去帮他策划。这位老板是海南制药厂的大股东，他带我去参观。这个药厂很大，环境也很好。我们到了前台，老板对接待的员工说：“请成总来。”过了一会，有一个人晃悠悠地走过来，胸前挂着一个卡，上面姓名栏写着“成钢”。我因为不认识“成钢”，所以没大在意。老板对我说这是成总。

我说：“你好，成总！”

老板指着我对“成钢”说：这是……。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清华大学的校领导，深圳大学的校长，我的老师罗征启！”是成总在说。

我吃了一惊说：“我不认识你，你是清华的还是深大的？成钢？我不认识！”

他微笑地说：“我是鲍长康！上次去深圳看了你以后，我去过东莞，后来在广州，我干得都很好。结果要登报了，我发现我的名字、年龄和在清华毕业的时间都被改了。我才明白我的名字不能见报！一气之下，我辞了工作下海南。海南药厂聘我当总工程师，我索性乘势把名字改为‘成钢’即长康的谐音了！”

他的诙谐幽默、坦然自信和满不在乎的样子，使我感到经过这场

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他们都成熟了。

一晃四、五年过去了，我回北京才又得到蒯大富的消息。

我回北京应邀到海淀区委造访区委书记李荻生。他原是清华力学系的。文革开始时是校团委的。好像两派打仗时，他是支持老蒯的。在鲤鱼洲农场<sup>(注11)</sup>时，他是我们一连的指导员，是位足智多谋、学识渊博又思想敏捷灵活的青年干部。记得在鲤鱼洲时，有一天，我正在使牛耕地，他派人到地里把我叫到连部说：“老罗，我们正在总结党支部的工作，你听一下，帮我们写个总结。”我表示为难说：“不合适吧，我还没有‘解放’，甭说恢复组织生活了，让我写支部的总结？”他笑着说，“早晚得解放嘛！你是笔杆子，快手。老是赶牛，用进废退，我怕你忘了怎样写总结了。”

他跟我说起蒯大富：“这家伙不知道经过什么途径居然进了北京，进了海淀区，在海淀区开办了一个公司，手续齐备，搞得不错，还有点名人效应。这事一不留神让陈希同市长知道了，大为恼怒，把区长臭骂了一顿。我赶紧出面承担责任，算是过了关。其实确实没我的事，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样，蒯大富又被赶出了北京，据说去了山东。这小子现在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了！”我们都感到，经过大疯狂时代的历练，这批人物不仅更成熟了，而且能量极大，如果引导好，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回到深圳，有一天，忽然蒯大富笑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先递上一张名片，叫“戴明”。我反复看了看，知道是“代名”之意，用意和“成钢”一样。但是，他接着又递上一张蒯大富的名片。服务的企业是一家搞家庭影院视听设备的外资公司，任副总。我警告他说：“你两张名片一起用，效果比用一张还要引人注目。你这样张扬的性格，小心这里是深圳，可能比北京还严厉。弄不好还会赶你走！”

此后，他见我毫无敌意，就不时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约几个人到我家聊一会，并且逐渐“放肆”甚至信口开河起来。

记得有一次，他不知怎地和深大的张文华老师联系上一起到我家来，同来的还有三、四个人，名字我记不起了。大家谈到文革的教训

时，我又告诫他要收敛一点，不要太张扬，不要参与政治。

他信口说：“罗老师，您放心啦！现在我就是专心致志弄钱，没钱什么都办不成。而且现在搞政治根本不是时候！”大家哄然大笑。

不知谁说：“老蒯此话泄露天机，不是不搞政治，只是没到时候。用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说：现在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蒯大富自知说漏了嘴，也笑了。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才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

还有几次，老蒯还约了北航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sup>(注12)</sup>来。韩看起来比蒯稳重多了。他俩经常当众争论。老蒯说韩保守，思想还留在文革之中，而韩则说蒯跑得太远了，离谱了。还说以前就经常跟蒯大富争论。“好多人说我是414观点，我承认有时候是。7.27那天我开放北航的一切设施接待清华414的‘难民’，结果414在广播里大骂我和蒯大富一个鼻孔出气。气得我下令宣布不欢迎414的人。老蒯你说，我有没有多次劝你不要这样打压414，7.27当天又劝你千万不要开枪对抗宣传队，你不听嘛！”

可是韩爱晶有个特点，他总带个笔记本，把每个人说的话全记录下来，有时还找你核对一下你刚才讲的话。有一次一位在场的朋友低声对我说：“这人什么都记下来，有点恐怖！不知他要干什么？”我没有觉得恐怖，估计他在写东西，记录一些资料。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准备写点东西，韩爱晶说：“是，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顺势问蒯大富，你呢，你要写吗？他说，“写肯定要写的，但什么时间，怎样写法，没想好，在考虑。”

此后，蒯大富离开了外资公司，自己开了公司，还是搞家庭影院视听设备的。

蒯大富有几次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说凤凰卫视和香港的什么报、国内的什么杂志邀请他作节目，当嘉宾，采访他，问我的意见。我都不赞成，我还是那个意见，收敛，不要张扬。他似乎还尊重我的意见，都谢绝了。

有时，他会拿他珍藏的文革中的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甚至刻了光

盘，分送给大家。那里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等。蒯大富拿着这些照片，颇有点怀念那段历史的味道。那些照片让人想起那疯狂的年代。对那段历史，我没有好感。

这之后，清华校友凡有聚会，蒯大富必定参加。两派的头头也偶尔聚一聚。沈如槐、汲鹏、唐伟、周泉纓等都和蒯大富有来往交流。

我仔细观察，当年，我们总是想突出两派的分歧，划清界限。而现在，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两派共同的东西。当年，蒯大富和沈如槐都从苏北农村的贫农家庭考上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彻底砸烂”，沈如槐针锋相对指出“什么彻底砸烂”！温度越来越高，动了长矛、步枪、炸药，两派不共戴天。今天，谁是谁非已不再重要，都是受害者，都是上当受骗，都浪费了大好青春时光。蒯大富坐了牢、判刑十七年，和四人帮差不多了。而顶住四人帮和蒯大富的巨大压力，没有什么瑕疵错误的沈如槐也只能在时代的边缘徘徊，得不到重用。

在一次清华部分校友聚会的餐桌上，蒯大富又拿他那些宝贝照片给大家看，并且说他已经拿到出国护照，先近后远，去了一次新马泰，以后再去欧美加。

我笑着说：“你都可以出国了，我还不行呢，连香港都不给我去。”

他笑着说，“罗老师，不一样呗，我是历史反革命，您是现行！”说得在座的都为之捧腹。

他能出国了，我很高兴。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在进步。希望进步更快一点。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望。

注1：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1963年入学。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混乱开始时，造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的反，被打成反革命。经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干预平反后，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成为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在清华大学夺了权，提出“彻底砸烂”等形左实右、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镇压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动用长矛、步枪、手榴弹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造成七百多人伤亡的惨案。四人帮垮台后，被正式逮捕，判刑十七年，刑期自1970年开始计算，1987年出狱。

注2：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清华大学文革大混乱中最著名的冤假错案。罗为笔者本人，时为宣传部副部长。文为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李为教务处副处长李康。饶为党办副主任饶慰慈。另外还有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科研处副处长徐一新。因明确表态批评蒯大富，被视为眼中钉。1968年初，除徐以外，全部被兵团总部绑架关押，刑讯逼供。后罗跳楼逃脱，徐躲进被团派包围的武斗据点科学馆，直至7.27以后被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救出。刘则伤重去世。文、李、饶等均多处伤残。蒯虽未直接参与绑架及刑讯逼供，但因是主要负责人，难逃罪责。详情有前文表述。

注3：刘承娴：统战部副部长，建筑系教师。因对蒯大富不满，参加了我与文学宓组织的“学习组”。当时“革命群众”中都成立“战斗组”。我们中层干部属于“有问题的人”，待遇相当于现在的“双规”，只能成立“学习组”。1968年初被绑架，6月被迫害致死。兵团总部宣布是畏罪跳楼自杀，传说是被迫跳楼，又得不到救治，含冤而去。成为一件无头冤案。1979年刘达任校长党委书记时平反昭雪。

注4：孙耘：又名孙毓星，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在“罗、文、李、饶发革命集团”专案成立之前，即为罗征启专案组的负责人。参与并主要负责对罗的绑架及刑讯逼供。罗征启逃脱以后，又抓捕绑架罗父及罗弟等。致使罗弟（第一机床工人）被殴打窒息而死。命案发生后，孙耘及另外一学生王庆章投案自首，十年中一直在狱中或在边境劳动。详情有前文记述。

注5：团、四之间：“二十八团”原为林彪领导的一个著名战斗团队。蒯大富平反以后组织的嫡系战斗队就自称二十八团，以后蒯大富的支持者就自称为和被称为“团派”，“老团”。而1967年4月14日由力学系学生沈如槐等组织的批评和反对蒯大富的学生，抢占了“团派”的广播台，广播了声明，自称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被称为414派、老4，或4派。

注6：三种人：1983年开始，清理文革混乱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军乱军和打砸抢烧杀等的罪犯，又称“三种人”。

注7：“7.27”：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为解决清华的两派旷日持久的武斗，派了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干部及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414派立即缴枪，拆除工事。而团派则在蒯大富领导下，武力抗拒，向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开火，造成七百多人伤亡的惨案。

注8：黄报青：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系秘书。是一位能坚持原则，有骨气的共产党员。文革大动乱中，坚持不肯喊“打倒刘少奇”、“打倒蒋南翔”的口号被校内外群众批斗追打，致精神失常，多次被送进“安定医院”。因其是笔者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故又多次绑在一起批。1968年12月，在五楼家中，听到广播喇叭中兵团总部批判罗征启、黄报青在建筑系搞假“四清”即从五楼窗口跳出，当即死亡。1979年刘达任校长、党委书记时为他平反昭雪。时任科委主任的蒋南翔亲自出席了平反追悼会。

注9：胞弟：指笔者的亲兄弟罗征敷。当时28岁，为第一机床工人。1968年3月27日，笔者自兵团总部关押人犯的八达岭附近的三堡疗养所逃脱。专案组追捕过程中，先抓了笔者的父亲和朋友林维南，4月3日又到家中，见罗征敷正在写控告信，即抓捕上吉普车，用擦车的棉丝塞入口中，头上又套上麻袋，到学校时，已死亡多时。

注10：都是兵团的总部委员或与总部委员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

注11：鲤鱼洲农场：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即教师干部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场所，在江西南昌县鄱阳湖畔围垦区，是个血吸虫肆虐地区。清华先后有三千人（包括家属儿童）去过，有一千多人感染了血吸虫病。

注12：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与清华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共称五大领袖。粉碎四人帮后韩也被判刑入狱。出狱后曾在深圳工作，现退休留住深圳。